

今年我们怎么办杂志

● 本刊编辑部

许多读者关心我们杂志,想知道我们会不会坚持原来的宗旨和原来的风格。借新年致辞的机会,本刊编辑部全体同仁向读者说说我们的想法。

我们会坚持原来的办刊宗旨。本刊的宗旨,简单说来,就是实事求是地写历史,老老实实地讲真话。反过来说,就是坚决不说假话,一旦发现什么话说错了,坚决更正,绝不自作聪明,文过饰非。本刊编辑部诸位同仁的年龄大都不小了,或多或少都吃过迷信和盲从的亏,回顾平生,独立思考的精神少了一些,多少都有一些憾事。好在历史和生活教育了我们,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才是中国最需要的,如何才能问心无愧。“朝闻道,夕死可矣。”实事求是,求真求道,这不仅是我们办刊的宗旨,也是我们做人的宗旨。

说真话,直面历史,意味着正视我们自身的经验教训。这份经验教训往往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指引我们今后的方向。数年来,我们几乎每年都在新年致辞中表示对党中央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拥护之心,对发扬民主、执政为民的迫切期待。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是未及完成。中共十六大

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认为这是合乎历史经验的正确主张,我们将锲而不舍地追随到底。

许多读者来信,希望我们杂志报道面能够更扩大一些,增加历史题材,增加一些对民主人士、专家学者、华侨华裔、工商业者、宗教人士等热爱祖国的感人事迹的介绍,增加外国的可资我们借鉴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经验、事迹的介绍。这些意见都很好,我们将努力去做。

加强与读者联系,密切与读者往来,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更多地与读者沟通,这是我们杂志今年改进工作另一个重要举措。希望广大读者更加关心与支持这个刊物,多加监督,多提意见,共同把这个刊物办得更好。



炎黄春秋杂志社全体同仁向读者恭贺新年

编者按：

本刊每年都邀请顾问和特约编委开几次座谈会，围绕着如何办好刊物，注意什么问题漫谈一番。在10月底的会上，年逾90岁的本刊顾问杜润生同志有一番精彩议论，特地整理出来，与读者共享。

《炎黄春秋》口碑很好。我碰上许多人，他们以为我参与编刊工作，都说：“你们刊物办得很好。”其实我只是一个读者，每期都读。《炎黄春秋》以史为鉴，这个方针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启蒙的作用，在全球化的时代，改革的时代，用历史素材反映当代需求，启发人们的思想。

我希望刊物越办越好。我们要向神舟五号的研制人员学习，他们的工作非常完美、非常准确，我们编刊物，写文章，也要力求完美，精益求精。办刊物也是对社会的服务，服务好，有利于共产党改进领导方式，有利于我们的政权形成一个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的政权。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我们国家应“统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能搞GDP拜物教。GDP增长，百分之七、八、九，还可以继续一个时期，现在要注意经济增长如何和社会发展相结合。重视社会发展，把它具体化就是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我们的进出口每年都有顺差，每年都有积累，我们的工业以平均16%的水平增长，经济总体上是好的。但是，我们现在仓库大量存货，卖不出去。消费不足，供过于求。消费不足就是群众购买力低。谁的购买力低？这要分析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现在有三种人，有人叫他们“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他们的年收入可以达到几万至几十万元。工矿区的产业工人年均收入七千元左右。还有一些低收入的群众，像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年2300元，交了税收，除去来年的农业成本，剩下来可供支配的现金还不到500元。城里的失业工人一般每月只领取不到300元的补贴。我们的经济国内国外一片叫好，但是，已经产生了两极分化的苗头（吴象插图：不是苗头，是现实）。分化的差别虽然不是很

大，但是在向两极分化方向发展。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重视，必须更加重视，否则会使我们党脱离工农大众。

两极分化靠市场经济解决不了，市场经济本性是会促进两极分化的，谁有经济优势谁就过得好。因此现在应该强调一下保持社会公平，更多地关怀低收入群体，关怀弱势群体。政府要出面干预，利用自己的宏观调控职能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就是利用税收，利用社会保障基金，利用财政转移支付，利用种种经济政策，大力扶持贫困户和弱势群体。

现在我们的政府已经注意到了，一是用公债收入建立城市社会保障基金，二是考虑给农民直接货币补贴，不是通过价格政策补贴，而是直接补贴。美国给农民每年补贴190亿美元。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应重视社会公平，关怀低收入群体。

我们提倡发展经济，必须明确是为了什么？是为谁发展？明确一点说，我们的发展就是满足人的需要，以人为本。关怀人，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和物质文化利益，特别是关怀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使老百姓享受三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不仅是解决温饱问题，还要受教育，提高文化素质，要参加政治活动，参与国事。我们要坚持国家主权在民，执政为民。非典时期的教训不能忘记。重视人，首先要重视人的生命，不能以牺牲老百姓生命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不同于战争年代，打仗不能避免牺牲，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生命问题，受教育问题，民生问题，民主问题，都要关怀到。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要大力正面宣传这个思想。《炎黄春秋》应继续本着以史为鉴的宗旨来组稿，体现十六届三中全会五个统筹精神。

我讲了上面这些想法，脱口而出，没有准备，语无伦次，如有错误，请同志们指正批评。谢谢大家。

兼顾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 杜润生

听谷牧谈亲历的几件大事

● 张根生

谈建立特区和对外开放

2000年11月15日上午，我去深圳迎宾馆桂园，看望谷牧同志，首先问候他和夫人的身体现在好嘛？他笑着说：现在我还可以，我向你们坦白交待，每周打两次高尔夫球，在家里每天晚上还打桌球。我跟你们说啊，在我们这把年纪，运动很重要。老伴的身体不好，得了一种怪病，吃什么都不吸收，现在靠打针维持，听医生说死不了人，但治不好。

当谈到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对外开放，我说：你是参与中央决策，并亲自组织实施，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你对特区十分关心，直到退下来后每两三年还来看一看。听华国锋同志说，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对外开放，是1978年6月由你率领我国国务院代表团访问欧洲后提出来的。

谷牧同志说：这是党中央决定的我国第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欧洲。我是一位副总

理，但到法国时是法国总理到机场亲自迎接，到其他国家都是国家元首接见。当时是谁提出组成这样一个代表团访问欧洲已记不清了，当时华国锋可能不敢先提出来，某副总理是不可能提出来的，但华国锋是赞成和支持的。我记得回来后邓小平先叫我去作了简要汇报，邓是很重视的。

我说据华国锋说：搞经济特区，是代表团访问回来后，向中央汇报时提出的，经中央研究后下决心搞起来的。谷牧说：访问回来后，由我亲自向中央汇报，当时所有的老师都参加了，我汇报中提到了国外利用搞“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形式引进外资，发展工业和外贸出口后，叶帅、聂帅、徐帅先后发言说：“谷牧同志到国外也看了，也说清楚了，过去我们只知道说自力更生，为什么外国能搞加工贸易，引进外资，而我们就不能搞呢？我看我们也应该搞。”几个老师都很支持，中央领导人大多数人赞成，包括华国锋。

在谈到特区这个名称的由来时，谷牧说：特区这个名称

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当时有几种提法：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还有免税区、开发区等。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吧。邓小平还说过，我不管其他人怎么说，“特区”是我主张搞起来的。

当谈到深圳特区建设初期时有的同志重视发展工业不够，着重铺摊子、建大楼，1985年底在深圳召开的特区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指导思想时，他说：当时深圳市委有的人不太听招呼，只知道铺摊子，我找他们谈过话，说要扎扎实实抓好工业，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管理水平，要搞在国际市场上能卖的产品，有的人还听不进去。后来调整顿导班子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

当谈到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最成功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的改革，一是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时，我说到华国锋说：任仲夷要求在大连也搞一个特区，中央叫你进行过考察，也同意在大连建特区，还研究好了方案，当时正准备提交中央讨论批准时，这时恰好有一位大理



1983年谷牧在基层视察

论权威从深圳考察回来说：深圳除了国旗还是红的，其他都变白了。这样一来就给放下来了。他笑着说：这是华国锋对你说的呀？他的记忆力还很清楚，当时确有此事。以后，我与这位大理论权威还面对面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写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报告，中央书记处讨论时，胡耀邦看了后很支持，说给你批转这个报告，但那位大理论家却说，转发这个报告可以，但要附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的名称叫“上海租界的由来”。那时我也是书记处书记，坐在他对面，我当即表示坚决反对。我说这个报告是主张对外开放的，怎么能附你那个意思完全相反的材料呢？我站起来说：上海租界的产生，不是上海道台的腐败，而是满清政

府的腐败和软弱无能，如果是上海道台不听话，一个不听话可以换掉一个，两个不听话可以换掉两个，但这并不是上海道台的事。今天这样的事不可能出现，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但这个报告还是没有批转出去。

我国对外开放具有速度快、规模大、效益好的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五六年就走了三大步：一步是建立4个特区，

第二步是沿海14个城市开放建开发区，第三步是建立了3个三角洲开放地带。不久又接着建立海南省大特区和建设上海浦东大开发区。现在全国已经全面开放，吸引外商投资占到世界的第2位，国家外汇储备也占到了第2位。

谈华国锋

当谈到对华国锋的评价时，他说：华国锋是一个好人，在粉碎“四人帮”上有很大功劳，他不整人，他民主，不做坏事，他的错误主要是“两个凡是”。毛泽东给他写两句话，“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他是不会突破的。他从一个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上来，对全国情况了解不够，缺乏经济工作经验，从

资历、能力、水平等方面看，让他担任总理和中央主席职务，是一种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情况。他当然不能和邓小平等人相比。

他又说：记得有一次中央开会，会议散会时江青说：谷牧留一下。我留下后，江青追问我为什么把30万吨乙烯工程放在大庆。我对她说：乙烯是以石油为原料的，把加工设备放在原材料产区，符合经济规律要求。但江青不讲理地说：我不懂也不管这些，我只问你是谁说的把乙烯工程放在大庆的。我对她说：我知道是谁说的，但不能告诉你。但江青硬是无理的纠缠，逼我说出来是谁定的。这时华国锋慢步走来说：你们在吵什么？我向华国锋说明了原由，华一句话就把江青给支跑了，他说：这是毛主席定的。江青一听是毛主席定的，夹着皮包，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走了。江青这个人完全不讲理。

谈“二月逆流”

当谈到老同志应写回忆录，把经历的重大事情写下来，用以教育后人时，他说：我已在写，还没有写完，剩一点尾巴。但他补充说：写好后不准备发表，“束之高阁，传至后代”，我怕发表后踩了谁的尾巴。像“二月逆流”事件，现在活着的人就剩下我一个了，当时的说法是：“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

是指余秋里和我)谭震林文化水平低一些,但确实是一个硬汉子,那一次中央开会是由总理主持的碰头会,上列9个人都参加了,当时大家对林彪和“四人帮”一伙的反党、反革命行为极端愤恨,纷纷揭批他们妄图打倒所有老干部、反军乱军、停止党的活动,取消党的领导的种种罪行。谭震林气愤地说:很难得参加中央会议,既然参加了我就说几句,我恨我为什么活过65岁,使我看到现在这种乱糟糟的局面,今天把共产党搞成这个样子。还有一句话更不能外传,就是他说:我后悔我为什么跟着×××闹革命。我不干了!我以后还要上山打游击去,我说话就算数。说完就拿起皮包要走。这时周总理说话了:“回来!不许走,今天会议上讲的话就到这个范围为止,一个字不能外传。当时徐向前元帅也怒不可遏,大力拍桌子(手都拍坏了),说: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反革命分子!到会的人都感到十分震动,当时周总理叫我作会议记录,这些话一个字都没有记上。”

谈经济和计划

在谈到1976年的计划会议时,我说,当时是你主持会议,那时也是“四人帮”闹得最凶的时候,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又被打倒了,李先念、余秋里、康世恩等几个老副总理都不能工作了,只有你还能工作。他说:那次会议是地震救了我。当时“四人

帮”指定李素文、吴桂贤、姚连蔚参加领导,会议越闹越凶,北有辽宁毛远新,南有上海黄涛,相互配合,矛头指向国务院,会议没法结束。谢富治的老婆、卫生部长刘湘屏,有一次还追着问我:为什么会议没有叫她参加。我说:计划会议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与卫生部没有关系。当时“四人帮”有计划地进行一系列阴谋活动,一开始是批“条条专政”,后来矛头指向国务院务虚会,一部分中央的领导权,实际被“四人帮”篡夺了,华国锋很为难,没有办法结束。直到唐山大地震发生。我对华国锋同志说:会议必须结束,我要到唐山去组织救灾。华国锋说:会议怎么结束法?我说很简单,你只需要简单地讲几句话就行了。华国锋说:那么我们开一个很小的会,就你和我还有纪登奎参加。当时我给华国锋起草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稿,第二天晚上,由华国锋简短地讲了讲,会议就结束了。是大地震救了我。

“周总理是一位很有远见的伟人。”他接着说:记得1974年的一天,我与他乘飞机到哈尔滨,在飞越渤海湾时,他要求飞行员绕着沿海的港口飞了一圈,他对我说:世界上各发达国家,都是利用港口开展贸易活动的,因为海运不需要修铁路、修公路,运输量也大。中国过去被西方包围,不可能利用海上运输开展对外贸易,现在条件允许了,你要注重加强港口的建设,并且明确分工,以秦皇岛为基点,

叶林向北,你向南,利用3年时间,将沿海港口建设好。我将秦皇岛到防城宜建港口的地点都跑了一遍。1974年前,全国只有60个万吨码头,到了1976年已经发展到100多个,增加了一倍。在1975年底周总理病危期间,我还亲自向他汇报说:总理啊!全国的港口建设工作已经提前完成了。总理听了很高兴,并且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下了他一生中作的最后一个政令:他要我注意抓航空港的建设。但是,在那时这是不可能的。当时的机场和民航全部由空军负责管理,空军司令员不可能听我的。但我又不能不传达,于是我在国务院会议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要加强空港的建设。

注1:2003年8月4日,我去北京华国锋家看望,曾经问他1978年派国务院考察团去西欧五国考察,是党中央谁先提出来的?他说那时中央已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重视了解国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情况,这一年曾派两个代表团去西欧、日本考察,我提出来经中央讨论同意,并确定谷牧为团长。

注2:这个代表团成员包括:钱正英、叶林、彭敏、张根生、王全国、杨波。

2000年12月
(责任编辑 吴 思)

1958 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

● 吴欣峰

《炎黄春秋》2003 年 9 期上刊登《谈为尊者讳》一文说：“彭德怀自述》中多有彭德怀对各个时期是非得失的检讨，唯独对 1958 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只字未提。”好像是说在这次会上彭德怀“整”了刘伯承、萧克、李达、栗裕等人。

笔者当时在林彪那里担任秘书，也是林彪那里的唯一秘书，清楚 1958 年的军委扩大会议的情况。请允许我来个毫不忌讳，秉笔直书。

背景

为了便于说明 1958 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问题，这里笔者先将几个有关领导人物的情况简介一下。

林彪，作战有力。特别是解放战争在东北战场，显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全国胜利后，称病拒绝担任志愿军司令员职务。小病大养，韬光养晦，窥视方向。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

高饶反党联盟揭发后，披露：高岗曾拉拢过林彪，事成之后，由林彪当总理。后来，好像林彪由被拉拢者变成了“揭发者”。粉碎高饶反党联盟之后，1955 年，林彪由中央委员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会议上，经毛泽东主席提议，被选为中央常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位在彭德怀之上。

彭德怀，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央军委副主席，40 年代的中央政治委员，长期担任指挥作战和军队建设的重任，屡建军功。全国胜利后，担任志愿军司令员，赴朝作战，艰苦卓绝，又立新功。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毛泽东主席让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彭德怀不愿接受，请求回西北地区参加经济建设。毛主席一听，顿时正色说：

让你担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已经可以了，还要怎样？！彭德怀本来是谦让，一听毛主席是这样看法，立即表示：我接受分配，我接受任务。

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首先提议将各位元帅都提为军委副主席（1959 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又都弄下去，只有林彪一人担任军委副主席；在罗荣桓元帅力争下，经毛主席同意，才又保留了贺龙副主席。林彪对此忌恨在心，以后制造事端，将贺龙迫害致死）。

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积极而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建军路线，努力实现我军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但在一些具体事务处理上，也出现了一些分歧，例如有人提出建议：成立中南海文工团，以总政文工团为基础，再从全国各区调演员，彭德怀不同意。后来此事也就搁下了。

栗裕，德才兼备，具有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七战七捷，粉碎敌人重点进攻，逐鹿中原，淮海大战，解放南京、上海、浙江、福建……战功赫赫，作风谦逊，平易近人。解放后担任华东军区代司令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饶漱石抢着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据说饶为排挤陈毅，有意拉拢栗裕。高饶反党联盟被揭发，曾说饶漱石拉拢栗裕。栗裕作风正派，好像没有被拉拢。不久，栗裕调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

林彪提出反军事教条主义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从 1958 年 5 月 5 日开到 23 日结束，接着是中共五中全会。26 日，八大

代表和中央委员到十三陵水库劳动一天,5月28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始。

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先讲话,他谈了形势,以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开好这次会议。具体议程:一、如何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二、检查军队在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三、军队怎样贯彻“四大”,进一步开展整风;四、战略方针、战争准备,组织编制,科技研究等。

林彪在发言中提出反对军事教条主义。

林彪5月2日从上海回到北京毛家湾住地,回来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刚回北京几天,×××上将来探望,谈话中说到军队有教条主义,训练总监部、军事院校都存在。谈到具体例子,就是内务条令中礼节繁琐,连我这个上将去见领导,都得手举到帽沿上,口里说着姓名、职务……一长串报告词,还得说:“可以进来吗?”军事院校教员讲课条条多,什么“一、二、三、四、五,……扁担架括弧;大A、B、C、D、E,小a、b、c、d、e……太烦人。”其实,这些都不是大问题,都是比较容易纠正的。

林彪听了,却很惊喜,如获至宝;要×××上将搞个书面材料来。林彪好像有点迫不及待,第二天来到我的办公室询问:×××送来“材料”没有?我说没有见到。林彪说:你打个电话催一下,让他快把材料送来。刚说完,又改口说:不,还是我打电话直接找他。说完,口里念念有词: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我预料军队领导上要出事,果然出了事,出了教条主义!

林彪获得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材料后,立即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最好是找叶子龙,就说我要去看看主席。”我遵示打电话到毛主席办公室,叶子龙不在,接电话的是罗光禄秘书,我向他作了报告。他说:“等我请示了毛主席后,再通知你。”

林彪急着要去见毛主席,下午又到我的办公室询问,我说还没有回音。第二天,罗秘书来电话说:“主席说,林彪同志不必专程来看望了,后天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图为彭德怀在会上发言

中央领导有接见,林彪同志可以来参加,一起见面就可以了。”

林彪按时参加接见,趁机与毛主席交谈,向毛主席反映军队中有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出在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军事教条主义”,并将有关“材料”顺便呈上。毛主席接过翻了翻后说:可以在会议上提出来,但问题不严重,向苏联军队学习是我提出来的,中央军委讨论同意的。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林彪在会上发言,他神色有点紧张,声音变调,含沙射影,攻击别人,煽动情绪,暗中伤人。他歪曲事实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有的单位把毛主席著作只作参考材料,有的连参考也没有列上!”林彪发言中还说:“军队落后了”,有意影射彭德怀等领导。

林彪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策动反对“军事教条主义”,其内情有许多人不知。现引录林彪自己的话。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不久,在一次会议上,他洋洋得意地说:“去年我回北京,×××找到我那里去,说刘伯承、萧克有教条主义。我得到这个材料后,认为很重要,把情况报告给毛主席。”……

批判“军事教条主义”，会议反应冷淡

与会人员对林彪发言反应冷淡，说：“这就是中央副主席的发言？”“军队落后了表现在什么地方？指出来嘛！”“谁不会讲两句名词，扣上几顶帽子！”“军队的训练、学习，向来是以中国的经验为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的。”

向苏联军队学习，是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提出来的。毛主席指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军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

与会人员说：“在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如教员讲课条条多，队列、礼节方面的规定，由于我军长期以来不正规，所以一时适应不了，慢慢会习惯的。”其中有些是很容易纠正的，如谒见领导报告词，可以免去，不必兴师动众在军委扩大会议进行批判。

与会人员对批判军事教条主义发言不积极，用邓总书记的话说：“会议温度不高。”军委领导到会讲话作启发。毛主席曾到会两次讲话，一次讲军队要赶上形势发展，鼓足干劲，以总路线、大跃进的精神，做好军队工作。第二次讲军队要艰苦奋斗，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等，指出：“我们有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搞供给制，有什么不好呢？”“进城以后，熬了几年，搞了薪金制、军衔制。其实把供给制变成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发展了资本主义思想。薪金制、军衔制等于资产阶级法权。”1955年实行薪金制、军衔制时，可不是这样说的，三年以后这样说，好像是对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有意见。

邓总书记在会上讲了形势。在谈到反对军事教条主义时，他只是打了个有趣的比喻说：学习苏军先进经验，好比请客吃饭。别人请你吃饭是好意，你吃了拉肚子，这埋怨谁？只怪你自己吃多了，或者你的胃肠消化不好。这要坚持实事求是。军委副主席陈毅元帅讲话，也没有提“反对军事教条主义。”他作为我军初创阶段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领导人之一，谈了当时党内、军内的一些情

况，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一度没有当选为军委书记，是少了陈毅这一票，结果是陈毅作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当选为军委书记。工作了一段时间，陈毅感到吃力，于是，亲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主动提出由毛泽东重新担任军委书记。

以后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陈毅因负伤和江西根据地斗争需要，留下坚持游击战争，而没有参加长征。对此，陈毅说，他曾一度有所误解：认为是毛泽东“报一票之仇！”其实当时毛泽东也无权决定陈毅是否参加长征。

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坦诚交心，自我批评精神，博得了与会同志的热烈鼓掌和好评。他的发言摘要刊登在《会议简报》上，毛泽东主席阅后，写下了“陈毅是个好同志”的著名批语。在以后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陈毅遇红卫兵批斗，紧急情况下，他念了毛主席的这条语录，曾引起误会和不同的传说。这条语录产生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而不是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参加了所谓“二月逆流”，正在受批判呢。

这时，训练总监部常务副部长萧克已被点名，犯有“军事教条主义”错误，正在检讨和接受批判。陈毅的发言中有一段专讲萧克。他说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毅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师师长，萧克是副师长。萧克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作风踏实，能吃苦，能和下级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受到全师指战员的好评。调离时，全师指战员热泪盈眶，挽留，恋恋不舍。

陈毅元帅的肺腑之言，一颗赤诚之心乃见，使与会人员深受感动。他讲话完毕，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加高“温度”，掀起批判“军事教条主义”的高潮

军委扩大会议已开了二十多天，对批判“军事教条主义”，气氛冷清，成效不大。为了加高“温度”，改变局面，立即以军委的名义通知，扩大会议规模，从各大军区和军事院校，抽调一批大校、上校军官来参加会议。与会人员由400多人，猛

增至 1000 多人，原开会地点军委三座门礼堂坐不下，于是会场由三座门迁移到中南海怀仁堂。

6 月 20 日，会议转入第二阶段，着重掀起批判“军事教条主义”的热潮。提出会议可以效仿 1957 年整风、反右派的做法，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会外，指示训练总监部和南京军事学院同时开展“四大”，批判“军事教条主义”，推波助澜，与军委扩大会议相配合、相呼应。

以训练总监部批判“军事教条主义”为例，大字报铺天盖地，纷纷扬扬，其中大部分是指向常务副部长萧克上将的，他所承受的压力较大。

训练总监部的人员分成了两派，以萧克为首的一派，坚持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原则，既重视我军的经验总结和贯彻，也认真学习苏联等国军队建设的先进经验，以加强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其中革命化以中国的经验、传统作风为主；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方面，向苏军学习先进经验。在学习和借鉴过程中，引起一些不同意见，甚至反对的意见，是存在的。

以副部长×××上将为另一派，主张实现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应依靠中国军队已有的经验，反对教条主义地学习苏军经验，并认定已经出现了“军事教条主义”，还表现得相当严重。

训练总监部的大字报，矛头主要指向萧克。但萧克的人缘较好，态度和蔼，同情他的人很多。而另一派，批判“军事教条主义”的人数较少，但受到训练总监部以外，林彪等人的支持。

与此同时，军委扩大会议内，也“温度”升高，加紧批判“军事教条主义”，寻找斗争对象，树立对立面。

先是提到了刘伯承元帅，刘伯承以谦逊的态度，主动在会上作了检讨，自我批评较深刻，获得与会同志的好评，一次检讨通过，再无人追究。

进而提到萧克，萧克在训练总监部接受教育，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诚恳地作了检讨，也获得通过。

又有人提到李达上将，他曾担任过第二野战军参谋长，与刘伯承元帅共事多年。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提出：李达很滑，这次不要让他

滑过去！……但是抓不到事实，李达没有搞“军事教条主义”，只做了一般检讨，也只好通过。

最后，抓住了蔡铁根大校。他原是训练总监部的处长，后调南京军事学院，担任系主任。他执行向苏军学习先进经验的指示，但不承认有“军事教条主义”。他说：“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是毛主席提出的，一定要先学，先学到手，然后再慢慢消化。在消化过程中检查有什么问题再说。……”他对林彪提出的批判“军事教条主义”，消极抵制。

蔡铁根在压力下，虽然也作过检讨，但通不过。遭到大会、小会的批判，以至于在中南海怀仁堂这个神圣的处所，众目睽睽之下，一些大校、上校们拥上讲台，将蔡铁根推推搡搡，将他的领章、军衔标志扯下来。

1959 年林彪上台后，蔡铁根被降级转到地方安置。“文化大革命”中，旧事重提，蔡铁根被折磨致死，死得比较凄惨。

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大字报上提到粟裕大将

会上大字报出现了批判个人主义、单纯军事化观点的问题。当时“大跃进”的形势，很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敢想敢说敢干。所以，军委扩大会上有些人提出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单纯军事观点，提出了一些事例，牵扯到一些将领。

有人揭发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乱搞男女关系，道德败坏，带有一贯性，“走到哪里搞到哪里”。这次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竟然把女姘头带到军委扩大会议人员住所，伴舞伴宿，引起与会人员的强烈不满，纷纷贴大字报和在小组会上提出批评意见，强烈要求领导上加以制止。此事还登载到会议《简报》上，说黄永胜工作上平庸，思想上暮气很重，但搞女人可有一手。

黄永胜是林彪的湖北老乡、老部下。笔者把黄永胜将女姘头带到军委扩大会议住所的事向林彪汇报后，林彪听了，有点不耐烦地说：“那是小节，不足为怪，看人要看大节！……”叶群在一旁插嘴说：“黄永胜为人聪明，他老婆项慧芳太老实！……”不知其中含有什么奥妙！

总后勤部系统的与会人员,对总后副部长邱会作中将意见很多,说他作风不好,有男女关系问题,说“他是满头青丝,花花肠子……”

装甲兵副司令员聂鹤亭中将,在发言中对林彪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表示不满。他说:“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和林彪在一个连队。那时,连队分大排、小排,我是大排排长,林彪是小排排长。连长不在我可以代替连长。林彪这个人,心术不正,在东北时,他只管作战,整天在房子里,麻烦的事都推给别人。军队工作有罗政委和谭、刘,地方工作有高、陈等。但功劳都记在他名下,缺点错误都是别人的。他老婆叶群整天不工作,拨弄是非,和二毛子男女混在一起……当时在哈尔滨,我们有些高级干部找二毛子姑娘结婚(所谓二毛子,是中俄男女结婚生的子女),我也找了一个,却遭到林彪的不公正处理,我至今有意见!”

会上对总参谋长粟裕提出意见,主要有:说他“军事上行,能指挥打仗,战功很大。但政治上不行。”有的大字报只写几个字:“总长,总长,只抓业务,不抓思想!”有人听他说过:“总参谋长连批一辆汽车的权力都没有!”这大概与当时中国工业不发达、汽车太少有关。粟裕还提出:不当总参谋长,要求下放。

会上有人提出“将帅不和”

军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又有人提出粟裕“告洋状”。这个问题好像题目挺大,但内容很少。粟裕曾到苏联访问,在与苏联总参谋长对口会谈时,交流了两国总参谋部的一些工作情况和做法。在会谈过程中,粟裕曾提出:总参谋部与国防部的关系,请苏联总参谋长介绍一下苏军的经验和做法。不知是翻译文字语言上的原因,还是对方没有正确理解,苏军总参谋长听了回答说:“这个问题提得不正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再没有具体解释。粟裕听了,也没有再说什么。粟裕是总参谋长,又是国防部副部长,不会不知道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关系。

从“总参谋长连批一辆汽车的权力都没有”,“告洋状”,要求下放等几件事说起,会议上一些人鼓噪:“将帅不和”。要求搞清,要求检讨,要求大会批判。

鼓德怀元帅一身正气,个性直爽,疾恶如仇,从善如流。听到会上有人鼓噪“将帅不和”,明知有许多事情与事实不符,但还是忍耐着。他好像看出:有人想故意把事情搞混,把问题拔高,看“笑话”,获渔人之利。

随着会上要把“将帅不和”的问题搞清楚的呼声越来越高,初经“四大”滋味的彭元帅,直性子人忍不住了。他说:“那就扯开,看看我这个恶婆婆有哪些丑行?”这句话里有严于责己的方面,但是好像欠缺全面考虑。扯开干什么?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在党小组会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小题大做,只能产生内耗,伤害同志感情,将帅两败俱伤,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当时在干部配置上,与前后也有些不同。在彭、粟之前,是周总理兼管军委工作,徐向前是总参谋长,没有到职,由聂荣臻代理。到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增设了军委秘书长一职,经毛主席提议:黄克诚任军委秘书长,粟裕任总参谋长。总参的事、军委的事是各有分工负责的。在粟裕之后,经毛主席提议:由黄克诚担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1959年林彪接任后,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

粟裕大将作检讨,仍然坚持下放

军委扩大会议发展趋势,好像对粟裕、彭德怀都不利,是何原因?

继刘伯承、萧克等大会检讨之后,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自我批评,检讨中表现出他的高尚风格。他不仅检讨了近年来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而且还把历史上的缺点,犹如布袋里倒核桃似的,哗啦哗啦,全部亮了出来。例如,在华中地区工作时,群众挂他的画像,没有制止;建国初期,在华东地区工作时,对陈毅同志支持不够,等等。

粟裕检讨后,会议上再没有提什么,获得通过。陈毅听了粟裕的检讨后说:“自己检讨好,自己不说别人不好讲!”

粟裕检讨后,仍然坚持要求下放。“下放”是当时的新兴名词,与“将军下连当列兵”,都是光荣的。会上有人质问粟裕:是去当团长还是当师长?陈毅曾写道:“干部下基层,发动大建设,生根

而落户,实际干改革。潜力猛发掘,生产开新页。岂仅为精简,下放路子阔。思想大革命,辉煌入史册。”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从5月28日开始到7月22日结束,共开了50多天。会议结束不久,粟裕被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保留国防部副部长职务。以后升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总参谋长一职,经毛泽东主席提议由黄克诚接任。如果粟裕当时是元帅军衔,好像会又有一番光景。当时条令规定:国防部长有权批准师级干部的任命调动。军级任免总理批准,兵团以上干部任免要经过主席批准。所以,粟裕调动是他本人要求,主席批准的,不是国防部长彭德怀任免粟裕的职务。

会后,军委决定撤销训练总监部建制,另成立训练部,归总参谋部领导;新任部长李作鹏中将是林彪的老部下,萧克被调离。原训练总监部两派,看起来好像争论很激烈,大字报铺天盖地,势不两立;军委扩大会议一过,好像时过境迁,云雨消散,分歧也不大。为什么争论那么激烈?这与1957年以来整风、反右、“四大”,以及“大跃进”、“敢想敢说敢干”……的形势有关;又有人从中策动,添加“佐料”,推波助澜。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限上纲,好像与过早提出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有关。

粟裕的职务降低了,彭德怀的地位好像也不牢固。从这次军委扩大会结束时,全体与会人员合影大照片看出:彭德怀坐在靠边的位置,没有坐到按惯例应该坐的座位上;而林彪却坐到了紧靠毛主席的座位上。

责任

彭德怀名义上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他应负哪些责任?

一、被动。上有毛主席,毛在刚结束不久的大二次会上不指名的批评彭,彭也对“大跃进”提出了不同看法。毛之外,又有了一个刚升上来的中央副主席林彪。笔者认为论德、才、资和贡献,提彭为宜,但提了林。彭忠心耿耿,但好提意见,上边不喜欢。提个“病员”似乎好驾驭,岂知,欲望更高更大。“欲取之必先与之”,不仅是“借钟馗打鬼”,欲取而代之。一上来就抛出了个人崇拜的糖

衣炮弹,这一“法宝”十分厉害,十分了得!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好像要让“贤”,“无意思争春”,显得被动。

二、会议没有按原定议程进行,而是顺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趋向发展;彭德怀好像也无法掌握和扭转。50多天的会议,就是批判“军事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来复去就是那么几件事,几句话。

三、实际上,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后,人民解放军的日常训练、战备任务,已经作了很大更改,主要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思路开展。毛主席说:以钢为纲,纲举目张。“钢铁元帅升帐”了,部队就停下训练,以人力、物力支持大炼钢铁。毛主席说:以粮为纲,纲举目张。大办粮食,“粮食元帅升帐”了,部队停下来训练,又以人力物力支援农业。

毛主席说:大写诗歌好,全国军民都来写诗歌。部队放下训练,坐在那里写诗歌。

彭德怀不愧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开国元勋之一,优秀的共产党人和军事指挥员,人民解放军的楷模和统帅人物。杨尚昆曾经写文章评价彭德怀:“他临阵对敌的雷霆之威,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霜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使他不为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表率,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革命元老续范亭称赞说:“爽直将军贵姓彭,志如铁石气如鲸。三军一致称模范,粗布征衣半老兵。”毛泽东称赞说:“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粟裕和彭德怀一样,也是立有赫赫战功、富有军事指挥才能的统帅人物。在以后的年代里,受到林彪的压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用,没有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相应地避免了某些“政治漩涡”。他的一生,用实际行动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正像他自己描写的那样:“半生生涯戎马间,一生系得几危安。沙场百战谈笑过,际遇数番历辛艰。松苍敢向云争立,草劲何惧疾风寒。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

(责任编辑 吴 思)

胡耀邦为“61人案” 平反急如星火

● 曾彦修

在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的李锐序中说：“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抵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曾拒不交出一、二、三专案办的档案材料。这是何等困难、何等严峻的局面。耀邦另起炉灶，对大、小案件，由中央组织部单独进行调查，一一落实，取得成功。”但戴书对“61人”案只提及一下，我现在来做点补充。因为，这是一个特殊大案，被诬陷的人，有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几个中央局书记、省委负责人、党中央及政府部长等一大批人。

耀邦同志为平反这个冤案急如星火、迫不及待的情形我知道一些，我也曾为此事写过几次材料。我这个小小的晚辈，在偶然的会中，掌握了可以完全推翻康生等的阴谋的具体资料，用句不科学的话来说，这真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这材料，从未见过报刊，但它无秘密性可言，是应该公开的。

此事发生在1978年夏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几个月，下边是一点经过。

1977年四五月时，即打倒“江青反革命集团”半年多一点的时候，于光远因事到上海。一天，他打电话到上海辞海编辑部找我，叫我下

班后到东湖路招待所去找他，我去了。他问我的情况，我说，继续靠边，无事做，替大家抄写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不天天斗了。我告诉于，我写了两份材料给中央，不愿交邮，怕收信单位转给那帮人，这次正好请你回京交与叶帅。当时，邓小平同志尚未出来，中央领导人中暂时我只相信叶帅。

两件材料，一是关于张闻天的，一是关于康生的。我认为这二人的忠奸善恶，都应该由中央作180度的彻底颠倒才行。康生的事，于光远同我知道的是一样的，当天二人再回忆对证也是一样的，绝对无误。第二天我就把现成材料交到于手中了。

说来好笑，我当时的身份是很明确的：摘帽右派，应无任何发言权，“牛鬼蛇神”的定位，一点也未改变，而且我也没有想过会有所改变。因为那时“两个凡是”正叫的震天响，还会改变什么呢？不过良心驱使我急于写那个建议罢了。我建议中央彻底翻案的张闻天，是前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康生，“文革”大红人、军师、中央副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历史上第一个被这样称呼的）。这两人在延安时都是我的业师，也是我分别参加过的两个工作团的团长，而且康生待我是很客气的。但我对他们二人的印象和评价却截然不同。我这两份上书，于光远回京



主持平反工作时期的胡耀邦

后看见情况完全不对,就把它们暂时压下了,现在看来压得很对。1978年6月,我见到邓力群同志,谈及这两件材料,邓也说,张一定会平反,但康的事情目前还不能谈。那时康生还在天上,“××体制”的人还在继续捧康,还在继续大镇压反“文革”的志士,如真把我这材料立刻交上去,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二

1978年七八月间,我已经正式调到北京两三个月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筹备小组工作,地点在东总布胡同东口的几间平房内。一天上午,我们几个筹备人正在开会,于光远的司机跑来找我说,于叫你立刻去他家,有要事。我打电话一问,果然重要。只好说明情由,负责人姜椿芳也高兴极了,叫我立刻去。到于的上房时,有四五个人在分头议事,很忙、很乱。于说,昨天下午看见耀邦,对他说起,我们手里有一份康生详谈“61人”案件的材料(是康生的供状,内容已告诉胡了)。耀邦听后,高兴得不得了,说:“有这等事,太好了。”叫我立刻给他送去。但你已下班,又无电话(那时我住在招待所),材料一时找不着,只好请你来重写。耀邦急如星火,刚才又打电话来催了,请你现在就写。

我于是坐下立刻写,约20分钟就写好了,内容同上次我在上海写的自然一样。

这材料的题目已记不得了,大概是《康生谈薄一波等“61人”案的经过》之类。内容则永远记得十分清楚,大要是:

1948年旧历元旦(或初二),山东鲁西北阳信县的渤海区党委组织部长刘格平同志请康生及中央土改工作团全体团员到他的家中吃晚饭。因为刘是回族,不能出席区党委的正式宴会。这次名为晚饭,因在冬天,考虑到康晚饭后要散步,所以大约下午三时晚饭就开始了。因此,饭后仍照常散步。康生忽然问大家,“你们知道刘格平这个人不?”未等回答,他就继续说下去,“这个同志资格老得很,是二十年代初的党员,是个回族同志。他比别人多坐了八年监,敌伪时期他照样在北平坐监,敌伪不知他是共产党员,糊里糊涂当他是普通刑事犯,他算活下来了。是日本投降后才出监的(最后一句记不清了,也可能是日降前不久,敌伪监狱已大乱,由党组织设法花钱把刘弄出来的)”,“他是老党员,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可是只要一谈起可兰经,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见了(按:此二句我和于光远反复对证,

认为连字句都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印象特别深,康也就只这么讲了两句)”。“1936年夏,少奇同志从陕北到平津担任华北局书记后,当时革命形势一天天高涨,可是特别缺乏干部,有经验的老同志都在北平敌人的监狱里,这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位同志。当时分析形势,他们再坐监下去,很危险,有几种可能:一是日本很快占领平津,这些同志就立刻会被杀害;二是蒋介石要把这些同志押到南京去,宋哲元欢送;三是宋哲元嫌麻烦,请求把这些同志送往南京去。所以,这批同志如不赶快出监,就很危险。当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对共产党员出监的手续已不那么厉害了,只要登个脱党启事就行了。因此,有同志建议(听说这是当时华北局组织部某部长建议的),是否请示中央,让他们办一个出狱手续全都出来算了。刘同意了,请示中央,中央由张闻天出面也复电同意了,于是通知薄一波他们照办。但他们坚不同意登启事,不出狱,经多次催促,不愿用此方式出狱。”康也提到在狱外为此事奔走的徐冰、孔祥桢等同志的名字,康生说,“此事久久不决,华北局通知他们,再不执行就是个纪律问题了。”于是狱中决定先出来一个同志探听虚实,弄清楚中央的指示后才出狱的。(此事已记不大清了,也可能不确。)

我一会儿就写成了,于叫秘书立刻拿到单位打印。我说,是否找高文华同志看看,于说不必了,老年人怕记不清楚了。我也赶快说,高身体不好,一般他并不参加这个散步,不送好。我又说,还有凌云、史敬棠。于说,也来不及了,转来转去,又是好几天,耀邦立刻就要,我们二人的共同署名就有效了,耀邦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好的证明材料,所以特别高兴,要的紧。

不久,中央为薄一波等“61人”正式平反的文件出来了,后面正式附了唯一一个附件,就是于、曾二人所写揭发康生的材料全文,这个文件我当时看到了。后来编出的一本中央内部文件,省去了这个附件。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正文内已经引用这个附件了。

这件事情说明,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特别是重要的冤假错案上的决心、热情和恨不得有凭有据地立刻解决问题的心情,是十分令人感动的。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这种事情埋没了是可惜的。耀邦办这件大事,是抢过来另起炉灶,加急为“61人”平反的。因为这里面“要人”很多,平反了他们,影响很大。

(2003.9.3)

(责任编辑 致中)

从战士到贱民的奇特经历

直言获罪(一)
• 徐孔

1955年7月中旬,我从朝鲜回国休假,假期的时间没有作硬性限定。

因为兵团政治部的机构有所调整,我主编的兵团机关刊物《工作通讯》停刊,编辑部的人并入宣传部宣传科。我处理完停刊的有关工作以后,政治部主任丁莱夫批准了我回国休假的申请,并且对我说,你几年没有回国了,这次回去可以多休息一段时间。我准备利用这一次较长的假期着手写酝酿已久的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

回到北京以后,原联大文学系同学李兴华在作家协会招待所给我安排了一间房。可是我动笔刚写了两章,就接到军区转来的兵团的来信,大意是说:兵团的肃反运动已经开始,如无特殊情况尽快返回参加肃反运动。

那时对政治热情非常高,对党的号召绝对是勇往直前的。我毫不犹豫地停止写作,立即动身回朝鲜。

直言相谏激怒当权领导

兵团部驻地在朝鲜西海岸的龙烟浦里。

我回到住所,最先见到的是原工作通讯社编辑部的郭游和杨平。郭游是直筒子脾气,说话不管不顾。我向他们两个了解运动的进展情况。郭游说:“志愿军里哪来的反革命?大嚷大叫的火力倒挺猛,全是没有目标的乱开枪。”杨平这个年轻的见习编辑却是个内向的人,他只是红着脸笑,并不说话。

正在郭游高声大调地申明他的见地的时候,宣传科的助理员张山跑来了,一进门就紧紧握住我的手,不停地摇撼着说:“刚才听丁海说你回来了,怎么不多休息一些时间!”我说:“接到兵团的信,叫我尽快回来参加运动”。他说:“是啊,是啊,运动一开始,工作更忙不过来了,你再不回来我真有些吃不消了”。论关系,我和张山是前后同学。他是1944年从敌占区北平出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华北联大学习的,我是1945年入华北联大的。他从联大政治班毕业以后就到部队搞宣传工作,有经验,笔头子也快。宣传科另两个助理员丁海和何秀敏都是年轻人,经验少,文字功底也差一些。宣传科长刘鸿飞原是县大队政委,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宣传科起草文件、编写教材等重要文字工作主要靠张山。运动一来工作时间少了,一个人更忙不过来了。我回来可以分担一些他的工作。

张山又热情地问我爱人考学的情况和几个回国熟人的情况,但没有提到原副部长徐逸人。张山走后,我马上到宣传部长韩福贤那里销假。

韩福贤原来是政治部民运部长。在徐逸人回国以前就调到宣传部来了。徐逸人和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的关系一直不好,下边议论:丁主任是为了“改善”宣传部的领导,把不懂宣传业务但听话的民运部长调到宣传部来作徐逸人的顶头上司。在当时的部长里边,韩福贤的年纪是较大的,四十四五岁了。

我向韩福贤简单汇报回国休假的情况以后，韩福贤没有问我一句私事，就像在部务会上讲话一样，郑重地对我说：“早回来好。肃清反革命分子是纯洁我们的队伍，巩固革命政权的必需的重大的战略任务。每个党员干部都必须全心全意地积极地参加运动。”又把兵团党委对运动的部署、要求和运动期间的纪律等作了一番交待。最后说：“现在是运动第一。日常的工作由张山向你交待。”

当时，我的情绪很高。参加革命以后，历次运动——土改、三查、三反，我都是积极分子。我觉得，正像韩部长传达的那样，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内外的敌人千方百计地想颠覆年轻的革命政权，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反革命分子，对纯洁革命队伍，巩固革命政权确实是十分必要的。我决心全身心地投入肃反运动。

可是我第一次参加宣传部的小组会，就发生了使我感到十分不正常的现象，导致了我和韩部长的正面冲突。

那一次小组会是在宣传部的办公室召开的。参加小组会的有宣传科、文化科和电影放映队的全部人员。张山主持小组会，韩部长也参加了。

小组会主要是要大家揭发问题，发言并不踊跃，揭出来的也都是些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因为没有什么有根有据的重要问题，会场的情绪并不热烈。不料，小组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出现了爆炸式的场面。

“爆炸”是由电影队一个年轻队员小马的发言引起的。小马揭发张山的一件事。说张山背地里讲丁主任的坏话，说听丁主任作报告是活受罪，尽说车轱辘话，反反复复、哩 嗦，简直是对听报告的一种精神惩罚。

其实，政治部一些年轻干部背地里议论领导——包括丁莱夫副主任工作、生活上缺点的人，并非稀有现象，而且小马揭发张山的问题，在肃反运动中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料，坐在张山旁边的韩部长突然站起，把手上的记录本往桌子上一摔，红头涨脸地冲小马吼着说：“不要再说了！这都是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挑唆的，他成心破坏领导和干部的关系！”

韩部长这爆发式的一声吼，揭发张山问题却没来由的给原来的副部长徐逸人扣上一顶反革

命的大帽子，使大家一时都怔住了。过了一会儿，就有几个曾对徐逸人有意见的人，纷纷揭发“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的“罪行”。诸如：徐逸人态度粗暴，给他汇报工作的时候，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几次找文工团女团员打麻将，影响恶劣等等，虽然都是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但都提高到反革命活动的高度。

韩部长这爆发式的一声吼，虽然师出无名，但引导效果是明显的，我越想越觉得情况不正常。小马在会上揭发张山的不过是背地里议论领导的“怪话”，韩部长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而且把枪口转向了徐逸人？是为了保护张山免受群众的冲击？不是没有可能，张山一直是韩部长跟前的“红人”。张山这人我了解，他并非没有主见、人云亦云的人。他对韩部长的领导也有很多意见。而且语言尖刻，在下边讲韩部长的怪话比别人还“精彩”。但在韩部长面前绝对是谦恭的，韩部长向他布置工作时，尽管有些地方他不同意，但从不提异议，总是严肃地虔诚点着头，好像他已完全领会，并坚决执行。所以韩部长一直把张山看成听话的、得力的干部。为了保护张山及时转移群众的“火力”，不是没有可能。问题是，为什么把枪口转向了徐逸人，而且戴了那么大的帽子？

徐逸人这个人，在部长当中是比较年轻的，恃才傲物，对上对下的关系都不大好，尤其是对上，比如与丁莱夫副主任时常发生碰撞。但像韩部长那样的老同志，总应该知道，“反革命分子”是敌人，这顶帽子是不能随便扣的。特别是作为运动的领导人，更不能无根据地给人乱扣帽子，否则，就容易形成对运动的误导。韩部长那一声吼以后，不少人跟着“反革命分子”徐逸人长，“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短地乱喊叫，明显地是走火了。

当时我是政治部党支部的宣传委员，觉得应该向韩部长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一想到给韩部长提意见，心里又有些发怵。虽然韩部长来到宣传部的时间不长，但从不多的几次接触当中和过去在韩部长身边工作的人所说的情况，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韩部长这个人对上、对下是两副面孔。我这个人说话作事一向直来直去，最怕和这种人打交道，可按组织程序，反映对宣传部运动

情况的意见又不能绕过韩部长。

不管能不能接受我的意见,还是要说。

晚饭以后,酷暑难消。韩部长拿着一把蒲扇,坐在宣传部办公室旁边一棵大树下乘凉。宣传部办公室正在我的住所的对面。我来到韩部长身边,说:“韩部长,我想对今天的小组会提点意见。”

韩部长冷冷地看着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运动刚刚开始,如果没有什么证据就说徐逸人是‘反革命分子’恐怕不妥当,特别是你作为运动的领导人,首先给徐逸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更不合适,容易对运动产生误导。”

韩部长的脸色突然变了,厉声问:“你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我也火了,反问:“你是部长,你说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我问你,为什么替徐逸人讲话?”

我说:“我不是替徐逸人讲话,我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必要。我是对你和几个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提意见。这次运动是肃清反革命,不能把同志关系和工作、作风问题混淆成敌我问题。”

韩说:“我们并没有给他做结论,定性他是反革命分子。我们说的是他的思想和言行。”

我说:“韩部长,你和几个人喊出来的可是清清楚楚‘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既然没做结论,为什么给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韩问:“你说,他的那些言行是革命的吗?”

我说:“是否反革命分子是个组织问题,必须有证据,单凭今天大家揭发的那些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能给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吗?”

韩部长语塞,狠狠地一挥蒲扇,说:“运动中的事用不着你管,你还是好好想想,交待你自己的问题吧。”

和我预感的一样,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第二天的小组会,韩部长一反以往的惯例,不是先听大家发言,而是自己第一个发言,拖长声调说:“有的人刚一回来,就对我们开展运动的情况横加指责,指责我们揭发徐逸人的问题是混淆矛盾。我们并没有给徐逸人定性,是揭发徐逸人有害于革命的言行。有的人总是错误地估计形

势,低估群众的觉悟,自己跳出来表演。我们给他充分的条件让他表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韩部长的话刚说完,就有人喊:“谁替反革命分子徐逸人当保镖,站起来!”

我心里非常火,韩部长这明明又是在引导,不过是把枪口转向了我。徐逸人在国内,在朝鲜无法整徐逸人,就找我当替身。可能以为我和徐逸人关系较密切,整我就可以抓到徐逸人的某些东西。我问心无愧,和徐逸人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就坦然地说:“是我向韩部长提过意见。”我当然没有站起来,只是如实地把我参加小组会后的想法和向韩部长提过的意见详细地说了一遍。

我说明情况以后,多数人没有说话,但有一个人(名字忘记了)猛地站起来,怒冲冲地问:“你为什么给大家泼冷水!领导号召大胆怀疑,大家揭发徐逸人,为什么你就打横枪?你和徐逸人是什么样关系,必须老实交待!”

这一来,进攻的焦点就点明了。

接下来,就有几个人要我交待和徐逸人的关系,揭发徐逸人的反革命言行。第二天的小组会也是如此。

当然都没有什么“战果”,以后,改换内容,要我交待历史问题:包括我的家庭情况,从伪满到北平读书的情况,日本投降以后从北平到解放区情况等等。

提的问题不少,但这一次的小组会火力并不猛烈,我如实回答以后,几乎没有再追问什么。因为我写的自传和各个时期的历史情况包括证明人,档案里都有,入党以前,组织已做过审查,没有可质疑的地方。而且,我的直感告诉我,整我的目的不在这里。

我成了肃反的审查重点,被武装看管

专题揭批我的小组会大约开了七八次(准确次数记不清了),宣布我停职写交待材料,并说明,为了使我能专心地想问题、写材料,换个住处,不要随便走动,有事情和郭游说,需要办的事情由郭游去办。

杨平帮助我和郭游把行李搬到文化科最东

边的一间简易房。利用搬家的机会,把我所有的文字材料都收去了,包括采访和工作的记录本、国内来的一些信,报道的底稿等等。叫我交出日记,可停战以后我就不记日记了,当然交不出来,他们也没有深问。

搬到新的住处,我和郭游铺好床以后,各自坐在自己的床头。郭游显得很尴尬,闷了好一会儿,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粗话:“扯他娘的蛋,宣传部的人谁不了解徐逸人!”这句话的含意很明白。但由于当时我们两人的特殊关系——他是受命监视我的,我是被监视的,他不能明确地说出对部里处理问题的不满,只能用一句没头没尾、含含糊糊的话向我表示他的态度。

当时,我心里更窝火。找韩部长谈话之前我预料到可能产生不愉快的后果,但没想到会采取如此反常的手段。谁都知道,徐逸人在抗战初期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自学成材,是晋察冀有名的记者,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为了革命出生入死,他怎么会是反革命?即使历史上真的有可疑之点,他已调回国内,应按正常的组织程序,把疑点的有关材料转到国内他的工作单位,怎么能在朝鲜整国内的“反革命分子”,甚至找个替身来整他?

我和徐逸人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关系也比较好,但都是正常同志关系。1948年,我调到兵团新华社分社当记者,新华分社由宣传部领导,徐逸人是宣传部的部员,彼此接触很多。当时,徐逸人是团级,我是连级,级别相差很大。但这个人可能因为长期做新闻工作,等级观念不重,行军道上,或在老乡家的院子里吃饭,我们常常凑到一起聊天,谈到高兴处,纵声大笑;有时也意见相左,争得面红耳赤。但他从不摆上级的架子,争过也就完了,1949年解放太原以后,他调到河北军区当宣传部长。抗美援朝以后,他又回到兵团到宣传部当副部长。部长魏泽南轮换回国后,就由他主持宣传部工作,1953年我由记者组调到编辑科主编《工作通讯》,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刊物的终审。不过他在工作上很放手,除了言论,其余的稿件都由我定,他签字付印,上下之间合作得比较顺利,其间也有过几次争论,有一回,为一篇重点稿,我觉得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就是不同意,气得我把稿件摔到桌子上。他没有发



1956年肃反结束后作者回湖南探亲

作,晚饭后在山下散步的时候遇见我说:“老朋友了,意见不一致,慢慢谈,发那么大的脾气干什么!”最终还是按我的意见签发了稿件。在工作上我们之间碰撞不多,在生活情趣上却相差甚远。他的兴趣很广泛,喜欢跳舞,也时常打麻将。而我的生活很古板,从来不跳交际舞,也不打麻将,和文工团女孩子坐在一起打麻将,我更觉得是“有伤风化”,从不沾边。所以,我和徐逸人的关系主要是工作上的,上下之间配合顺利也好,分歧、争论也好,都属于工作范围,沾不上反革命的边。我觉得,在运动中,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的问题,都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乱说,更不能乱写。

心里窝火归窝火,材料还是得写。一个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接受组织的审查。但交待材料送上去以后,遭到严厉训斥,说我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我心里明白要我交待的是什么,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见风使舵,胡编乱造。所以第二次、第三次交待材料,都没有交待出什么新问题。使我奇怪的是,韩部长批评虽一次比一次严厉,却一直没有再对我进行小组批斗。后来,从郭游嘴里知道,小组正在批斗刘鸿飞。显然,郭游对部里的做法是有意见的。嘟嘟囔囔地说:“这叫什么事,刘鸿飞那个老实疙瘩,说话就脸红,整他干什么?”“从38年就打日本鬼子,到现在倒要把他打成反革命了!不就是和他(指韩部长)顶过几句嘴吗,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就往死里整人,

这可肃的哪路子反！”

大约过了两周,终于通知我参加小组会。我已经有思想准备,经过两周“休战”,这一回肯定会加温,火力更加猛烈。我并不害怕揭发问题,自己最了解自己,我没干过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们揭发不出什么。即使编造一些问题,没有证据,也定不了性。但怎样批斗,我心里却没底,群众运动中“走火”的事情太多了。反正硬着头皮挨就是了。

果然,这一次小组会气势很不一般。

一开始,叫我自己交待。我按照写过的交待材料说完以后,韩部长气得脖子都红了,愤怒地说:“看你猖狂到什么程度!我们耐心地等待你,启发你,给你充足的时间,叫你交待问题,可是你不但交不交待新的问题,反而写的材料一次比一次少。好像你没有问题,我们冤枉了你。你这不是猖狂地向肃反运动进攻吗?”

接着就专门地“端正”我的态度。

“端正”态度,当然需要加强火力,拍桌子吼叫的,挖苦讽刺的,切齿怒骂的,攻势越来越猛烈。那时候的群众——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党的决定就是自己的意志。组织上确定这个人重点,这个人一定是坏人,一定有问题,领导上要求端正他的态度,打掉猖狂气焰,那就必须穷追猛打,一直打到他的精神崩溃、低头认罪为止。

对这种情况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不论人们怎样吼,怎样骂,我一句话不说。

这一次小组会一无所获。

第二天的小组会温度降了很多,没有大喊大叫。但问题却升格了。“反革命分子徐逸人”变成了“徐逸人反革命集团”,我成了“徐逸人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明确地叫我交待这个反革命集团成员都有谁,成员之间、特别是和徐逸人之间进行了哪些不可告人的活动?我一听脑袋就炸了。对于整态度,大吼大叫、侮辱、谩骂我是有思想准备的,能够忍受,可是没有想到在运动中采取如此恶劣的手段,凭空捏造、栽赃陷害!我知道运动的老规矩,只要把你确定为重点,你就只有挨批的份儿。叫你交待什么问题,你不讲话不行,解释反驳更会招来更猛烈的批斗。可是我心里没鬼!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批斗的火力越来越猛,我心底的火也不住地往上窜。

几个人轮番吼叫,叫我交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我也大声地回答:“我根本不知道宣传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无法交待你们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有人厉声问:“你说宣传部没有反革命集团,那么你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我说:“这你去问韩部长,他是宣传部长,你问他,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韩部长怒吼一声:“混帐!叫你交待问题,你反倒叫人来问我!”

马上就有人喊:“打掉他的反革命气焰!”“砸烂他的花岗岩脑袋!”“叫他站起来!”

吼声中,电影放映队有个叫常烈的换机员,冲过来,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从座位上提起来。此人个头不高,黑红脸,多年摇发电马达练就一把好臂力,特别是两只手,硬如铁爪,他抓着我的衣领,两手关节狠狠抵住我脖子下的骨头上,疼得钻心。后边又有人怒吼一声:“站直了!”向我后膝窝猛踢一脚,我站不稳,身子向前一仆,常烈当胸一拳。我的情绪也失去了控制,大声喊道:“凭什么打人!没有证据,你们就逼供信,谁给你们权力!”

可能韩部长觉得做得有点过火了,连连摆手说:“放开他,放开他,叫他自己讲!”

常烈松开手,站在对面,两手叉腰,怒气冲冲地瞪着我。其余的十几个人也站在我的周围,怒目而视,在我周围形成了怒目金刚组成的包围圈。

这一次的小组会温度确实很高。揭批者怒火填胸,厉声逼我交待罪行。而我毫无低头认罪的“老实”态度,针锋相对地逐条辩驳,形成了短兵相接的交手战。

在这场搏战当中,有一个人——就是张山的态度很特殊,我早已注意到,从揭发徐逸人的“反革命罪行”开始,他一直没有发言,既没有揭发一条徐逸人的“罪行”,也没有追问过有关徐逸人的一个问题,只是低着头在笔记本上记录别人的话;在大家“端正”我的态度、又吼又骂、动手动脚采取激烈行动的时候,作为小组长,他没有参加,但也从不制止,脸色冷冷地坐在一边,真可谓是“冷眼旁观”。也许这就是张山为人的特点。他并不是分不清是非,不会看不出宣传部这种无凭

无据地揭批“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闹剧后边隐藏着某些人的不正派的动机,所以他不参加批判者的行列。但他深谙运动的规律,当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后,如果你坚持实事求是,提出和大家相左的看法,就会引起群众特别是领导者的不满,影响自己在领导心目中的形象。在这场不正常的运动中,张山这种不动声色的旁观的态度,正是他的聪明之处,也是可悲之处。

这次小组会经过激烈的交锋,仍然没什么战果,批判者怒气难消,我的心里更是气愤。散会以后,我马上去找兵团肃反五人小组(肃反中特设的领导组织)成员、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一进门,我就冲口问道:“丁主任,1948年兵团一组成你就是组织部长,你说说,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丁莱夫正在看文件,放下文件,用手指指椅子,叫我坐下,有些不解地问:“怎么回事?你怎么提出这么个问题?”

我说:“你是兵团分管组织工作的老领导,对我和徐逸人的情况都很熟悉,你说说,我和徐逸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丁莱夫说:“就是部长和助理员的关系,还能是什么关系!”

我说:“那为什么宣传部多次开会,追查‘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说我是‘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逼我交待和‘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的关系。难道宣传部这样搞你和五人小组不知道?”

丁莱夫说:“宣传部开会的情况我听到一些,详细情况我的确不了解。目前几个军的肃反运动都处于发动群众的阶段,很多情况需要了解、掌握,我的精力主要在各个军,兵团直属单位的肃反运动由直政处抓,一般情况我不过问。宣传部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情况详细地说一说。”

我就把我回到兵团以后第一次参加小组会,在群众发言当中,韩部长没头没脑地给徐逸人扣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会后我找韩部长提意见,以及后来小组会批斗我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越说心里越火,最后,很不冷静地说:“丁主任,你是我的老领导,有些事想向你讨个明白,为什么对干部的评价变化这样快!当初,我几次有机会回国,你不放。可能那时候你觉得

我这个干部还有点用处。可是为什么运动一来,整个地翻了个过儿。是不是当初你就知道我是反革命,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所以才留下我,做为肃反运动批斗的典型!”

丁莱夫听了这些讽刺的话,态度仍然很平和,略沉了一会儿说道:“你现在的心情我理解,相处几年,我了解你,你也了解我。在革命队伍里,上下之间都应该以诚相待,我怎么会对你使用权术!你今天说的情况,我要仔细地了解,如果属实,韩部长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关于徐逸人同志,他工作上、作风上有缺点,但我和五人小组从来没有把他看成反革命。对于你,我和王平政委(兵团政委)的看法是一致的,也从来没有改变。”

和丁主任谈话以后,没有接着开我的小组会。隔了好几天,又通知我参加小组会的时候,参加会议的又多了几个外单位的人,有丁莱夫的秘书史忠、政治部的秘书赵人杰、政治部协理员冀连波,后来又增加了保卫部助理员毛建平等,会上没有提‘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事情,主要是要我交待从东北到北平读书的情况,到北平以后和哪些人交往,特别是在新民学院(华北行政学院)那一段接触过一些什么人及由北平到解放区的情况。这些,入党以前我的自传中都写过,这一次问得很详细,特别是证明人的情况,包括政治面目、认识的时间、工作单位、家庭和工作地址等都问得很详细,看样子是准备外调的。小组会的温度也不高,中间曾有人喊:“叫他站起来交待!”史忠摆摆手,笑嘻嘻地说:“算了,算了,坐着说也一样,别叫他站起来了。”可能因为史忠是主任的秘书,他一说,也就没人再喊了。

没想到,过两天,小组会又回到徐逸人的问题上来了。不过,“徐逸人反革命集团”降格为“你们那个小团团”。

小组会一开始,韩部长就老调重弹:“我们并没有给你们定性,没有定徐逸人是反革命,也没有定你是反革命。可是你们那个小团团,说的话,干的事是革命的吗?我们就是要你交待你们那个小团团说的危害革命的话,干的危害革命的勾当。”

基调一定,加上有以前揭批“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余威,群众情绪马上调动起来了,呼吼喊

叫、拍桌子瞪眼。有人大吼：“叫他站起来交待！”我没有站起来。

这一次没有史忠等外单位的人参加。

韩部长亲自发话了：“我们和他讲道理不搞逼供信，不要给他提供借口，叫他坐着讲！”

这次小组会仍然没有收获。

会后回到住处的时候，郭游已经搬走，一个背着大枪的战士站在门口，我被武装看管起来了。

我非常愤怒，前几天丁主任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怎么这样对待我！不但隔离审查，而且派上了武装，这不是当真把我当成反革命了吗！我要找丁主任，请他说清楚，到底为什么这样搞！

我放下记事本就往外走。

看管的战士慌忙拉住我，说：“你要出去，得宣传部首长批准。”

我说：“我去找政治部主任，也需要宣传部首长批准吗？”

战士很着急又有些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我不知道，连队首长就是这么交待的。要不，你回屋等等，我去报告宣传部首长。”

看到战士无可奈何的样子，我有些冷静下来了。不能为难战士，他是在执行命令。

我回到屋子里，努力平静自己的心情。冷静地想一想，现在就是找到了主任，也没有多大用处。搞运动的一般规矩我知道一些。每次运动各单位都有完成的指标，首先由基层党组织研究，提出本单位的名单，报到上一级的党组织，在兵团就是报到直政处（机关党委），机关党委根据各单位报上的名单，经研究后提出直属队的名单，报到兵团五人小组，在一般的情况下，兵团五人小组不会改动。运动中的一般情况，譬如揭批的方法、程序等等，只要不是严重违反政策的，五人小组也不会过问。从前几天的小组会的情况看：史忠（丁莱夫的秘书）参加过两次会，“徐逸人反革命集团”降格为“你们那个小团团”，韩部长声言“我们不搞逼供信”，制止罚站、动手动脚等情况看，丁主任已经了解了宣传部小组会的情况并做过交待，武装看管这类事情，可以用多种理由说明它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丁主任也不好干预。“三反”时，我曾参加过打虎队，参加过对重点人的批斗，有三个重点人也曾被武装看管，运

动后期复查，不是“老虎”，放出来，向本人道个歉也就完了。反正，定性反革命，必须有事实根据，而事实是无法改变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我没有问题，韩部长就是费尽心机，也无法把我打成反革命。

道理是这样，但在实际生活中，那段日子对我真是难以想像的磨难。首先是周围群众的冷漠和自我心灵的孤独感。本来政治部的人都熟悉，不少人还是好朋友。可是自从给我派上武装“警卫”以后，好像全成了陌生人，有的还极力躲避我。每次到食堂吃饭的时候，不论我坐在哪个位置，人们都避开那个桌，即使别的桌坐满了，加个座，也不到我坐的那个桌。有一天午饭，我从山坡住处下来，快到食堂的时候，文工队长一路哼着小调从山下走上来，两人快走到一起了，他猛一抬头看见了我，扭头就往回走，直到我打完饭，开始吃的时候，他才来到食堂，坐到远离我的一张桌子上。这个人过去和我的关系很好，因为我懂一些文艺创作，他写的歌词常常找我帮他修改，节目采排的时候也常常找我去看，我们很谈得来，可以说是知心朋友，可是现在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种情况使我精神上很受刺激，也感到一丝悲凉。从理智上说，我对大家对我冷漠甚至躲避的现象能够理解。党组织确定我是运动的重点，而且是需要武装看管的重点，想必问题很严重。人们出于对党的信赖，对党组织确定的问题严重的重点人，很自然的在思想上划清了界限，还有些人也可能为了避免“敌我不分”的嫌疑有意地躲避我，这些都可以理解的。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不是一般的运动，是肃清反革命的运动啊！政治部这些人，特别关系密切的一些人，大家一块出生入死多年，彼此对对方的情况——从日常言行到战斗的表现和历史情况都了解，这个人怎么可能突然变成了反革命，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怎么能用对待反革命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志！这本是正常的思维逻辑，可是当时我却看不到这种正常的思维逻辑的反映。相信党无疑是对的，但相信到失掉独立思考的程度就有点可悲了。

大约过了半个月，晚饭时间，去食堂的路上，政治部协理员冀连波从后边赶上来，小声地说：

“我刚回来,放心,没事。”说完,就急步走到前边去了。

冀连波原是兵团的摄影记者,我们俩关系很好,他透露这个“简讯”无非是想解除我的思想包袱,但他是党政干部,不能划不清界限,所以才采取不易引人注意的“短促突击”的方式。

这则“简讯”真的燃起了我的希望。倒不是“放心、没事”四个字,我知道自己“没事”,在这上头从来也没有不“放心”,而是“我刚回来”这个讯息,说明冀连波出去外调了。经过外调查清真相,事情总该做个了结吧。

果然,没过几天就通知我搬家。

但,不是搬回我原来的住处,而是搬到直政处集中看管重点审查对象的地方。这就意味着,事情不是即将了结,而是要进行更长时间的审查。我心里燃起的那点希望破灭了。

我坚持对运动中的问题讨个说法,韩部长被迫在宣传部召开了一句话的小组会

直到1956年6月上旬,保卫部新来的杨部长找我谈话,告诉我,对我审查结束,因为没有问题,不作结论。一句道歉的话也没说,只是宽慰我:“不要背思想包袱,回部里以后好好工作。”我不知道他这句“不要背思想包袱”的涵义是什么,听了这种官腔官气的话心里很不舒服。

回到部里以后,给我发了新军装、军衔肩章,还按新标准补发了工资。至此,兵团直属队各单位的肃反运动全部结束,转入正常工作。

一天,兵团政委王平找我谈话,在政治部的办公室。

当时,我不知道中央军委已经下命令,调王政委到志愿军总部当政委,大概他是在离开兵团以前找下边的干部了解一些情况,听听下边的意见。

王政委自己不吸烟,把一盒大中华推到我跟前,说:“听说你对这次肃反运动有些意见,找你谈谈。”

因为王政委是老领导,我和他说话比较随便。我说:“我对肃反运动没有意见。搞群众运动是共产党的老传统,现在我们国家法制还不健全,通过群众运动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纯洁革命队伍是完全正确的。我有意见的是宣传部的搞法。”

王政委笑了,说:“我不是要你写文章。你有什么意见就直截了当地说吧。关于徐逸人的问题就不要说了,在这件事上,我和丁莱夫同志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了解徐逸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认识。这个人年轻,有才气,有魄力,工作上一直表现不错,但有些骄傲自满,不虚心。在我跟前他没有使过性子,工作上是有力的,但和政治部的几个部长特别是和丁莱夫同志关系处理得不好,对丁莱夫同志的领导不够尊重。不过这些属于工作关系问题,组织纪律观念问题,在肃反中搞‘徐逸人反革命集团’,还把你当成了骨干分子批来斗去,是不妥当的。徐逸人在国内的情况我也了解,这里转去了不少材料,可是解放军报社那边,对于徐逸人,连小组会都没有开过,说明人家领导运动政策水平比我们高,这件事,通过运动总结,领导要有个说法,今天就不说它了。对其他方面,就你了解的情况,谈谈你对兵团直属单位肃反运动的看法。”

我直言不讳地说:“我觉得兵团直属单位在这运动中掌握政策有偏向——‘左’,入朝以后我在兵团参加过两次运动——三反和肃反,这次肃反我是被批斗的重点,对此感触颇深,三反时我是批斗别人的,也有这种感觉。好像越‘左’越革命。若是被批斗的人说实话,就说你态度不老实,加强火力,逼你低头认罪。若是参加批斗的人说实话,就说你态度消极,提高你对运动的认识,调动你



1953年徐逸人在朝鲜

的积极性。在运动的高潮中,群众有过激情绪可以理解,但如果运动的领导人也持这种偏激的态度,就可能产生很不好的后果。我所知道的兵团直属队的肃反情况,除了徐逸人的问题以外,还有和我一起被隔离审查的司令部见习参谋吴安,对他的审查更离奇。他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司令部工作,不久就赶上这次运动,叫他交待问题,他没有反革命活动当然交待不出来,批斗者就用劈杈

子逼供,他为了不受皮肉之苦,仿照志愿军报上登的反革命案例,编造了自己参加过6个反革命组织的“罪行”。调查人员跑了大半个中国,结果一件也没有证实。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肃反运动的骨干竟然不看每天刊登肃反案件的志愿军报,小吴交待的6个反革命组织都是报上的,如果看报,就会发现他的交待材料是假的。即使不看报,按常识推断,他一个军校学员怎么可能参加分布大半个中国的6个反革命组织的活动,时间和交通条件都没有可能。在小吴这件事情上,不但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是缺少理性思考,主观推断加上野蛮逼供,怎么能不出假案错案?”我心情很激动,我说:“值得注意的问题,不在伤害了几个干部,而是这种不讲实事求是的‘左’的做法对党风造成的伤害。每次运动以后,对运动中出现的偏差甚至严重的问题,都是由组织承担责任,而造成偏向或问题的积极分子,因为是响应号召,个人不承担责任甚至被提拔重用,官运亨通。所以有人讲怪话,说我们在运动中培养出一批‘运动健将’,穿着钉鞋蹬着别人的脑门往上爬。别人头上流血的时候,他却青云直上了。会看风、会整人的人得甜头;不看风头说实话的人吃苦头。”

王政委的脸色很不好看,问:“这话是谁说的。”

我说:“你不要问是谁说的,这话由我说出来就是我也有这种看法。你是老领导,在你面前我不能隐瞒什么,更不能欺骗你。即使我的意见是错的,可以供你作参考。”

王政委的脸色缓和了,点点头说:“说真话就好。我知道你,说话直来直去。找你就是想听听真话。”

和王政委谈话以后不久,政治部召开了营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扩大部务会,部署政治部在肃

反以后的工作安排,包括肃反的善后问题。丁主任讲话以后,我提出一个意见:运动中用武装看管我七八个月,这是为什么?组织上掌握了什么证据?那怕一封诬告信也可以,诬告的事情一时查不清,为防止意外,用武装看管也说得过去。如果没有任何证据,就长期进行武装看管,这符合肃反运动的哪一条规定?我要向领导讨个说法。

丁主任说:“运动中你找我,我们谈过这件事,你的问题主要是由徐逸人同志的问题引起的。我始终没有说徐逸人同志是反革命。但有时我说话不够冷静,可能对下边有影响。作为政治部的领导,主要责任在我。”

组织部孙部长说:“徐逸人同志工作上是有缺点,可是运动中那种搞法是不妥当的。”

丁主任说:“是啊。这件事主要由我承担责任。韩福贤同志在运动中是积极的,就是有些偏激。”

我说:“我不同意丁主任的看法,什么叫积极?在运动中敌我不分,硬把自己的同志当成敌人打,这能叫积极吗?如果我和韩部长换个位置,我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硬说他是反革命分子,连续的狠批猛斗,然后再长时间地用武装看管起来,韩部长会作何感想?”

丁主任略沉了一会儿,说:“韩部长要向徐孔同志道歉!”

韩部长执行领导的指示从来是及时的。政治部部务会议以后,就在宣传部办公室召开了党小组会议,韩部长坐在最前边、靠门那张办公桌后边。小组的党员到齐后,韩部长满脸通红,脖子也显粗了,粗声粗气地说了一句:“我向徐孔同志道歉!”说完起身就走了。几个参加小组会的人都感到茫然,怎么只说了一句小组会就结束了!我却能想像出韩部长说这句话时无奈而愤怒的心情。

我这个人思想简单,说话作事,过后就完,不记后帐。运动中批斗我的时候,我确实对韩部长很不满,憋着一口气,一定要讨个说法。可是韩部长道过歉,尽管是被迫的,带着明显的情绪,但终究说了一句“我向徐孔同志道歉”,这事也就过去了。我丝毫也没想到,韩部长对我这股子怒气一直带到反右运动中。

(本文据作者回忆录摘编)

(责任编辑 萧 徐)

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

——《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序言

● 李 锐

廖伯康同志以自己的坎坷经历，花两年写出了《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萧李廖案件”》；通过这个地方典型案例，反映了他所经历的这段当代痛史。

“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多少人？我没有看到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只看到几个推算的数字，有说三千万的，有说四千万的（我的有关文章引用过这个数字），各有各的推算根据。如果不说全国，只说某一个地区，号称天府之国历来富裕的四川省（那时还包括重庆），却有颇为精确的数字。即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1000万。

这个数字是伯康在回忆录中提供的。他说明了这个数字的文件根据：1957年的《户籍年报》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有关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差正好约1000万。统计数字中一条人命只不过是1，这是太高的抽象，回忆录中还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例证。如雅安地区荣经县县委书记说的：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尸的人也没有了，只得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这些人挨着饿挖坑，是重劳动，也死在坑边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来埋这些人。这是一页怎样腥风血雨令人战栗的历史啊！

问题的严重还不只是饿死了这样的人，而在于当时四川省委的个别领导人封锁饿死人的消息，继续调运粮食“支援兄弟省市”，以致到了1961年、1962年还在饿死人。“大跃进”不是四川一省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正如中共中央第二个《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的，是“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指标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在这一场遍及全国的巨大

灾难中，四川（还有河南等省）是全国最突出的重灾区。其所以如此，就不能不谈到当时四川省委和中央西南局的那个主要负责同志了。1958年、1959年那两年参加中央的会议，我是有亲身感受的。“抬轿子”抬得最起劲的，是长江上中下游三个人。尤其是上游的这位，跟得最紧，对推行极左政策措施特别起劲，特别卖力，对于农业的破坏也就特别严重，实际造成农业的减产。在农业大放“高产卫星”，虚报产量的时候，他也不怕把牛皮吹得大。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田家英在四川农村作了调查，就同我谈过他在乡下挨饿的情况。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就批评他，不同意他的调查。后来更是硬充好汉，根据虚报的增产数从四川调出粮食，使广大农民失去赖以维持生命的口粮。这就是当时四川饿死上千万人的直接原因。出了这样大的可怕问题之后，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对策仍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的表现。一些人对此忧心如焚，为了使事态不再恶化，为了把众多的饥民从死亡上救出来，他们想方设法向毛主席写信，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要知道，当年大刮浮夸风、大报粮食高产卫星等虚假现象，在庐山会议之前，中央早有察觉。因此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其中提出了一个“讲真话问题”，说“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为了鼓励讲真话，毛主席还这样说道：“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问题出在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终于导致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1962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正视现实，发扬了一下民主，刘少奇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让各地总结“大

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而且还强调要实行“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回到四川，仍然不肯面对现实，仍然捂盖子，对存在的严重情况仍然轻描淡写，仍然强调“反右倾”斗争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市的三个领导干部萧泽宽（市委组织部部长）、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市委书记），于1960年上半年，分别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中央反映了四川饿死人等真实情况，以及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霸道作风。他们为使灾情不再扩大，挽回一些损失，真可说是忠心耿耿，为民为党为国而进言。可是，这就触怒了四川省那位大权在握的主要负责同志，随后借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之机，秋后算账。这次全会是毛泽东继续向“左”倾道路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文革”提供了理论武器和前期运动准备），于是他们三人就被打成了“萧李廖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之初公开批判时，又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他们经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这方面有些具体记述，将是研究“文革”史的资料。

作者在记述“文革”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以为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象，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回忆录中对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着墨甚多，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当时专制体制的可怕，及其惯性运转的力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59年庐山会议时，同田家英、周小舟闲谈，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周小舟还曾当面向毛主席说过这一感觉。他们三人落难，既有

全国背景，更具有四川特色：好端端一个天府之国被搞成饥饿之乡。50年代到70年代，在长时间“左”倾高压路线下，从党内到党外，从中央到基层，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平民，都有人不同程度地不断地抗争、抵制、谏议，虽然绝大多数被扼杀，遭迫害，付出了沉重代价，却为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时期的到来打下了群众基础。

历史总是在种种光明与黑暗、正确与错误中曲折前进。对历史尤其痛史不能回避，也不应淡化。因为只有深刻了解了过去所犯的错误，走的误区和弯路，我们才能加深对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自觉性；同时，对当前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以从历史镜子里见其影子，从而提高识别力，注意防范，推动改革。历史的教训被正确认识，就会成为精神财富。我们对过去的痛史，决不可掩掩盖盖，怕痛怕丑，忌讳多端；应该留给世人和后代以真实的信息，让大家都聪明一点、坚强一点。如果当代人淡忘了刚刚过去的这段痛史，后来人不知道这段痛史，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不论东方西方，近代现代，重温历史，对比今昔，成败关键之一在于是否有一个民主的制度，有一套科学决策的机制，有独立的法治体系，以保证国家、社会正常生活的运行，以保证执政党正确路线的执行、运转和发展。否则，很多事情会被扭曲。如我们经历过的人治代替法治，专制压倒民主，主义信仰变成神学宗教，党的崇高威望成为个人迷信工具，铁的纪律成为整人的手段，最杰出人物做出最荒唐事情，这难道不是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吗？难道还不应当彻底转变过来吗？

为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认为，关键之一在言论自由。这本是宪法实施、政策规定中的应有之义，但又成了建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历来有张弛，有严无宽，乃至以言定罪。过份强调舆论一律，自然唯我独尊。一花独放，导致百花摧残，毒草肆虐。不实行遵守宪法的言论自由，不解放思想，就谈不上先进文化。言兴邦昌，言灭国亡，这是古人都知道的真理。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谈言论自由。马克思主义也只能在实践中，在自由评价和自由研究中，得到检验，得到比较，其错误者纠正，其正确者发展。

伯康在耄耋之年，怀忧国忧民忧党之心，回首往事，着眼未来，叙述出一个重要地区、一个重要时期的真实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探求历史规律，以告世人和来者。我拉杂地写下一些读后感，相信读者会感谢他写了这样一本回忆录的。（责任编辑 方明）

陈独秀一案有了新说法

● 冯东书

过去一谈起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从中共“一大”到“五大”连任五届的总书记陈独秀,就说他是造成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是“托派”,并被开除了党籍。他的名字一直只能排在中国共产党的坏人之列,绝不能和毛泽东等其他领导人并提。因此,有人称陈独秀问题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大案。

可是,2003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即3月2日,新华社发了一条新闻——《全国政协委员有五十余位名人之后》,新闻列举的名单第一部分是“已故中共领导人之后”,其中有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之女邓楠等人,也有陈独秀之孙女陈红。陈独秀终于堂堂正正又归入了中共领导人的行列。

陈独秀之冤

新华社是党中央的喉舌,作出这样的报道,



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主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等参加了大会,图为大会开幕的情景

当然是有根据的。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同志以答《百年潮》杂志记者问的形式发表了一篇重要谈话(登在《百年潮》2002年第10期上)。他在介绍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陈独秀的新评说时说:“要肯定陈独秀从建党直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劳的。”“他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一直是党的主要领袖。他那时的威望盖过了其他任何人。”石仲泉说,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

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抠掉了“投降”两个关键性的字呢？石仲泉说：“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即所谓‘三次大退让’，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为什么会都是受苏联共产党（当时称“联共（布）”）领导的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呢？石仲泉说：“由于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上下级关系），年幼的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组织上有服从的义务（似应是有服从的纪律），同时又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独秀有没有责任呢？石仲泉说：“一些重要的决策尽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经过中共中央或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个系统来贯彻执行的”，“因此，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我看来难以说得通。”

闹了半天，陈独秀犯的是没有识别和抵制住来自莫斯科制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错误的性质是执行者的错误。错误的根子都在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要把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下级执行者严格区分开来，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应是错误责任的主要承担者。

当家做不了主的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内一直有人为陈独秀鸣不平，因为他这个总书记是被共产国际捆住的，大事由不得他。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大大地暴露了陈独秀这个总书记难当得很。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下来一年是147.6个决议，也即平均两天半一个。这么大量的决议、指示像雪片似的从莫斯科飞来，有的是直接给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过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共中央的。大事如孙中山在世时为实现国共合作，要共产党员

加入国民党，小事如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都有指示。一直到武汉的汪精卫也随着蒋介石反共以后，中共中央已派出周恩来去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了，莫斯科还发来由斯大林亲自决定，由布哈林签名的阻止武装起义的电报。这就是前几年大家从电视里看到的当年张国焘奉命匆匆赶到南昌阻止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周逸群、叶挺等群起而攻之这件事的真相。恽代英当时气极，捎带把共产国际也骂了一顿（电视里只骂了张国焘）。

陈独秀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苏共中央用这么多决议把他捆住，还派了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督促他执行，他受不了，曾发过脾气，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但是他是共产党员，有铁的纪律管着，下级要服从上级，没办法，有些大事有不同看法，也得服从莫斯科，只好当一个当家做不了主的人。结果出了事，反而叫他来代苏共中央受过，太不公平了。当时，陈独秀和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被杀，其中也有陈独秀自己的儿子，都非常痛心，非常需要上级的关怀，希望莫斯科有革命同志的感情，共同来总结教训，想出新办法，以挽救革命。结果却是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共产国际的代表召开“八七会议”，甚至不敢让陈独秀参加会议。陈要到会上来，把莫斯科来的决议指示都实事求是地摊出来，会还收得了场吗？于是只能缺席审判，把陈独秀搞下去了事。

陈独秀的罪名是斯大林定的

陈独秀的罪名具体是谁定的呢？

我手里有一本2001年5月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易礼容纪念集》。易礼容是毛泽东在长沙创建的新民学会里的小弟弟，1921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创建了湖南第一个党小组，1927年4月出席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到处杀共产党员。陈独秀5月23日在武汉对易说：“长沙‘马日事变’，已成白色恐怖，省委的人走了。昨天，

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你回湖南负责。”他去当军委书记。6月中旬,毛泽东回到湖南,任省委书记,他协助毛工作,仍当军委书记(当时还一个兵都没有)。8月1日,毛泽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去武汉参加“八七会议”,易留下任省委代理书记。毛泽东刚走,8月4日,共产国际从武汉来了两个苏联人,住在长沙苏联领事馆,找易礼容、夏明翰等人开了一晚上会。中心议题是提出要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这时“八七会议”还没有开,中共中央还没有说话,他们就风风火火地跑来指挥一个省委打倒自己的中央总书记,这是什么意思?陈独秀又没有叛变,没有退缩。易礼容等人想不通,问这两人:“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难道要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当时‘国际’有指示(指要求中共中央不能和蒋介石、汪精卫分裂的那些指示)。”“‘国际’代表就无责任?”易等人拒绝了这一非分要求。会议不欢而散。苏联人回了武汉在“八七会议”上就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毛泽东在会上驳斥说:“临时省委是在血滴滴的前线和敌人斗争,你们在租界开会,说风凉话(当时武汉有外国租界,国民党不能管)。”毛泽东8月12日返湘,把“八七会议”情况告诉了易礼容,之后就去搞秋收起义了。“八七会议”陈独秀下了台,易礼容也被撤了职。易礼容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1997年去世,这是他口述的情况。

为什么共产国际的人要亲自出马风风火火地去组织人打倒陈独秀呢?

2001年第8期《百年潮》杂志刊登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回忆录中的文章:《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杨尚昆1926年到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办的中山大学学习。他在文章中说,1927年整个3月份,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不得不服从群众的革命意志”。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个星期,即4月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话音刚落,4月12日,蒋介石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消息传来,中山大学像遭了一场大地震。5月13日,斯大林又到



陈独秀

中山大学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宁(南京蒋介石控制的部分国民党、当时被称为国民党右派)、汉(武汉汪精卫控制的部分国民党,当时被称为国民党左派)分裂,“事实上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斯大林要学员仍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没有右派”,“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又是话音刚落,7月15日,宁汉合流,武汉的汪精卫也跟上蒋介石反共了。这一下,斯大林怎么办呢?7月28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导致中国大革命失效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杨尚昆在文章中说:“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这就一下子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当然要马上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制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对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好审判

陈独秀这个替罪羊了。

斯大林这样做,当然引起最了解情况的中山大学学员的不满,于是在以后的“反托派”斗争中他们倒了大霉。杨尚昆在文章中说,中山大学在后来苏共的清党、清团中给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扣上了“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的帽子。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是“托派嫌疑分子”,被开除团籍,到工厂劳动。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等也去工厂劳动改造,还有三十多名“主要分子”被逮捕。

这就是铁的事实。

事实是最有力量的

斯大林在位时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是独裁者的狂言。他当时掌握着苏联的党政军大权,但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只是一个暂时的掌权人。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只承认事实,事实才是最有力量的。他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就揭了他的盖子,他掌权时组织人为他写得处处正确、事事正确的《联共(布)党史》很快被否定了,他的遗体从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里被撤了出来,从苏联到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把他的塑像拆掉了。斯大林为自己写的光荣历史就此结束。

应该说,对陈独秀问题最自信的是陈独秀自己。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年末日军占领南京,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去拜访他,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但要求他写一个书面检讨。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为什么呢?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许多人都觉得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定了的事,是铁板钉了钉的。他却认为还在未定之数,他不认为斯大林不实事求是的话最后会算得了数。他真是个有自信力有远见的大哲人。实际上,当时就是他写了检讨,他也去不了延安。想让他去延安是新的党中央的一片好心。那时斯大林还在台上,还是伟大领袖和导师,共产国际还没有解散,苏联还在反“托派”,陈独秀问题是一个大禁区。新的中共中央让陈到延安去,这么大的事靠一纸检讨怎

么敷衍得过去?延安当时就有人提出了陈独秀不能去。康生还造了一个谣,说陈独秀是日本持务,每月拿日本人300元(此事连国民党也不信)。

时间对斯大林是不利的,对陈独秀是有利的,到一定时候,人民是会拿事实来说话的。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陈独秀生活潦倒,但是绝不让自己染上污点。就在抗日战争前国民党还把他抓了起来,为他辩护的律师在法庭上讲,他已经不是共产党的人了,放他出去,有利于分共。陈独秀听了,拍案而起,大义凛然,不同意律师的说法,还大讲了一通共产党的主张,大骂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俨然是开除了共产党党籍的共产党人,结果被判重刑。后来,国共合作抗日,人们奔走营救,才提前释放。他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和成立以后,他就几次被捕,从不低头,早期孙中山还组织人营救过他。抗日战争时期,他生活潦倒,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有的做了国民党大官,送钱来,他一分不收。他说收了就说不清了。周恩来让他有困难到重庆去找自己,他也不去。最后贫病而死,一身清白,受人敬仰。

他有信心,历史会给他公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突破陈独秀问题禁区的呼声越来越高,终于结出了今日之果。

陈独秀在当中共领袖前,是革命的播火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革命家。在担任中共领袖以后的六年里,他的实践也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正是他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迅速地成熟起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想领导好中国的革命,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实际,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走自己的路,对一切外来的意见,要认真听,但绝不能盲从,要独立判断,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当时斯大林和苏共需要的是一个驯服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严加控制),因而对中国共产党独立思考的态度是不喜欢的。但是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胜利了,为中华民族洗净了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耻辱,扫平了国内军阀,建立了真正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也只能承认现实了。

(责任编辑 吴 思)

丁陈“反党小集团” 冤案的两个谜底

● 徐庆全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

近年来文艺界一些参与处理此事的当事人,写出一些回忆文章,对这一事件有了大致的描述。但是,亲历者在有关丁陈冤案两个关键问题上,说的并不清楚。这两个问题是:一、在中宣部为丁陈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上,为什么没有作协党组书记、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署名?二、1957年6月6日作协召开的处理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周扬何以带头向丁陈道歉?

为了弄清丁陈冤案形成的真相,本文试着就这两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文艺界的老前辈和文学史研究专家。



1946年丁玲在温泉屯留影

为什么给中央的报告没有周扬署名

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问题何时提出来的?曾长期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黎之回忆说:

1955年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后不久,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7月下旬,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黎之:《文

坛风云录》)

黎之所说的“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是刘白羽,而“党总支书记”则是阮章竞。刘白羽和阮章竞联名的报告,则来自康濯。曾长期担任作协秘书长的张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回忆说:

反“胡风反党集团”时,作协《新观察》编辑部的戈阳提出,我们党内有一股暗流,反党,点了舒群、罗烽、白朗、丁玲、陈企霞等人的名字。

丁陈集团的事情,主要是康濯的揭发。康濯写了一个材料,说丁陈搞独立王国,并把材料送给了刘白羽。去年(指1998年——引者)刘白羽

找我去回忆时,我说,我听说有这么个材料,但是当时你没有给我们看。当时,刘白羽看了材料后对阮章竞说:康濯有一个材料,要转给陆定一部长,你在上面签个名。也是去年,我与阮章竞回忆这件事时,老阮说,当时也没有看这材料是什么内容,当时刘白羽让签名,我就签了。这个材料,就直接送给定一同志。定一同志签名把这个材料送了上去。周扬同志没有看到。毛主席看了材料后,就批下来了,却让周扬同志执行了。后来,周扬同志说起这个事,并没有说明这一情况,既没有把责任往上推,也没有把责任往下推。(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

黎之和张僖都是知情人,周扬当时没有在这个报告上署名的事实,是可以认定了。

认定这样一个事实后,困惑随之而来。丁玲的丈夫陈明也与我们有同感:

对批丁玲,首先是作协写了报告的。奇怪的是,一、作协的这个报告,不会是6月才写的,它肯定有个酝酿过程。它是否经过党组会议集体讨论通过了呢?二、这个报告是副书记刘白羽、总支书记阮章竞签名,而党组书记周扬为什么不签名?周扬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同意不同意?参加酝酿了没有?三、报告送到陆定一那里,陆也不能不问周扬。陆向中央打报告时也只用陆定一的名字,而周扬是中宣部分管文艺、领导作协的副部长,从中宣部角度看,你周扬应该签名啊,不署名是不正常的。(邢小群:《是谁整丁玲——陈明访谈》)

那末,为什么周扬没有在这个报告上署名呢?

这要从当时的大背景来考虑。

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随后在全国大规模开展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群众运动的前奏或序曲。这年的6月1日,毛泽东为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查处胡风分子的报告》写信给陆定一,信中要求:各地各单位“注意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处理此事。”

6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揭露胡风集团的指示上作了批语和修改。在修改中指出:各省

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的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

6月18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指示稿上作了修改和批示。毛泽东的一系列的指示,把反胡风集团的斗争迅速地扩大为全面的内部肃反运动。

中国作协先走了一步,大约在毛泽东6月1日批示前,就率先成立了五人小组:

作协五人小组组长是刘白羽,组员是严文井、阮章竞、康濯和张僖。五人小组的分工是这样的:刘白羽同志抓总。严文井同志负责从作协出去的所有文字,他对文字抠得很细,无论从政策的把握还是用词的分寸上,他都很有经验。阮章竞是作协的总支书记,负责主持作协内部的各种批判会。当然,大型的会议还要周扬或刘白羽来主持。康濯负责《文艺报》、文学讲习所和作家支部。我负责抓日常工作。(1999年12月22日采访张僖)

稍后,中央成立了肃反领导小组,组长是陆定一。中央宣传部成立“五人小组”,常务副部长张际春是组长,刘白羽是成员之一。

熟悉当时历史情况的人都知道,从中央到地方迅速成立起来的“五人小组”,是肃反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虽然是以“小组”而冠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基本上取代了各单位的正常的领导程序。在我采访张僖老人时,他对这一点仍然记忆犹新:

那时候,作协党组的活动基本停止了。当时的党总支就是五人小组的办事机构。五人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同时也就要审查作协机关和所属单位所有干部的历史。

作协肃反“五人小组”,是在以张际春常务副部长为组长的中宣部的“五人小组”和以部长陆定一为组长的中央肃反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作为作协“五人小组”组长的刘白羽,

肃反工作是要直接向陆定一和张际春请示汇报的。了解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后来要由张际春而不是周扬来负责审查丁陈问题的专门小组的工作。

在作协的肃反审干中,丁玲的历史问题、陈企霞的托派嫌疑,都被翻腾出来了。随之,1954年到1955年初的批判《文艺报》事件也连带着出来了。于是才有了前面所提到的张僖回忆中的康濯写材料揭发丁玲的事情。

在“党组的活动基本停止了”的情况下,康濯的揭发材料应该交给谁?不是周扬和邵荃麟、郭小川等作协党组领导,只能是刘白羽。

康濯是作协肃反“五人小组”的成员,而刘白羽是组长。康濯把材料送给组长刘白羽,刘白羽签名后,又让既是五人小组成员又是作协总支书记的阮章竞签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作为既是作协“五人小组”组长又是中宣部“五人小组”成员的刘白羽,不经过党组成员的讨论,把材料直接送给中宣部部长兼中央肃反领导小组组长的陆定一,而不送给主管文艺的副部长、作协党组书记周扬,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理解了这一点,前引陈明一系列“奇怪的是”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

周扬向丁玲、陈企霞道歉,是中央反右的部署

1957年6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了讨论“丁、陈问题”的处理的扩大会议。会上,周扬和党组几个领导人在讲话中主动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不应该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并向丁玲等表示歉意。陈明在回忆中谈到此事时说:

1956年,丁玲向上级申诉,得到中宣部党委会的受理。1957年春天,毛主席“到处游说”,游说的内容是整风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指出整风主要是批评:一是主观主义,一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就是1957年作协党组第二次扩大会议的背景。在这次会议上,周扬等承认1955年批丁玲是错误的。如果作协党组真的能执行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或许能多少纠正自己造成的错误,减轻对党和对同志的危害。但他

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趁“反右”之机,把丁玲的申诉诬为“翻案”,是“向党进攻”。

亲历此事的原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珪回忆说,周扬等人赔礼道歉后,招致了丁玲、陈企霞的质问,这时:

领导者们对所提出的问题无法解答,但又不愿接受大家的批评。会议因此出现僵局,宣布暂时休会。……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原来是发动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纠正错误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党向党提出尖锐批评意见的人进行反击的“反右运动”。本来,从整个社会来说,有人想趁党整风之机,借提意见为名,企图否定党的领导,这确实有的;对这种情况给以反驳,完全应该。但从党内来说,也有人想借此机会,对曾经有过不同意见的人,置于敌对地位,予以打击,这就同党的政策相违背了。这样做显然是错的。

而作协党组在重新研究、讨论丁玲反党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如何继续时,正是由于对领导批评的意见很多,会开不下去,寻找出路而不得的时候,“反右”斗争的开展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于是借以进一步批判丁玲等向党的新“进攻”似乎就有了根据。(李之珪:《不该发生的故事——回忆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

陈明的回忆,主要是两条:其一是说,6月6日周扬等人向丁玲道歉,是执行毛主席“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指示的结果;其二是说,后来整丁玲,是借反右之机。李之珪的回忆则更明确地说,周扬等人是抓住了“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机。

其实,6月6日召开的党组扩大会议的背景已经变了,周扬等人向丁玲道歉的举动,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是对的,但绝不是执行毛主席“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指示,而是执行“引蛇出洞”的指示。换句话说,周扬等人向丁玲道歉,不是真的,而是毛主席“阳谋”部署的具体体现。因此,把丁玲、陈企霞打成右派,也不是像李之珪所说的,是在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发生了变化所致,而是在6月6日的会之前,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1957年,中央决定反右时,对右派实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阳谋”,是有着周密准备的。据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一文所说,它实施于“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以可证的正式文件看,应该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据《毛泽东选集》第5卷,此文作于5月15日;而据原稿,此文最初曾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似乎准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很快又改为拟发党刊。最后以文件形式发给“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和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各省市的时间,是在6月12日。在下文即将引用的《郭小川日记·1957年》的记载中,像郭小川这样级别的干部,是6月17日在陆定一部长处才看到这个文件的。当然,在5月下旬,他已经知道了这个文件的精神。此后,6月20日、21日,郭小川又两次看了这个文件。这一举动表明,当时是把这个文件作为反右的指导性文件的。(参见《郭小川日记·1957年》)

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已明确表述了“引蛇出洞”的意图。到5月25日以前,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一连发了三个文件,不公开的动员正在进行。

具体到作协而言,当时只是几个高层领导才在18号或19号了解到《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文件精神。当年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涂光群回忆说:

据我的记忆,作协党内一部分人知道这份文件最快也是在三天之后,即1957年5月18日、19日之际,或稍后几天。因为这时曾对党内少数积极分子进行传达。我不仅听了传达,还受到作协一位领导同志个别关照。所以我成了幸运儿。尽管我响应党的号召,对文艺界整风领导人提意见不落人后,并且发了些带“刺”的杂文,但我已列在保护的范围内,往后只要谨慎行事,不会当“右派”了,这是后话了。而最明显的信号是毛主席5月25日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作协的排头刊物《文艺报》,迟至1957年6月23日出版的一期刊物(第12期)才开始变调,转向反右。也就是说,从1957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作协仍照样进行整风、鸣放,但这时候的做法,不能不带上“阳谋”的味道了,这就是服从上边整

体的部署,让更多的“鱼”浮上来。(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

当年在《文艺学习》编辑部工作的黄秋耘,在回忆往事时,谈到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知道这个文件精神是在5月18日晚上,可与涂光群的回忆相印证:

我记得十分清楚,1957年5月18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家里聊天,……我们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9点20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我知道他马上就要出去,就连忙告辞了。

后来被划为右派的部队作家徐光耀,在回忆中说道,在鸣放时,一些“引蛇出洞”的征兆已经出现,当时作协张光年、侯金镜等人早已知道要反右了:

如果稍许世故一点,我也许能避开这次失足。因为已有征兆,足够使人警惕。是侯金镜又一次来到了大耳胡同,在谈及《文艺报》的内部情况时,他感情复杂地说:“这一回,唐因、唐达成、侯敏泽几个,恐怕要吃亏。他们说了不少‘出界’的话,至今势头挺盛。这么下去,会栽跟头的。”我听了不免着急,问他:“为什么不提个醒儿,帮他们一把?”侯说:“不行啊,你一说,他们会在会上揭你,说你破坏‘鸣放’。”接着他又说,本来他也想说说的,可张光年不让,至此,侯把拳头往腰后一掖,说:“张光年要保持我这个‘拳头’,到时候好用”。恨只恨我那时太自信,太痴呆了,连这么明显的“引蛇出洞”警钟,也未放在心上。

以上几个当事人的回忆表明,5月18日周扬知道这个文件精神后,立即召集邵荃麟等作协领导人小范围传达,开始按照文件精神布置反右了。就整个文艺界而言,从5月下旬直到6月下

旬,作协党组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紧紧围绕着“引蛇出洞”的意图进行的。

在丁玲、陈企霞的问题上,根据郭小川1957年的日记,作协党组作了如下的事情:

5月22日,“十时到荃麟处谈丁玲问题。共同的意见是先不改,交给大家讨论。”

这一举动表明,从1到4月形成的关于丁陈问题的“不以反党小集团论处”的结论,到此为止了;而交给大家讨论的目的,当然是“引蛇出洞”了。

5月24日,“十时到中南海,陆定一和张际春两位部长谈了很久的丁、陈问题。”

张际春是负责调查丁玲历史问题和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专门小组组长,正是在他的主持下,通过查实得出丁陈“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的结论。陆定一此时与张际春“谈了很久的丁、陈问题”,目的是什么,郭小川没有记载,联系到当时的情况,得出是两位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的推论,恐怕是有道理的吧。

5月25日,“九时开碰头会。讨论了机关的整风运动,决定从三个方面动手‘放’起来,即党内、党外、机关,下礼拜起坚决地动作起来。中午,睡至二时半,到迟了。我二时四十五分到,会已经开起来,今天是党组扩大会,讨论机关整风和丁陈问题。”

作协从三个方面“放”起来,说明“引蛇出洞”开始部署了。而下午召开的整风和丁陈问题的会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讨论丁陈问题的第一次党组扩大会。

6月1日,“看来,顾虑已经不多,算基本上放开了。”——“引蛇出洞”成功了!

6月4日,“八时半开始领导小组会议”,“会议讨论了最近的整风情况,觉得已经放了,但还未到高潮,还准备继续放,同时就保护积极分子问题商量了一番”。

或许,从5月25日讨论整风和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开始,一些人已经就在整风中最突出的问题(丁陈问题等)开始“放”了,在这些人



20世纪50年代初,丁玲(左四)、陈企霞(左五)与《文艺报》编辑合影

中,有些被认为是应该保护的“积极分子”也不明就里地说了一些“右派言论”,所以,在6月4日召开的整风领导小组(此时或许应该叫反右领导小组了吧)会上,专门“就保护积极分子问题商量一番”。就这个问题进行“商量”,其目的就是像前引的徐光耀回忆中所说的,要保持好反击时的“拳头”。

6月6日,“下午二时半,开讨论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会上邵、刘、周三人先讲了话,然后是一些人谈感想,然后是一片对周刘的攻击声。陈又乱骂人是做假报告。他说:‘你们是高级干部,你们做了假报告!’会议十分紧张,空气逼人,简直弄得我头都发涨。”

这样的场面尽管使周扬等人比较尴尬,但是,提出尖锐批评意见的与会者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已作为“鱼”被钓上来了。周扬在7月25日复会的讲话也证明了这一点:

前年对丁陈的斗争,包括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和向全国传达,我认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前三次会议上肯定前年会议的同志没有发言,发言的同志大体上都是否定的,有的说斗争

完全错了,有的说基本错了,有的说要追查责任,仿佛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周扬的“前三次会议上肯定前年会议的同志没有发言,发言的同志大体上都是否定的”的话,已经明确说出“引蛇出洞”的策略:肯定前年会议的人不发言,营造一种“引蛇出洞”的声势,专门让那些对前年会议有意见的人“放”出来,然后一网打尽。

6月8日,“愿望实现了。今天的报纸上,第一次大规模打击了整风中的右派分子,《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了。……十时半,到白羽处,陆部长找白羽谈了话,陆说要有韧性的战斗,人家越叫你下去,越就不下去!他认为周扬没有宗派主义,人们不太注意这是一场战斗,文艺方向的斗争,他认为,丁陈斗争要继续,不要怕乱。”

一句“愿望实现了”的话,显然表达了一种压抑许久的心态,这种心态就是为了“引蛇出洞”而“硬着头皮顶着”的委屈感。而陆定一找刘白羽的谈话很直白,就是两个字:“斗争”。

6月13日,“下午开党组扩大会议。丁玲发言,态度尚平和,但内容十分尖锐,极力想争取康濯‘起义’,追究责任,想找出一个阴谋来。……会开过后,周扬、荃麟和白羽一起到我房子内,谈了一下明天的会议。白羽似乎又很激动。看来,会议是到了摊牌的时候了。”

这次会议,就是为处理丁陈问题所召开的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郭小川用“摊牌”一词表明,不用再等复会,丁陈成为右派已经没有异议了。于是,第二天——

6月14日,“(下午)三时,到白羽处,上午他同邵荃麟一起见了陆定一同志,定一同志坚持地认为丁陈是歪风的代表,主张展开一个斗争,坚决把文艺界整顿一下。……今天很兴奋,对丁、陈问题的处理有个眉目了,我一定要迎接这场暴风雨。我把丁、陈看成党内右派。我一定要准备意见去迎击他们。”

到此时,原来参与处理丁陈问题的专门小组,已经不再起任何作用了。想必李之珪也不再参与此事了,所以在他的回忆中,对郭小川日记中所记载的情况一无所知,才得出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之所以休会,是因为周扬等人被丁陈质问,

会议无法开下去,而在休会期间,周扬等人利用“整风形势急转直下”的时机,把丁陈打为右派的结论。

其实,何时休会何时复会与丁陈的质问无关,是中宣部和作协的统一布置。休会的目的,一是继续发动群众,大鸣大放,钓更多的“鱼”;二是像张光年对侯金镜所言,保持“拳头”进行反击。关于第一点,统战部也是这样做的。据李维汉的回忆,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连续开了几天座谈会。5月16日他宣布要休会几天,到21日恢复开会。为什么要休会四天呢?主要是毛泽东开始准备反右派。既然意图已经改变,中央统战部必须按照新的精神部署下一步的活动。座谈会显然不能再按原定方案进行,必须调整为“引蛇出洞”的部署。这就是休会四天的真正原因。复会后,经过休会期间的发动,一些所谓的右派言论也放出来了。(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

作协的休会,与统战部体会的目的是一致的。既然从中宣部领导到作协的领导,大致都像郭小川一样,“把丁、陈看成党内右派”了,意见统一了,到7月25日复会这段时间,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尽量发动群众,揭发丁陈的所谓右派罪行了。

经过周密准备,7月25日复会后,对丁陈开始了猛烈的揭发。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丁陈为右派的报道。9月中旬,周扬作了《不同的世界观 不同的道路》的总结报告。此文后经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以《文艺战线的大辩论》为题,发表在1958年初的《人民日报》上。此后,作为文艺界的大右派,丁玲、陈企霞开始了20多年的流放生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逐步走出了“左”的指导思想的阴影,对于历史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审理,开始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1979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改正的结论并报中央同意,恢复了丁玲、陈企霞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平反。1984年,中央组织部经过重新审查,对丁玲的历史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
(责任编辑 致 中)

秦川,你走早了

● 柯 华

秦川走得太快,太突然,太出人意外了!我和朋友们都悲痛不已!

2003年1月21日,在秦川住院之前,我已经住院一个多月了,他一直没来看我。那天我叫大女儿打电话把他骂一顿,为什么不来看我,结果呢,他用非常微弱、没有气力的声音对她说:“我胃痛得很,老想吐,说不了话啦。”我一听,不对头,立即给阳阳(他的爱女)打电话,叫她赶快送秦川去医院。阳阳说他不肯去;第二次我再打,阳阳说爸爸还是不肯去。我知道秦川这个人很执著、很顽固,就是拿自己的身体、生命,跟病魔做搏斗,现在不愿意去医院,平时也很少去。我不得不第三次又打了电话,叫阳阳以我的名义告诉他爸爸:“柯伯伯怀疑你是肠癌,叫你赶快去医院!”我想这样可以吓唬住他了,但还是没有能够把他吓到医院去。直到当天傍晚六点才去医院,可是已经迟了,已经延误了治疗的时间。第二天我去看他,医生才告诉我,他已生命垂危,最好的可能也是植物人。我们当时想尽办法帮助抢救,找了北京最好的脑科医生会诊,但已是回天无术了。终于到了29日,上午11点我去看他,没想到下午1点,他就走了。这样,2003年1月29日上午11点竟成了我们最后别离的时刻。而且我因腰骨折不能动,连他的告别仪式也没能参加。一生的挚友就这样永远离别了!呜呼,哀哉!

秦川离开后的一段时间,我感到很寂寞。这些年我们都老了,不爱动,见面也比较少了,但时常隔一段时间打个电话。国际、国内,国事、私事,大事、小事,无话不谈。他去世以后,有时我拿起电话来,猛然一想,他已经走了,唉……!

认识秦川是在1940年1月,那时我刚从延安中央党校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工作,秦川比我早到。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但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我们在一起走上了63年难忘的友谊的长征。

我们一起在延安和西安工作、生活了十几年。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我们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个革命圣地度过的。我们的思想、感情也像延安圣地一样纯洁无暇。那时候为什么我们都跑到延安去呢?我们开始时都是民族主义者,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和腐败统治,我们也接受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同时,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受到了当时红军长征胜利的鼓舞,接受了共产党抗日的主张,所以奔向革命、奔向延安。到了延安以后,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洗礼,在那时我们拚命读了马列主义著作,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当时的思想和行为,处理问题的想法,都尽量要求自己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那时候党内生活比较正常,同志间在坦率真诚、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气氛中展开与人为善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间工作和生活的。特别是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我们的思想、作风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改造和升华。毛泽东同志在这次运动中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强调“要发展马克思列宁



秦川(左)、柯华(右)在延安时期的合影

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他一贯强调的“要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要“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等，对我们一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实事求是的一个主要对立面就是极左思想，不实事求是，不考虑实际情况，假、大、空，革命口号提得很高。1947年，在土改的时候，有一股极左倾向，有些地方几乎把所有的地主都扫地出门，把富农的土地财产不按政策乱动、乱分，甚至侵犯了中农的利益。1947年，在河北平山开全国土地会议，西北局团长是李卓然，我也参加了这个团。回来之后正是“左”的风气席卷各地的時候，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说宣传部门都掌握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提出宣传部门都要由工农干部来掌握。我们几个人去找李卓然，秦川对李卓然说，既然如此，宣传部就另找工农干部来工作，我们就不留下来了。李卓然很稳，说先等等再说。工农干部本来很好，但干宣传工作有困难。后来这股极左的不实事求是的风气还是被纠正了。

当胡宗南占领延安时，我们全部都撤退了。当时秦川到了前线负责宣传工作，后方宣传部就剩下我一个人。陕甘宁边区的职工家属怎么办？后方某领导人要把所有家属全部都送到农村。要她们化妆，穿农民衣服，头发戴上发髻。每个农村安排几户，说是要相信群众，在群众中隐蔽起来。可是老百姓脸色都晒得较黑，我们家属脸色较白，发髻如敌人一抓就会掉下来。这样不但这些职工家属的安全毫无保证，而且老百姓也会受到牵连。经过我们和秦川前后方合作和反对，最后才决定把家属全部送过黄河安全地带，不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942年康生搞了个抢救运动，就是要把抗战时期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都打成特务、反革命。陕甘宁边区银行除了行长和他的警卫员两个以外，其他人都打成特务。其它很多机关也搞出来很多特务，但我们这个宣传部就不一样。那时宣传部的抢救运动是李卓然部长和蓬飞（宣传科长）、秦川（党员教育科长）领导的。按照当时的情况，我自然也应是抢救的对象。但是蓬飞和秦川商量并得到李卓然的同意后，由蓬飞找我谈，他说他们受到很大压力，开会时不能不照样叫我坦白交代，但叫我不怕，他们相信我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像宣传部这样实事求是，对于干部敢于负责的单位，不是很多的。抢救运动是康生直接乱搞的。延安和边区一时间搞得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后来还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发现问题的严重，制止继续搞下去，才免去一场大灾难。而秦川同志那时一直是坚持实事求是，反

对抢救运动，对同志敢于负责的。

西安解放后，我出任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秦川仍在西北局宣传部任处长。当时的西安市委书记，借“三反五反”运动之机，毫无根据地把我要打成“老虎”，并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斗争我。秦川带西北局宣传部的几个同志专门来看我，这当然是故意做给这位书记看的，你们要斗柯华，我们偏要来看他。秦川曾被人称作“秦大侠”。这时他什么都不顾，偏偏就要来看我。“秦大侠”的味道在这里也表现出来了。当然，对于我来讲，他不单是秦大侠，我们是互相了解的朋友。大侠可以帮助一个不认识的人，打抱不平，对我不单是这样了。在北京这些年，我多次去看他，常常碰到他满屋朋友，主要是《人民日报》和工业大学的同事和学生，秦川都曾为这两个单位的不少人讲过公道话，敢于保护群众，对群众负责。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拨乱反正期间，他帮助了不少受迫害的同志，甚至有些受严重迫害的高层中央领导人的家属，他亦勇于协助他们平反。秦川这个“大侠”，正是因此获得了人们的尊重和爱戴。这个“大侠”，不单是“仗义”和爱“打抱不平”，对秦川说来，它有着更为广阔和深邃的含义。这就是：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敢于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对革命、对群众负责。

1954年我们同时被调到北京。以后工作和秦川就没有了直接的关系，我搞外交，多半时间在国外。接触少了，但友谊是永存的。

1959年秦川被定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康生讲过“十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顶不上一个秦川”、“秦川这个人不可重用”。很巧，1965年我曾写过一篇外交工作的建议报告，经外交部领导批报中央，康生在这个报告上批了“典型的修正主义”几个大字。为此，外交部连续斗了我三天。后来还是陈毅同志和廖承志同志出来干预，才制止了对我的批斗。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不是巧合，而是必然的结果，我们共同的思想必然会得到共同的回报。

秦川同志，我们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有着共同的欢乐，也有着共同的忧虑，有许多事情我们也很生气，但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我们都坚信中国的革命事业定会继续前进取得胜利，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更加富强，共产主义的事业定会永放光芒！

秦川同志，你安息吧！

（责任编辑 方实）

回首往事说梅益

● 邵燕祥

我在中秋节前一天,星期三的下午,去北京医院病房看望梅益。听到我轻声呼唤“梅益同志”,他已只能微微睁开失神的眼睛,又闭上了。我第一个直觉:一个人就这样走过了他的一生。

听说他每天上午还有一会儿清醒,精神好些。尹绮华就在中秋当天早晨带着他们的儿女前去,这是最后的团圆吧,大家心里明白。

中秋两天后,传来梅益去世的消息。我劝慰尹绮华说,按中国老说法,年登九秩,是该点红蜡烛的“喜丧”了。我不会说话,这样说,对当事人的亲人,可能显得残酷。但我从心里觉得,梅益一辈子活得太累了:少年负笈异乡,从此以国为家,由北平而上海,而苏北,而南京,而延安,在1949年即他36岁以前,先是投身左联,继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备尝的地下工作条件下,亦编亦译,奔走斗争,战后大家只知他是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的发言人,其实那时他还身兼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并广交朋友,保护、解救受迫害的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保护由于各种原因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1949年后的17年,在建设对内对外整个广播体系和开创电视事业的繁巨工作中,他可谓殚精竭虑,紧张劳碌,长时间就住在办公室,入夜还要处理白天未完的事务,终审联播节目稿,等最后新闻播出才休息;直到1966年,他被迫离开了广播局工作岗位为止。文革结束,他已病残,但他以伛偻之身,又工作了十多年。他好像是一个只知工作、不知疲倦的人。

如此高寿,太累了,该休息,或者说安息了吧。

很快我就看到了老记者谢蔚明、刘衡的纪念文章。我想我也该写点什么。从我1949年6月1



梅益

日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报到,知道梅益是编辑部的领导起,已经54年了。他长我20岁,无论依老传统或新传统,他都是我这个“知青”的前辈。我跟他没有密切的过从,但在我一直有知遇之感。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支部扩大会已经开始对我的批判,梅益因要随团访苏去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临行,让胡若木给我捎了个口信,我体会那意思是怕我没经过这样的风雨,而寻了短见什么的。1958年,我划右下放劳改了,秋冬之际,

文秀从乡下回来,偶遇梅益,他问“小邵怎么样”,文秀答了“还好”,又说起她想不通,这时梅益亦庄亦谐地说了一句,“说不定我哪天也会成右派的”,固然意在宽慰,却是出自真心,对那时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置身于“从来天意高难问”之境,怕也不免心怀悚惧吧。

在反右派之后,一步紧似一步,连周恩来也当面听到指桑骂槐,说“右派的进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地方,只剩了五十米”云云,梅益当然听到这话,自不能不惊心。抗战初期,梅益从1937年12月,在上海先后负责中共地下党组织主办的《译报》、《每日译报》的编辑,又创办或与人合办《华美周刊》、《译报周刊》、《求知文丛》和《上海一日》,进行了有力的抗日宣传,当时就是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分管上海的工作,对梅益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

也许正是因此,抗战刚一胜利,1945年9月,梅益就奉中央指令由苏北返回上海,负责筹办《新华日报》;1946年初,到南京梅园新村,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

1949年后,梅益是参加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例会的。他在编辑部所传达,除了来自中宣部和胡乔木的以外,多是周恩来的话,有些毛泽东的意见,也是经由周恩来转述的。广播事业局是直属单位,周恩来又管得十分具体,我记得有个假日晚上我在宿舍,梅益找我替他赶抄一份要求为发射台拨款的急件,就是他写给总理的报告。

在可能是由社科院印发的《梅益同志生平》中,特别提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在天安门城楼主持了盛况转播工作”。据我所知,从那以后,每年“五一”、“十一”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或群众游行实况转播,梅益都要亲自过问、定稿,采编由杨兆麟(后加上杨丹)负全责,播音则以齐越为主,女声先后有丁一岚、潘捷参加。在电视开播之前,这是与庆典同步把实况告知听众的惟一媒介和渠道。

但在1963年的“十一”,毛泽东在城楼上看着齐越他们面对麦克风播音,竟也“浮想联翩”,忽然对周恩来说:“如果有人搞政变,只要他们一广播就成了。”这真是一声霹雳。周恩来心领

神会,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可以让毛主席稍稍安心的措施。

30年后,回顾当时,毛泽东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一方面,中苏两党的论战方酣,在毛的心目中,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党内党外也不是没有市场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宫廷政变史不绝书,近年非洲等地政变不断,有的只费少量兵力,竟是以控制电台,发布政变命令,而一举翻天的。三年后林彪大讲“政变经”,盖于此揣摩有日矣。

周恩来调了某军政治委员丁莱夫到广播局任政委,党组书记,取代梅益为一把手。广播局随之仿军队建制设立政治部,在对内、对外两部即中央台、国际台分设政治协理员,在广播文工团总团分团分设政委。那时“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伊始,时行说“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从上到下大造夺权舆论,广播局虽并非基层,是中央国家机关,却也已大有夺权之势。在“政治挂帅”的体制和氛围下,一切业务、行政工作服从于政治,业务、行政人员便须听命于政工人员;从这时起,原来广播电台以宣传业务为中心的格局改变了,加上某些政工人员对宣传、对人事的不适当干预,开始形成这两部分人之间的隔阂与矛盾。

在原有的业务、行政人员中,也包括两部分:一是“进城”前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老广播,和“进城”初期从青年学生中吸收的新广播;还有一部分则是1952-53年间几个大区撤销后从大区台调来的负责干部,其中不少是在地方台独当一面的,到了北京,部分以副职作了安排,却也有些一时安插不开,于职务、级别、住房及各项待遇,多有不能尽如人意者。于是有的便把不满集中到梅益身上。这样,在实行政委制之前,机关里就已添上原中央台和原地方台干部之间的矛盾,里面还套着新老干部以至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之间的矛盾,不过或隐或显,时隐时显罢了。

文革风暴一起,在全局和各部口都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由政治部系统掌握,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部署发动攻势,梅益自然首当其冲,因为他不但是在广播战线执行了所谓“十七年黑线”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魁祸首,还是远在上海左联时期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参

与者,积累了大量有待清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大字报公布了他审定的稿件,竟不止一次删去了颂扬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叠床架屋的套话,实在“罪该万死”。紧接着在全局首先是中央台、国际台、电视台的编辑部门和文工团大抓“梅益黑帮”。机关内部原有的矛盾,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充分暴露并恶性发展了。

在当时气候下,只要是批斗梅益,无论怎么说,怎么做,都是“符合革命大方向”的。毛泽东“八一八”检阅红卫兵,流风所及,与社会上的“红色恐怖”同时,1966年8月23日早晨一上班,广播局就举行了对“梅益黑帮”的第一次武斗。大家记得,导致老舍自杀的那一场大批斗,也发生在这天早晨。广播局东小院的一幕,可能既是呼应社会潮流,又是贯彻领导意图。就从这一天起,广播局开设了“政(治)训(练)队”,对广播局梅益以次的干部员工一百人左右实施圈禁,宣布《对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十条规定》,俨然监狱一般。每次全局的批斗会,梅益都是头号斗争对象。大家印象很深的是,梅益对他经手终审的稿件,他怎么修改的,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不光是记忆力好,而且因为他真是用心。不过,我记得有一次,有人气势汹汹质问他,为什么要办农场生产基地,他竟答道:“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质问者为之语塞,我不禁心中暗笑。后来我也遇到这类质问,说“你搞翻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就答“是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收到同样的效果。梅益不但要应对局内大会小会的批斗,到工人体育场等万人大会上接受跨行业的批斗,会下还要写交代材料,参加劳动。他本来有“鹅掌疯”,那年冬天露天干活,掌心全裂了。四个月后,年底因运动态势的某些变化,政训队解散,被关的人暂时回家。梅益却没有这么轻松,两派群众组织都要表示自己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那就得无休止地狠斗“走资派”。梅益充当了“革命群众”及其后面操纵者“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练拳的沙包。1968年军管小组进驻以后,又成立了规模更大的专政队,其中有第一次关过的那些“黑帮”,还有陆续“揪出来”的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以及被梅益“招降纳叛”“网罗包庇”的“牛鬼蛇神”,而且连党委书记丁莱夫,

还有一些政工干部也进来了。梅益自然仍是首恶。新一届的专政队是“走读”的,他和另外六七人则仍在专家楼里“隔离”,实即羁押。每天定时由监管人员领出列队到大食堂吃饭。这样的屈辱持续了两三年。然后,到河南淮阳干校,所谓边劳动,边交代,接受改造。但对他说来,比起圈在小屋里,也许已是一定程度的解放了吧。

《梅益同志生平》中,只有几句话——“‘文化大革命’期间,梅益同志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被遣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身体遭受重创”,30多字笼统一笔带过,故我在这里多说几句文革期间的情形当作补充。

走出八宝山,在九月秋风中,我又一次想,一个人,就这样走完了他一生的道路。今天,除了亲故,大概只有研究历史的人才关心梅益曾置身其间的上海左联、南京和谈那一段历史了;且如刘衡所说梅益不大抛头露面(记得1954年组织第一个广播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电台学习苏联经验,他就没参加,而是留下,把各部门出访成员负责审稿的任务一总承担起来),似乎连广播电视系统的年轻人对他也已陌生。不过,过去以至今天许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读者,多还记得译者的名字是梅益。今年是奥斯特洛夫斯基诞生百年纪念,他应该把他小他十岁的梅益看作异域知己吧。据说,梅益晚年曾应友人请,抄录了书中主角保尔·柯察金那一段撼人心灵的话:“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它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当梅益用发抖的手写下这些字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他的心情会是平静的吗?他回顾意气风发的早年,坎坷颠踬的中途,以至虽有馀勇可贾毕竟暮色逼人的晚岁,他感到累了吗?他有怎样的感慨,都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2003年10月17日)

(责任编辑 吴思)

张黎群

●
陈模

中国青年运史上一个大写的人

黎群同志永远离开我们走了，我感到无比悲痛。我从1951年3月结识黎群同志起，先后一起工作相处50多年，他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个生龙活虎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他为办好《中国青年报》奠定基础

1950年12月，苏联青年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团长是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米哈依诺夫。他向中国青年团中央领导同志建议，创办一份团报。团中央早有办报的打算，遂向党中央写了申请办团报的报告，迅速获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批准。

黎群同志1950年初被调到团中央以后，就负责筹备创办《中国青年报》的工作，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一干就是八年。团中央让他到莫斯科学习苏联共青团真理报的办报经验，在中央团校开办新闻训练班，为团报培训干部。他和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邓拓是老朋友，和副总编辑胡绩伟、王揖是在成都的老同学，请求他们支持一些干部，并让青年报的编采人员去坐班学习一段，让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团报，他们都一一答应了。这样，《中国青年报》——作为青年团在全国发行的第一份报纸于1951年4月27日诞生了。

黎群同志为此兴奋不已，写下《团报创刊述怀》（七律）两首。

—
旗帜鲜明求理想，生活渴望真善美。
政治清明赖民主，爱憎分明好做人。

二
新闻真实命根子，实事求是志坚贞。
左右逢源非吾愿，须与青年共忧欢。

黎群同志曾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和上海大夏大学，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春赴延安。从1936年参加革命到1950年14年中，他既做过国统区、解放区的青年工作，又做过国统区、解放区的青年报刊工作，是一个具有较高的政治、文化水平，熟悉青年运动与青年报刊、见过大世界，颇有经验的干部，当时他才30岁。他的述怀诗，表明了他对办好青年报的希冀和理想。

什么是青年报人的精神呢？耀邦同志有两句名言：“干部要干，战士要战！”黎群同志说：“我只要一息尚存，总是干！干！干！”他在《青年报人的特殊品格》一文中说：“青年报人所到之处，目睹耳闻，凡是好人好事，就大力宣扬之，表彰之；凡是坏人坏事，就不避风险去揭露之，排除障碍去鞭撻之！他们和青年息息相通，休戚相关，欢乐与共。”在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一文中又说：“青年报人中不乏对党、对人民忠贞之士。他们对坏人坏事嫉恶如仇，拥护毛泽东主席提倡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老子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因此，敢于揭发那些特殊化的现象，诸如《不该开设的秘密商店》一稿，是揭露某个省市委搞特殊供应的；《公园里的私园》，是揭露在公园里修建招待所的；《宋北方事件》是批评申诉太难的；《部长助理与摄影师》是批评以势压人的……这些批评稿件触怒了一些人，便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皇帝没有拉下马，自己先滚鞍下马了！”

创刊之初，头绪万端。其时，我任副总编辑和党总支书记。黎群同志作为报社的社长、总编辑，抓过报社建立印刷厂、向东德购置轮转印刷机，抓过报纸发行和社内的后勤工作，当中心工作来抓的是青年报人的思想建设。老青年报人都记得，报社从御河桥团中央大院搬到东城海运仓二号新购的大白楼后，黎群同志就找了编辑部四五个思想活跃的同志，放下手里的工作，集中到北门仓报社几间闲置的屋子，生起火炉，静下心来，沏了茶水，让大家整天议论一个问题：怎样办团报，怎样改革，怎样才能刷新团报？不久，他就在报社的大食堂对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作《怎样做一个青年报人》的报告。

团报在周二刊、周三刊的初创时期，与各方面的关系比较好处，一改往日，上下左右就变得不协调起来。他坐在总编辑这把交椅上，常常陷入被动的局面。如新华社发的消息、文章，《人民日报》社论要不要登？上面指令这篇要登，那篇要发，不登就违令了。他想，若随波逐流，唯唯诺诺，日子也可以过，工资也不会少分文，职务照升，但这和青年报人的性格、气质格格不入。怎么办？他请教周总理。总理说：“我们

过去在山沟里办报，读者对象主要是工农兵和干部，入城后情况就不同了……按解放前那样办不行，读者不会习惯，达不到教育、宣传的目的。”

经过深思熟虑，他进行了三方面改革：

一、本着“讲真话”的原则，赋予新闻工作人员独立负责的权力。他能作主的就作主，出了问题，上面来了批评，他承担责任。

二、拓宽内容。把青年工作部门的特殊性同报纸作为舆论机关的普遍性密切结合，评论的范围扩大了，议论的内容增多了，采访的领域开阔了，批评的限制突破了。据统计，1956年共发表了各种形式的批评稿218件。

三、革新版面，改变老面孔。各种会议的首长讲话不是全文照发，而是加以精编，取其精华。新华社稿件，择其与青年有关的摘要刊登；增多本报记者、通讯员和读者的来信来稿，使新鲜的题材，群众的声音，遍布版面。

这三点改革思想，概括得好，既明确，又泼辣、周详，成了青年报制胜的“法宝”。当然，黎群同志抓团报改革是多方面的，牵涉许多具体方面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建国以后，我们的党中央不断发动政治运动，几乎是一个接着一个。一般党报都习惯地搞以政治运动为中心那一套宣传。团报如果也这样搞，那就成了翻版书了。黎群同志认为，本报



晚年张黎群

的日常宣传要坚持不懈地反映我国青年的精神面貌,以激励青年为“四化”英勇奋斗为报道重点。我国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突出地报道了北京展览馆基建工地上出现的青年突击队,提高工效若干倍,受到北京市委和团中央的肯定和表彰,报上一推广,青年突击队的旗帜,就在全国基建、矿山、工厂飘扬起来了。

第二、宣传先进人物、先进集体。我在团报主管青年运动的报道。创刊以后,我们连续地报道了郝建秀、赵国有、韦玉玺、王崇伦等工业先进人物,不只报道事迹,还报道各地青工如何学习,开展比、学、赶、帮活动,效果好、影响大。

第三,我们对青年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不脱离青年思想实际,不空洞地生硬地讲大道理,而是有时代特点,渗透于形象、活动和知识的宣传之中。比如,我们在理论修养副刊上讨论什么是我们的远大理想,当营业员就低人一等吗?

第四、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迅速进步,青年渴望探求知识越来越广泛,希望团报对他们的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提供更多的指示、帮助和服务。在黎群同志的启发下,团报办起了“团支部”、“接班人”、“长知识”、“绿地”(文艺)、“辣椒”、“周末”、“美术”等七八个副刊,内容丰富,知识性强,受到青年们由衷的欢迎,毛主席两次表扬报上登过的文章。

胡耀邦同志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以后,《中国青年报》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向科学进军”的宣传,在青年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黎群同志的积极领导下,《中国青年报》在首都十多家报纸中是发行量第二大报,经常保持日销量 200 多万份以上。

黎群同志从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和大家一起干,有事先承担责任,善于团结干部。他对干部也很放手、放心,他若出差、开会、出国,编辑部工作就交给我和钟沛璋同志去做,全社出现了团结和谐、蓬勃向上气氛。当时全社除三五个老干部有家室外,绝大部分都是二十岁上下的知识青年,报社并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大家每天八点上班,在报社吃罢午饭、晚饭,又坚持干到夜里 11 点,吃一碗汤面才回家。这是一种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正因为青年报人有了这种精神,才

把团报办得那么好,那么有朝气。黎群同志最大功绩是,带领并造就了一支积极勇敢、特别能战斗的青年报人队伍。

天有不测风云。在反右派斗争中,三名正副社长、总编辑一锅端了,出了两名右派,我是幸免于难,但也撤职贬谪,下放改造。有 17 名记者、编辑、部主任,错划为右派分子。那些挨批判的准右派,就难以计数了。20 年之后,历史证明《中国青年报》错划的右派分子,是革命的知识分子。

他为谱写中国青运史竭尽全力

胡耀邦同志 1952 年 9 月来团中央工作后,不只一次讲到,应该建立青年团学,我们应该重写中国青年运动史,无愧于中国青年运动,无愧于新时代。

1950 年初,团中央宣传部教育科长李公天同志,认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应该开设“青年团学”这门课,教育系的学生应具备这门学问,掌握引导青年健康成长的规律。李公天同志去北师大商量,一拍即合。校长林砺儒送来一份聘书,聘请张黎群为教育系兼课教授,同时派一名助手。

黎群同志接到聘书后,非常重视这件事,他抽出时间,写了《中国青年运动史讲稿》,在北京市为团干部们讲过,再给大学生讲,十分精彩,很受学生的欢迎。除在北师大教育系上课外,黎群同志应天津、重庆、成都等地团组织的邀请,也讲过多次,他是个热心肠,几乎是有求必应,不受报酬。当时团内的作风就是这样。

1956 年的初夏,黎群同志跟随耀邦同志从北京出发,在京广铁路沿线的省会、县城、村镇进行调查研究,侧重于农村青年的要求和在生产建设中怎样发挥突击作用问题,他发现农村青年文化水平相当低,文盲不少,黎群同志提出了农村团组织办文化夜校的主张,他称赞中南几个省的农村青年突击队搞得很好。回京后写出《学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怎样搞好农村青年突击队》两本小册子,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也算是他作青年研究的两项成果。

1957 年的春季,刘少奇从北京坐火车到广州,对沿途五省进行考察,黎群同志跟随考察。他

利用这个机会，向少奇同志请教了许多问题，包括青年研究的问题。

少奇同志说：“青年报必须是引导青年放眼世界，关心国事、党事、社会之事的舆论机关，不能囿于所谓‘青年问题’的狭小圈子，青年报要议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各界人士都要看。报道面、反映面要广泛。”

另一次，少奇同志说：“现在青年学生中，发生了不少思想混乱，其原因很复杂，有波匈事件的影响，也有学校教育和党的思想工作上的问题，主要毛病是脱离实际，脱离青年群众。还有一部分干部忘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有的甚至发展到争名夺利，唯利是图的地步。这些坏思想、坏行为，是向青年施放了腐蚀剂。”

另一次，谈到青年报怎样认识青年的问题，少奇同志说：“青年报的同志，首先要认识团报帮助党解决青年问题的重要意义，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社会主义持续发展，也关系到青年一代能否健康成长的问题。”

1955年，黎群同志向团中央书记处建议，成立一个青年运动史的研究机构，研究当代青年的思潮，研究中国青年运动各个发展阶段，搜集、采访、整理各种青运史料，编印中国青运史料丛书。书记处一致同意，从中央团校调来了郑光同志，黎群同志推荐了团报的编辑罗征敬同志，他们协力同心，开展研究，广采博纳，成绩卓著，出版了《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共十大本，419.3万字。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青运史料丛书。征敬等同志在这个时期，访问了许多七八十岁的老共青团员、老青年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青运历史资料，如果晚十年再干，这些老人就不在人世间了。

“文革”中遭受迫害，对党忠贞不渝

1962年2月，黎群在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之后，被调到成都担任党的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此后，他担任了《重庆日报》新开辟的《巴山夜话》和《成都晚报》《夜话》专栏的写作任务。《重庆日报》总编辑雷勃、王古泽、《成都晚报》总编辑陈柏林都约黎群写点文章。他们商量

后，订了100个题目，来源于近四年“大跃进”中的现实生活，希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一褒一贬，以正时弊。文体力求短小精悍，生动活泼。

黎群在工作岗位上，与许多人接触，同许多事务接触，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胸膛与革命事业共起伏，对国家的进步欢欣鼓舞，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忧心忡忡。于是他拿起笔，说诚实的话，提倡做诚实的事，谴责败事之徒。他一篇接一篇地写，共计写了20多篇……

1963年春，重庆市委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肖泽宽（市委常委）、李止舟（秘书长）、廖伯康（办公厅主任）的右倾反党集团，并与张黎群写《巴山夜话》联系起来，说是肖、李、廖为张黎群提供材料，张黎群是他们制造舆论的代言人，也是反党集团的支持者。

黎群扪心自问，自己只是写了20多篇小稿子，平时一向严谨，遵纪守法，不致于这么严重吧？任凭风浪起，还是照常工作。他带领两个工作人员去贵州、云南的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调整工作正在大力进行，“刹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作风），正在有效地推进，生产明显好转，干部、群众的精神开始振奋。他感到鼓舞，常常忘记了个人的安危。回到成都已是春节，他知道“文字狱”这一案还未了，迟早要发作的，何时来，怎样来，无法预计，只有听天由命了。

1964年春，黎群患病住进了成都体育医院，经过4个月的治疗，才逐渐好起来。

黎群的好朋友于江震同志，给他来信，要他到重庆和他一道生活一个时期。于是，他去了，上了名山缙云山，在那儿同住了个把月，人是精神动物，心情平和，身心健康起来了。

1964年的夏天，西南局通知黎群同志，参加南充四清工作，地委书记卫广平和他是正副队长，归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领导。于是，他到南充——广安三个公社搞“四清”，为时一年多，他住在广安一户贫农家里。一张大木床和一张小木床，睡一家五口人。一天下大雨，从黄昏到夜间仍不停止。他们穷得晚上点不起灯，就用手摸娃娃小腿，以为够数了。到了半夜，雨停了，一位十岁的娃娃抱着一岁的娃娃回来了。他目睹这样的景

况,深深感到不搞计划生育不得了。于是,同宋小来秘书在广安县星光生产队搞试点。写了一个《如何进行计划生育》的报告,给李井泉同志送去,李认为很重要,批转给云、贵、川省委仿行。

1965年下半年,黎群调任四川省绵阳地委副书记。绵阳地区是四川省的粮仓。1966年初夏,这个地区大旱。正当黎群担任抗旱团长,全区已取得抗旱斗争胜利的时刻,四川省委电令他即回成都作“反党”的检查。5月24日,黎群被公安机关逮捕隔离审查,交待问题,真是“昨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这时,他48岁,已参加革命39年了。

1966年6月5日,暴风骤雨式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四川日报》上在社论位置上,以史伟(市委谐音)之名发表了《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张黎群开火》的文章,宣称“张黎群的《夜话》和《巴山漫话》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黑话一样,贯串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这条黑线同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相呼应,为内地富反坏右的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起,猖狂地向党进攻,妄图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改变颜色。”

在这个大祸临头时,黎群不住地自言自语着,反复背诵着这样一些古人警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猛虎扑于面而目不瞬!”“大仁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忍人之所不能忍!”“真金不怕火,怕火非真金!”这样,他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下来。他再看看报上那些鹦鹉学舌的文章和条条揭发,心里更踏实了,因为他确信,假话打不倒人,更吓不倒人!

他写了一本《黎群自传——革命30年的回忆录》;又写了一份《驳斥报纸造谣93条》;此外,还写了大量检查材料和答辩文章。他越写越坚定地认为,我是冤案的主角。

在关押了7个月后,1966年12月24日凌晨两点,他被押到绵阳地委机关。他们把他带进一间又潮又矮的房子,恶声恶气地说:“你打扫一下,就住这里!”

黎群打扫完毕,到机关院子里看大字报,墙上都贴满了。这哪里是在进行严肃的政治批判,全是一派编造的材料,揭露走资派所谓罪恶,全

是捕风捉影的东西,他不想再看了,上街到百货商店买了一台收音机。迎面来了一帮红卫兵,其中一个指着他的鼻子问:“你是大黑帮张黎群吗?”黎群答:“我是绵阳地委副书记。”

众人不由分说,簇拥着黎群进入地委机关大院,抬来一张方桌,要他站上去,一场批斗会开始了。

“你是不是大黑帮,你为什么反党?”人群在吼、在叫,乱作一团。

黎群答:“我是中共党员,地委文教书记。有人在捣鬼,将莫须有的罪名横加于我!”

忽然,一名女将跳上台来,将黎群的双手绑起来,高声喊道:“革命战友们!我是北京文艺报的,串连来此。张黎群太嚣张了,必须把他斗倒斗臭!”于是,“打倒张黎群”的吼声,此起彼伏。

太阳西下,斗争大会散伙了。没有人来管黎群,他确实有点困乏,走回那间小屋子,倒头便睡。

不久,他的脖子上,被挂上了一尺宽、二尺长的大木牌,上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黎群”,名字上用砂笔划了粗粗的大“×”。造反派把他们带到体育场的看台上,让他坐“喷气式”,进行十多天的批斗,接着又被押上卡车游街,最后在市体育广场,举行“万人批斗大会”……这样过了一年的比黄连还苦的岁月。

1968年冬,黎群夫妇被军队监管。1971年起,又被易地关押于德阳白马关的庞统庙。在关押中,黎群听说于江震横遭迫害致死。他倒在床上抽泣,提笔写下八个字:“江震被害,戴笠笑熬”。他与江震有30年的交情,彼此视为知己,江震1928年入党,20岁出头就挑上红军师长的重担,显露非凡的才华,他走完长征之路,就做党的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被害死在党的西南局书记的岗位上。

1979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黎群的冤案平反。

青少年犯罪研究事业的开拓者

“文革”中的黎群坐了七年半的监牢,所幸的是身体依然健康。他似乎忘掉了各种伤痛,奋不顾身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决心把损失的时间

找回来。

他参加筹建四川维尼纶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任党的重庆市委委员、四川维尼纶厂建设现场党委书记、指挥长,接着又任浙江大学党委第二书记、第一副校长。到1980年,他61岁,又返老还青,担任北京社会科学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所长。

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上,这是第一个青少年研究所。黎群到任不久,倡议并领导创建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次年6月,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会长,在他的领导和操持下,“中国青少年犯罪学”被列入国家“六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于1987年12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标志着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少年犯罪学理论体系,填补了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空白。他还组织专家、学者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术丛书》等专著,丰富了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的理论宝库。

黎群一贯重视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和有关机构合作,开展青少年犯罪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注意发现青少年犯罪研究的新动向、新问题,撰写、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著,出版了《黎群青年研究文集》。大家称他为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开拓者、奠基者,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黎群十分重视青少年犯罪研究成果的转化。他经常亲自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深入到监狱、少管所、工读学校、劳教所,同教师、干警探讨如何更科学地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的问题;同失足青少年座谈,鼓励他们好好接受教育改造,争取走上美好的人生道路。他应邀担任全国青少年立法领导小组顾问和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青少年专门小组成员,积极参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立法活动。他十分关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主编《中国少年犯罪与司法》学术专著,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推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为表彰黎群同志在研究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推进国家青少年法制建设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国家教委、司法部、团中央五部委于1995年1月12日授予他“中国保护未成年人模范个人”光荣称号。

黎群同志在他的晚年,以坚韧不拔的意志,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带领团中央张定、李公天、严如平、唐非等一批老同志,用了四五年的时间,编辑了四卷《怀念耀邦》(共200多万字)。

黎群为人坦率真诚,他生前几次对我说,我一生革命,斗志不减,至死不悔,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未能参加撰写《中国革命青年运动史》,当然,他寄希望于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的同志,力求写出一部文情并茂的青运史。他在1984年的赠诗中,表达了他的壮志情怀:

洪都星火井冈烽,华夏燎原燕山红。
国基未固宫阙乱,腹患原来要根除。
盛世修史作春秋,忠奸是非命笔修。
江青不死重卷土,董狐秉直照千秋。
敬爱的黎群同志,您安息吧!

(2003年5月29日晚)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欢迎邮购《炎黄春秋》近年合订本

通 告

2003年合订本将于
2004年1月份装订完毕,如
购买合订本,请将书款汇至
我社发行部

1999年合订本 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2000年合订本 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2001年合订本 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2002年合订本 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2003年合订本 简装 51元 精装 56元

(以上均免收邮费并挂号邮寄)

与黄万里先生的几面缘

● 郝一星

读到《读书》曾昭奋先生的一篇文章,方知黄万里先生已去世。心头一阵无奈,想到原本与黄老的约定突然没有了下文,无限追悔。

和黄老也算是有缘。因为偶然在刊物上读过先生的文章,特别是先生填写的诗词,笔力意趣均属上乘大家风范,心仪已久,竟贸然拜访,时在1999年4月21日,春光正烂漫。

先生居住在清华大学教授公寓的一层。黄老鹤发童颜,红光满面,态度平易谦和,长者的慈祥,学者的自信,尤其是老人赤子般的天真,一双不设防的目光,使人顿感亲切。黄老健谈,对初次见面的来访者,也是直舒胸臆,不像饱于世故的老少爷们那样油滑,因此谈锋所及毫无顾忌。从黄老处回来当即整理成文,兹录如下,或者有文史价值。

父亲黄炎培是国共两党居间调停者,黄炎老正直无私,国共两党,他都敢于直颜批评。解放后,毛、周常与先生商讨国是。黄曾对毛直言:历来得天下者必杀功臣,共产党何以应对?毛答:批评与自我批评。然而很快就整肃了高、饶。国家实行统购统销,黄去江苏,士绅上报的材料证明此举弊大于利。黄乃面陈毛、周,引发争论,最后刘少奇出来和稀泥,说江苏的材料有正确的一面,但不一定适合全国的情况,勿以偏概全。此前,毛称黄是中间偏左的民主人士,此后改为中间偏右。于是黄炎培终生不向共产党进言。

黄炎培属黄兴派。民国伊始,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得知国内变革,即电告:已筹到一笔款子,但没有名义,盼给予身份。黄兴等人便推他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回国,带回来的只是一只空皮包。

黄万里与夫人丁女士刚刚度过钻石婚纪念

日,携手已62年。他们的相识是在从美国回来的船上。黄炎培给他去信告:务必回国,将来侍奉母亲。万里长兄娶的是外国女人,二哥的媳妇不贤惠,只有他可能担此重任。丁女士也是有来头的人家,其父乃民国元老山东丁惟汾。黄万里曾上丁家登门求婚,遭冷落,原因是嫌他是上海人,说上海人难免油滑,靠不住。万里觉得好生窝囊,说自幼成绩优秀,出国留学拿硕士、博士学位,家庭又好,自己长得又很帅,被称为‘标准女婿’,竟吃了闭门羹。黄炎培又托人从中牵合,第二个受托人原来就是丁惟汾的机要秘书,于是天从人愿,遂结百年姻缘。几十年来,老夫妻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如今已是四世同堂的幸福之家。

黄万里坚决反对三峡工程,曾力陈四弊。美国总统克林顿通过国际咨询组织征求过他的意



黄炎培

见,黄直陈己见,克林顿复函对他能坦率的表达自己真实的看法表示钦佩。美国不投资三峡,也令世界银行不予介入。1994年加拿大召开国际研讨会,专家所见略同。加政府撤出1700万美元的投资。

张光斗说中国是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黄万里以为中国短缺是耕地。

谈话间,注意到先生的客厅很是别致。客厅不大,弥漫着儒雅之气。壁上悬一整幅的国画,是何香凝手绘的一丛梅花,极具艺术感染力,堪称神品。小镜框里另有两幅小条幅,一幅是赵朴初先生的诗词,一幅是金克木教授的手笔,二位先生的题诗情词真切。黄老告诉我,这两位都不认识他,他也和他们素昧平生。赵和金都是看过他的诗词慕名而与他结成文字之交的。黄老十五岁即能写旧体诗词,客厅临窗处的墙上就挂着一幅近作,是一首《念奴娇》,词意书法俱佳。

5月18日,黄老打来电话,长谈半小时。黄老特别珍重自己的专家身份,对于那些前辈文史掌故知之甚多。黄还透露:孙中山不依仗黄兴的政学系,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后,选中了蒋介石并得意的说:得到一个蒋介石等于有了十万精兵。但蒋执政后仍重用政学系中人,代表人物是陈英士的一双侄儿陈立夫、陈果夫。丁惟汾就属政学系之前辈中坚,故陈立夫尝言:蒋家天下丁家党。

8月11日,老先生还来过一个电话。称欲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式样写作,我本来是想请先生按一幅照片、一首诗词、一段文字的风格写一写他的一生的。

12月31日先生又打电话,说他新近又做了一次手术,但听上去依旧那么通达,相约近日去清华园拜访,他想透露一些不能形诸文字的东西。可惜,我再也不可能听先生说些什么了。记得其间,曾又到清华和先生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谈话中,老人很客气地说,要到隔壁去打针,我还以为是什么营养保健的注射剂。他笑道:治癌症的。我很吃惊,看老人的气色和精神,怎么也想不到会和癌症有干系。他却坦然得很,说60年代就得了这病,而且是三种并在一起。每天由他的老伴丁女士注射,维持生命,已届九旬,算是一个奇迹了。

那次,黄老还特地问我:“你说中国缺不缺

水?”我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水资源极度短缺。”黄老笑道:“其实缺的是耕地。”他又反问为什么黄河会断流。然后发了一通议论,大意是:自古没听说过的黄河断流,原因是上游几十座大坝分流浇地。说到中国不乏水资源,他有独到的见解,认为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每年有大量的水白白流到境外。黄河长江源头萎缩,治理的办法是打通山脉把雅鲁藏布江的水引注到长江黄河的源头,这样一来成本要比修三峡大坝划算得多,而且解决了两大河流的生态问题。他已经写好一篇文章专论此事,却苦笑道:“人家不会理睬的。”看得出他内心是多么无奈。

本来黄老约我再到他那里专谈编文集的事,琐事缠身,竟未能如约,现在想起,深深懊悔。

黄老去世了。我仍不时记起与黄老的有限的几次接触,记起他老人家的一头白发和他的那些出自真心的、不设防的谈话。这样的知识分子恐怕越来越少了。吧。

老人和我最后一次的通电话恰在新千年的前夕。追念往事,厥有此文。

(2003年9月24日)

(责任编辑 吴思)

欢迎
订阅 2004
安徽老年报

邮发代号 25-42 四开四版 每旬二刊 全年订价 21.60元

一报在手 可知家国之大事
一报在手 可知老来大有可为
一报在手 可知延年益寿之妙方
一报在手 可知中外古今之知识
一报在手 可知笔耕之胜境
质高价廉 老少咸宜
可以赠长辈 看报见孝心
可以赠亲友 看报见真情
读者曰:岂可不订!

安徽老年报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
本报发行部地址:合肥市庐江路69号
电话:2653071 邮编:230001

张学良自述： 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 曾景忠



1990年6月8日,张学良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采访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这里专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

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为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

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采访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官邸被日军占领

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朝鲜战争中的苏联空军

● 于 光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和朝鲜战争爆发后,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有大批苏联专家和军事顾问来到中国,数量之大,涉及领域之广,可以说是空前的。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由,关于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很少资料积累,一些史实或被扭曲,或被淹没,更没有公开报道。笔者在朝鲜战争期间,曾在中朝人民联合空军司令部任职,现就个人经历和有关解密资料,对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一些情况作简要回顾。

一、苏联空军参战前有关高层领导的动向

1950年6月15日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在战场上频频得手,很快攻破汉城,朝人民军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到7月上旬,人民军从多方向推进到朝鲜半岛南部,李承晚政权岌岌可危。为挽回败局,9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组织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将朝人民军的补给线拦腰切断。在强大的美空军打击下,北朝鲜少得可怜的空军力量只几天功夫便被摧毁殆尽,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条件下,地面部队进退两难,战争态势突变。9月29日,金日成向斯大林告急,要求直接军援,斯大林要金日成转求毛泽东。

事实上,朝鲜战争一爆发,毛泽东就预感到战争将给新中国带来的阴影。在接到金日成的告急信息后,毛说:“邻人危急,我们在旁看着,怎样说,心里也难过。”他很快下定决心,将原计划用于解放台湾的空军第四旅重新编组,准备调往东北。同时,派出周恩来去莫斯科。1950年

10月8日,斯大林会见周恩来,双方达成协议,由中国派出地面部队,苏联为中国空军提供飞机及高炮等军事技术装备,并直接出动空军部队进行空中支援。

二、苏联空军的进驻和中苏联合空军指挥机构的成立

10月中旬,苏联第64防空军军长罗波夫将军奉命派出一个有32架飞机的先遣团进驻我安东浪头机场,团长为巴什克维奇上校。经过短短几天熟悉空域、沟通警戒雷达和无线电导航与指挥系统等战斗准备,11月1日苏先遣团第一次出击,将来犯之敌RF-80侦察机击落。接连几日的空中交锋,美空军连续被击落多架战机,给了美国佬一个出乎意料的重大打击。从对手打不散的战斗编队和飞行员娴熟的驾驶技术,美军立刻猜测到苏联空军参战了。由于当时美、苏的微妙关系,都不愿意扩大事态。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双方都担心爆发和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谁也不去捅破这个秘密。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高级智囊人物赫伯特在1988年回忆到朝鲜战争时,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必须保守住这个秘密。当时一旦把它揭露出来,我们就会受到巨大的压力,(国会)要我们对俄国发动一场战争。”

一个苏联空军团显然太势单力薄了。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一线几个机场的建设大致就绪,三个苏联空军师陆续从苏联本土调来朝鲜前线,部署在丹东、辑安、宽甸等沿鸭绿江

一线的机场。同时,中国空军新编的几个准备参战的师先后调到东北,分驻在辽阳、沈阳、鞍山等二线机场。

随着中、苏双方投入的空军力量逐渐增多,为实施统一指挥,1950年11月着手建立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以便把组建部队、组织训练和指挥打仗等工作结合起来。1951年2月12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希望派顾问帮助新成立的空军集团军制订计划和领导作战。17日,斯大林回电同意满足中国的要求,委派戈卢诺夫少将担任空军司令部的顾问。同年3月15日中央军委将已实际形成的中、苏、朝联合指挥机构正式下文成立,定名“中朝人民联合空军司令部”,司令员是当时的东北空军司令刘震将军兼任,司令员顾问即戈卢诺夫将军。关于戈卢诺夫将军,人们对他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事迹可能不熟悉,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傀儡皇帝溥仪一家及几个皇亲国戚跑到飞机场,准备逃往日本,被苏军在机场截获并带往苏联的这一历史轶事却是无人不知的。这段故事中的“苏军”就是戈卢诺夫将军所率领的伞兵部队。现在,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又来到朝鲜前线,协助刘震将军指挥中、苏两国的空军健儿,拟定作战方案,把在前线的苏联空军部队的指挥和即将

参战的中国部队飞行员的训练,以及两军并肩战斗的准备工作统一结合起来了。

三、苏联空军的战斗活动片断

苏联空军入朝参战和志愿军发动第一、二次战役,使美军在地面和空中都遭到重大挫折。麦克阿瑟极为震撼,迅速增调了两个空军联队,加强对中、朝军队的封锁攻击。美、苏空中战斗愈演愈烈,规模愈来愈大,美机一天最多出动有500多架次,苏军飞行员一天之内往往要起飞2—3次应战。苏联空军利用米格飞机爬升速度快,垂直机动性好的特点,以及来犯的美机在返航时是逆光飞行,很快摸索出一套打击敌机的方案。即起飞后,疾速爬高,避开在鸭绿江一带巡逻的F—86,在南飞途中完成编队集合,达到10000米高空,然后,掉转头来,居高临下地向正在轰炸扫射我方阵地的美机出击,这样的作战方案既有高度的优势,又处于背光的有利占位,在空战中累见奇效,给美国的喷气式侦察机和轰炸机造成极大杀伤。到1951年2月,苏空军在清川江以北与鸭绿江之间,东至永丰水库之内的6000平方公里地区,几乎占了绝对统治地位,极大地削减了美空军对我过江部队的威胁。

美第五航空队把这一地区称之为“米格走廊”,要求“远东空军应尽量避免使部队进入米格走廊”,承认“共军在这个重要地区拥有空中优势,这些地区的重要交通线没有遭到轰炸”,哀叹“为在朝鲜最西部活动的B—29进行护航已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空军



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检阅刚刚组建的空军

的飞机在数量上几乎都是中、苏飞机数量之和的一倍以上，苏联飞行员总是处于以少对多的地位。到1951年中，美空军又将在编的F—86A换装为更先进的P—86E，与美空军作战愈来愈残酷激烈。不仅如此，出于保密原因，苏联飞行员在空中不能用俄语联络，更增添了协同作战的难度，甚至为此付出血的代价。1951年三月笔者曾随两位苏联专家潜往朝鲜清川江一带寻找一架被击落的苏联飞机。经过两天的昼伏夜行，在朝鲜地方政府的引导下，终于找到飞机坠落的地点。苏联专家察看了现场，向当地居民详细询问了关于飞机被击落的经过。据朝鲜翻译转述：这架飞机大概是在激烈空战中掉队，被美机从后下方追上，“像是打了它一下，这架飞机就晃悠起来，没有拉黑烟，一会儿就摔下来了。”我们在现场周围察看了许久，飞行员尸体碎块溅落到100多米外，真是惨不忍睹。我们把搜集到的飞行员残骸和他的手枪仔细地分别包装好，带回师部。据说牺牲的飞行员是一位将军的孩子。因那天空战非常激烈，可能导航设备坏了，又不能用俄语通话，和长机失掉联系，收不到地面指挥命令，飞行员先被打伤(死)而后坠地的。苏联专家在事故现场，发表了许多由于不能用母语联络，造成极大困难的感慨。

死者的事迹是悲壮的，但活着的也不轻松。我们在前线机场值班，每天接触到的都是一些在空中浴血奋战后的战机返航。看到这些满是弹孔(有时多达四五十个)的飞机着陆时那摇摇晃晃弹跳蹦摔的情景，看到这些经过激烈空战、精神高度紧张的苏联飞行员爬出驾驶舱那疲惫不堪的样子，今天回忆起来，仍感到惊心动魄。

在两年多的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采取轮换的办法(一般同时保持三个师300架飞机左右)，先后投入的空军力量共有七个师和相应的场站部队一万多人，其中飞行员一千余名。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击落63架德国飞机的苏联英雄称号三次获得者——著名的阔日杜布将军(《人民日报》资深记者金凤当年曾采访过他)指挥的近卫空军师也曾参战。据不完全统计，苏空军在朝战中共击落美机1300多架。为此，苏方付出了200多架飞机被击落、飞行员牺牲约120余名的代价。其中包括好几位金星奖章获得

者的苏联英雄，还有一位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也英勇牺牲了。

四、中苏空军比翼长空，取得朝战的最后胜利

1950年10月底我空四师第10团(即原第四旅的米格—15团)在师长方子翼、苏联顾问沃尔柯夫的率领下，由辽阳转场到浪头机场，与先期到达的巴什克维奇团会合，主要任务是配合苏空军，接受实战锻炼。考虑到中国年轻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尚不够熟练，缺乏空战经验，因此，当美机来袭时，打头阵打大机群的任务由苏联飞行员承担。遇到好的机会，如小股敌机，指挥所就下令中国值班飞行员出动。为了协同作战并兼顾保密，联合指挥所将常用的一些作战用语，如“我攻击”、“我掩护”、“你攻击”、“左拐弯”、“注意右下方”等约三四十句口令，由联司翻译室用俄语拼音写出来，贴在苏军空中指挥员驾驶舱左前方，以便苏军指挥员与中国飞行员沟通。

1951年1月21日，中国空军迎来了第一次空战，8天后，即1月29日，10团大队长李汉击落美机一架，首创中国志愿军空军击落敌机的战绩。

1950年底，根据此前周恩来与斯大林的约定，苏联政府除调空军师参加朝鲜战争外，又相继派出约300名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优秀空、地勤人员，到中国新组建并准备第一批投入朝战的空军部队，帮助飞行员完成战斗训练科目，教会地勤人员掌握技术，学习在作战条件下维修和保养战机及其设备。这批中国飞行员虽然刚从航校毕业，飞行时间仅仅三四十小时，但绝大部分是从陆军作战部队选拔出来的优秀小伙子，他们经过几个月强化战斗训练，如虎添翼，斗志昂扬。联司领导贯彻毛泽东关于“必须抓紧时机进行实战锻炼，要十分重视实战锻炼对空军部队的意义，哪怕求得只打几次空战也是好的”指示，利用1951年春夏两季苏空军坚持在一线与美军抗衡的时机，将经过实战考验的四师10团从浪头调回辽阳，在认真总结作战经验教训后，让他们到即将参战的部队巡回讲

课,介绍出航、搜索、占位、攻击的经验,同时组织各级指挥员进行多机种、大机群战斗演习,以提高机关的指挥组织能力。1951年9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四师再度开赴安东前夕的一次战斗动员大会上,刘震司令员适时地提出:“四师这次参战,应积极打大机群,以进一步



志愿军空军部队召开抗美援朝动员大会

提高战斗力”的任务。12日,空四师转场到安东大东沟机场,开始作战值班,与苏空军并肩作战。该师自25日起同美空军交战伊始,到10月20日奉命调回沈阳休整,38天共出动29批508架次,取得击落美机20架,击伤10架的战绩。同一天,空三师开赴安东前线,也取得优异成绩。从此,中国空军开始了有计划地投入战斗部队,逐步接过苏空军承担的部分作战任务。1951年11月志愿军空军轰炸机轰炸了美韩的一个重要前哨基地——大、小和岛,配合陆军攻占了这两个岛屿。

自1951年9月至1953年7月停战,中国空军与苏联空军并肩战斗,密切配合,总共有歼击航空兵10个师,轰炸航空兵两个师的784名飞行员,59733名地勤人员投入朝鲜战场,配合友军,取得击落美机330架,击伤95架的辉煌战果。同时也牺牲飞行人员116名,被击落飞机231架。

逝水流年,朝鲜战争硝烟熄灭已经半个世纪。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相邻大国经历了田园诗般的蜜月 and 激烈的论战以至兵戎相见的大起大落,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了昨日云烟。两国政府在

新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友好关系,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的深厚感情又显生机。我常常想起朝战期间在联司与苏空军相处的人和事,特别是一些牺牲的苏联飞行员的音容笑貌是岁月挥之不去的。他们默默地战斗、默默地奉献了年轻的生命,早已魂归故里。由于一些道不清说不明的原因,苏联、朝鲜、中国这三个昔日的社会主义盟国,都没有为牺牲的苏军建立供人凭吊的地物。但他们的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三国人民的心间。中国志愿军空军大队长,原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在《我的战斗生涯》一书中写道:“战斗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还相当年轻、弱小,空战主要是苏联空军打的。后来的大机群作战,特别是与F—86E大机群作战,仍由苏联空军唱主角,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协同其完成作战任务——没有苏联空军的大力支持,中国人民空军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志愿军空军也很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

王海的陈述不止是公允、权威的,也说明了中国军人的无私无畏和博大胸怀。

(责任编辑 方明)

从《七律·有所思》 看文革的发动

● 高 华

古曰：“诗言志”，作为20世纪巨人的毛泽东，他所创作的绝大多数诗篇都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66年6月毛泽东写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这样一首政治诗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复杂运思。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降临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2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持聂元梓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响所及，北京及几个主要城市的大学首先陷于动荡之中，继北大的陆平、彭云被宣布为“反革命黑帮”之后，北京和各地众多大学的书记、校长纷纷倒台。为了取代已“烂掉”的各大学党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依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办法，向各大学和文教单位派出暂行党委职能的工作队。在他看来，这是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只是运动的规模要大大超过1957年。（参见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的指示》），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都惦记着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同时，他们也不清楚毛泽东对这场新运动的具体想法。但作为中央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等必须承担起指导运动的责任。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对党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决策知之有限，这是很不寻常的。半

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刘少奇忽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匆匆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下榻于锦江宾馆，但毛泽东、林彪均不住此。刘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一无所知，竟向贺龙打听，对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么会知道。很快，谜底终于揭开，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为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同样的情况几个月后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当刘少奇偕夫人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进入5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由康生在会上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在这次历时23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对会议的议程、全会通过的文件，无任何置喙的余地。6月1日，又是在刘少奇事先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由于对许多重大决策并不知情，刘少奇等急于想了解毛泽东对运动的意见。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前往杭州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毛说话却模棱两可，让刘等相机行事。（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4页）刘少奇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多年来，经常也是这样。有时，毛会具体指示什么；有时，又深藏不露，说的话上下几千里，全靠刘自己去领会、揣测。为了确保准确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还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书面汇报工作一次。

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长达9个月,为毛历次巡视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次南巡期间,毛以杭州为基本居住地,来往于上海、南昌、长沙、武汉之间,所思所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酝酿“文化大革命”。直到6月15日,毛才离开杭州,经南昌转往长沙。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据跟随毛住进滴水洞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回忆,在这十余天中,毛“任何人都看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毛“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喜欢户外活动的毛这次仅让张耀祠等人用轮椅推着离开洞口不过三百米,而毛的习惯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38—40页)

形迹隐密的毛泽东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汉给江青写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断,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这封信外,毛在这段期间有无其他抒发胸臆的文字?对此外界长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人们才知道,毛在1966年6月还写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谈他对“文革”感受的,只是毛未注明写作此诗的地点。

毛泽东《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细细阅读毛泽东的这首七律,再来看他在1965年前后的思与行,大致可以触摸到毛发动“文革”的初衷。作为一位坚定的革命家,毛终生信奉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为此,不倦地领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毛执著地相信,惟有不间断地推进革命和阶级斗争,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并永葆中国革命的青春。然而1959—1961年的特大经济困难造成严重后果,他个人的领袖威望也因此受到损害。从60年代初开始,毛已退入“二

线”,毛的同事们虽然继续尊敬他,但过去的某些过激的思路和方法已被悄悄地进行了转换。正是在这时,敏感的毛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巴卢库、卡博时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他“已经看出问题了”。在这几年后,毛越来越感到,刘等所做的一切都背离了他的“路线”,“革命”也越来越像是博物馆的某种陈列。(参见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第32-33页)1964年2月,毛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毛计算了一下:在6.5亿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1964年2月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曹英等著:《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第268-270页,改革出版社,1998)毛断定,革命正在衰退。刘少奇等注重生产、常规、秩序的务实做法,与毛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渐产生了矛盾,这愈益激起毛的革命危机感,也促使他萌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念头。

对于毛泽东的这套思路,刘少奇在主观上还是努力紧跟的。虽然刘倾向于常识理性,但他更知必须维护党的团结。1963年后,刘支持和具体贯彻毛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几百万”,刘迅即部署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此举以后又被毛指责为“形左实右”)。他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创造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在那几年,毛、刘在理念上的分歧似乎并不明显,可是毛为何对刘的不满与日俱增?

根本的原因是刘少奇“不听话”,“另搞一套”。刘是全党公认的理论家,但在中国,惟有毛才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如果仅仅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改了错误,重新跟上毛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烦的是,刘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样,毛泽东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而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4年12月,刘和毛就“四清”问题发生争论,刘又在毛讲话时打断他的话头,虽然事后刘向毛作了自我批评,但此事在毛眼里,非同小可,是彼“取而代之”意图之流露也。毛认为,这不是什么“尊重”和“不尊重”的问题,用毛的话说,对于原则问题,他是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毛将几年来这些分散的现象

加以综合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话在中国已不管用了,刘少奇等要把自己变成“牌坊”。

1964年12月26日,毛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据当年在毛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那天毛的女儿希望参加生日宴会,但是遭到父亲的拒绝。毛对其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1964年末,毛泽东又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现在毛要“反潮流”,要像孙悟空那样,搅它个“周天寒彻”。

1965年10月,毛泽东离开让他沉闷的北京(毛泽东在文革前经常说:“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虑皆是“反击修正主义”的大事。1965年10月10日,毛放出空气,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在毛的想象世界中违背他意见的“修正主义者”,早已盘根错节,非用大力不能摧毁。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一个试探气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面为吴晗讲话。毛不动声色,将其一步步诱入包围圈。1966年2月,在武汉东湖,毛与专程前来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彭真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但是一个月后,毛在杭州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5月,更挖出“彭罗陆杨定时炸弹”,正所谓“青松怒向苍天发”,毛之发怒挟以雷霆万钧之力,犹如摧枯拉朽,“修正主义者”、“不听话”者,则“败叶纷随碧水驰”。(1967年2月3日,毛在北京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好几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

依毛泽东的逻辑,“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1966年4月28、29日,毛在杭州对康生、陈伯达说,彭真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阶级斗争,不斗不倒”。他也一再告诫人民:“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派,敌人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坏右,如今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

“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只是要让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对于这些,毛从来是高度自信的。不久前,毛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鬓雪飞来成废料”,那是揶揄,也是对将其视为“牌坊”的刘等的一种愤怒。毛不仅精神旺健,身体也极为健康。他像战争年代指挥军事作战那样,精心擘划每一个战术计划。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强军队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保卫工作。(1965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领导班子改组)1966年初,江青组织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用迂回的方式向中央一线领导发起进攻。毛让江青去找林彪,随后又三次修改座谈会纪要,并在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标题,林彪则将这份文件报给刘少奇等,经刘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发向全党。刘少奇知道,除了奉命惟谨,别无任何其他选择。(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说,当时在北京“增加了两个卫成师”。)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群情惶惶,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高校校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然而毛却壮怀激烈,为自己的下一步目标而思虑和振奋。

下一步的目标是谁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泽东从不喜欢无的放矢,反修防修须有目标,无此具体目标,一切大喻大轰皆流于形式,现在毛到了下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是否赶刘少奇下台?

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毛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毛检讨后,毛似乎宽谅了刘,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作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贯风格,这也是为何毛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

的原因。

毛泽东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但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在这微妙敏感的时刻去影响他的决定。毛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60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确实，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1966年5月18日，刘少奇等在会见越南胡志明主席时表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了出来），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

从6月20日后，7月13日、19日、22日，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与刘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一年后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插话说：现在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是事先经主席交过底的。

毛泽东为自己下一步的设计而振奋，打倒“彭罗陆杨”，这不算什么，在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黄张周”？中国要使世界震惊的何止是揪出几个人，而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创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将来，“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毛泽东在南方6月的潇潇雨中，想得很深很

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毛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在他看来，刘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现在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阻挡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但那是以后的事（参见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即，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不久，毛泽东找到了领导革命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党的垂直机构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毛将暂时把党机构搁置一边，在他的眼中，党组织已被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牢牢控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设计加以过滤和改造，使之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毛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所掌握的力量将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远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在6月思索的果实很快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与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终于找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几个月后，他说，通过三件事，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批准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8月1日写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毛在6月的思考终于点燃起冲天的“文革”烈焰。（责任编辑 吴 思）

瑞典模式： 社会民主党的一种探索

● 潘培新

如果回顾一下历史,那么,对瑞典模式的态度可以有这么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国际舆论对瑞典模式大唱赞歌。人们赞叹瑞典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认为它在经济、政治体制方面都是很成功的,对它充满了羡慕之情。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石油危机以后,那时大谈瑞典模式的是瑞典国内外的保守势力。他们把高税收和低效率说成是瑞典模式的集中表现,于是瑞典模式就从榜样、楷模,变成了危险的东西,可怕的东西。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瑞典经济复兴了,它的低失业率(达到2.7%),低通货膨胀率(达到3.3%)和经济稳定增长率(接近3%),使它成了调整和发展的样板,瑞典模式又一次成为国际舆论注意的中心。那么,这后一次与以前两次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不但美国学者重视瑞典的经验,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以积极的姿态来看待瑞典的经验。

当今瑞典这个国家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瑞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瑞典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半部的一个小国,人口约840万,国土面积在欧洲居第四位。它有有利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很丰富,有铁矿,总储量是40亿吨,居欧洲的第二位(也有说是第三位)。含铁率达60-70%,是世界上最富的铁矿之一。此外,还有钛、铋、铀、钨、铜、石油等等。森林覆盖面积占陆地面积的57%,蓄材量约

25.7亿立方米。水域也很广阔(水域面积达到了38,000多平方公里)。在19世纪末,它是欧洲最穷的国家,经过百余年的奋斗,今天它是欧洲最富的国家之一,在经济上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到一个具有先进的工业、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现在除阿联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少数石油生产国之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西方各国多年来是名列前茅的。据1982年8月世界银行公布的报告称,瑞典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3,520美元,在美国、西德之上,在瑞士之下。目前产业工人的月工资是2,000美元,教授的工资是4,000美元以上,人均住房面积40平方米(别墅住宅占40%左右)。在瑞典,可以说消灭了贫困,瑞典人过的是丰衣足食的日子。三大差别已接近消失。1986年妇女的平均寿命是80岁、男的74岁,在世界上仅次于冰岛人和日本人。

瑞典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比它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多4倍,出口多9倍。瑞典的机械设备甚至高出14倍,它的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瑞典的工业企业92%都是私营的,但与其它西方国家不同,它有一庞大的公共部门。比如说教育、保健以及其它社会领域都是掌握在国家的手里。瑞典的国有化并不高(将近10%)。所谓公共部门是包括全部的公用事业,公共运输,大部分采矿,炼钢,造船业,一个最大的银行,以及一个由每个部门行业参加的全国企业委员会。从能源供应、电信联络到幼儿教育、医疗护理等方面都是公共部门,职工达140万。每届瑞典政府都进一步扩大公共部门的范围,现在它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中最大的公

共部门,占瑞典国民收入的65.4%(英国占47%,美国35%)。长期以来社会民主党在教育、卫生、环保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不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管理,而是由公共部门来管理。它的教育制度全部是综合性的,男女合校,没有私有的,卫生事业也没有私有部门。

瑞典的合作社运动早在1850年就出现了,1899年成立了全国性的合作社组织,目前全国有137个基层消费合作社,瑞典的合作社遍及全国各个角落,涉及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从食品、服装、日用品一直到石油、化工、住房建筑、旅游服务,无所不包。瑞典全部家庭的一半以上是消费合作社的社员。中央消费合作社的组织在全国拥有1800个销售点,通过这些销售点销售进入国内市场的全部商品的20%,与私营企业积极地进行竞争。

瑞典重视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文教的发展。瑞典属于欧洲第一批消灭文盲的国家。早在1842年它就通过了一项法令,创立了公立的初级学校制度。这个法令要求瑞典的路德教国家教会的每个教区(瑞典95%是基督教徒)至少有一所永久性的学校,教区应当为所有儿童免费提供教育。在20世纪初,他们已经把国家预算的10-12%用在教育上。科技方面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2%。1987年对科研与发展的投资突破了占国民生产总值3%的大关。

第二,瑞典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最稳定的国家

瑞典社会民主党创建于1889年(就是第二国际成立的时候),经过1917年的普选,第一次参加政府,1920年单独上台执政,这在西欧、北欧是比较早的。后来十几年瑞典的政局动荡,到1932年社会民主党再次上台后,连续单独或联合执政长达44年(中间只有一百天的中断)。所以,瑞典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家。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同其它的社会党一样,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提出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国际民主。就国内来说,瑞典社会民主党标榜三大民主即三大目标。从瑞典的历史来看,也可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

纪的20年代,它是争取普选权和代议制,实现所谓政治民主的阶段;30年代到60年代是创建福利国家,争取社会平等(所谓社会民主)的阶段;70年代至今,则是争取扩大经济民主的阶段。

瑞典各个政党主要的分歧是在国内问题上,在国际问题上他们是比较一致的。政党的格局相对稳定,壁垒分明。有五大政党,两大集团,早在20年代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格局。根本原因是各个政党代表着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不同的思潮,不同的信仰、主张和政策,这五大政党是温和联合党(原名保守党)、中央党(代表农民利益的,原来它叫农民党)、人民党(就是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现改名为左翼党(共产党人)。前面三个叫非社会主义集团,后面两个称之为社会主义集团,双方力量不相上下,势均力敌。社会民主党虽长期执政,但它在议会当中很少占有绝对多数,所以在多数情况下,它不得不依靠别的政党的支持,有时靠左,有时靠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靠着左翼党的支持。共产党在议会当中议席不多,仅占5-6%,但它在两大集团力量对比中相当重要。在右翼联合执政集团内部分歧不少,只是在反对社会民主党搞社会主义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瑞典人比较关心政治,参加政党的比率较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只有10%的选民是“无党派人士”,90%的选民都有政治倾向。

社会民主党(在1984年)在全国有284个支部,党员人数达123万多人,占瑞典840万人口当中的14-15%还强,占成人当中的20%。除党员之外,它还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和拥护者。近十年来,其它政党的追随者的人数在减少,唯独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在不断增加。

瑞典工人阶级组织程度较高,它有422万劳动力,占总人口的一半,其中产业工人有300万。体力劳动者90%都参加了瑞典工会联合会,白领人员另外组织“中央职员组织”,有70万人。瑞典的中央工会联合会是最大工会组织,有25个分会,250万会员。30多年来,每次大选,70%的产业工人是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的,它是社会民主党的坚强后盾。在大选当中,工会是利用它的广泛的基层组织,动员工人投社会民主党的票,并给予经济资助,不少工会会员是集体参加社会

民主党的,多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在工人运动当中涌现出来的,二分之一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是出身于产业工人家庭,三分之一的议员本身过去就是产业工人,这个比例比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比例都大。

除了工会之外,社会民主党还建立了自己的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及其它组织,包括劳工与人民运动,全国领取抚恤金者组织,全国房客协会、人民之家以及规模巨大的工人教育协会等等。瑞典是一个各种社会团体众多的国家,几乎每个人都参加了不同的协会、俱乐部、学习班等等,这些团体经常举行聚会、郊游或其它活动。

第三、瑞典是“典型的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泛指西欧及其它地区实行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基本内容是:在混合经济的制度下,由政府来推行“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社会福利”等政策,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贫困、不平等之类的“弊病”。所谓充分就业、公平分配和社会福利政策,实际上就是国家通过就业政策、分配政策、税收政策对生产、分配、消费的一种干预,而“福利国家”的核心实际上就是社会福利政策。所谓“混合经济”就是在所有制形式上,实行国家、合作社、私人等经济并存,以私人经济为主的制度。在分配上,保证资产阶级的应得利润,又坚持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社会福利制度,从而尽

可能缓和劳资矛盾,谋求两大阶级之间的“谅解”和“共存”。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坚持市场竞争的原则,国家主要是通过财政和税收的政策调剂社会需求的办法来促进和调节经济的发展。既要鼓励经济竞争,国家在必要时又要对经济进行合理的干预。

在瑞典,国家掌握有8—10%的工业企业,国营经济支配着基础设施的要害部门,但绝大部分的企业是归私人和合作社所有,一方面是强大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国家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各种不同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主要从以下四方面来看,瑞典在福利国家当中都是名列前茅的。按“混合经济”的定义,瑞典的各项有关指标在所有福利国家中都占首位。比如私人企业在生产领域当中占90%,比奥地利(是70%)、英国、法国、意大利(是80-85%)都高,国家干预方面,在分配领域内,各类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其它的西欧国家是35-40%,还有其它的许多方面,就不详细谈了,这是瑞典福利国家的第一个特点。

瑞典福利国家第二个特点是较低的失业率,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实现了充分就业。战后以来,瑞典政府保证失业率不超过1—2%。据官方的统计,繁荣时期失业率在1.5%,危机时期不超过2.5—3%。这个失业率与战后西欧危机时期较高的失业率相比,它是最低的。

第三个特点是“收入均等化”,就是拉平各个社会集团的收入和使全体居民保持较高的生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老城

活水平,用重新分配来为社会服务,主要是通过税收前的保险转移、累进税和各种转移支付来实现收入均等。据1972年官方的统计,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收入最低的60%的人的税收后收入的绝对平均差距是3倍(即1:3)。所以,有人说,瑞典是西欧国家通过收入再分配后的一个最平等的国家。

第四个特点是社会福利设施完备、待遇很高,瑞典建立了一整套的全民社会福利制度,从产婴的补贴到养老金乃至孤寡家庭补助、教育津贴、培训津贴等等,应有尽有。政府在社会福利上的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75年占24.8%,高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它的福利规定是很详细的,有父母津贴、儿童福利,儿童从出生到八岁可以得到儿童津贴,每年3,000克朗(等于500美元)。八岁以后继续求学者可以领取助学金到20岁。中小学教育是完全免费,所有中、小学生可以获得午餐、课本、文具、纸张等等。大学预科、补习学校、假期学校的学生每月可以得到学习赠款、交通补助以及住宿补助等等。高等学校的学生可以取得赠款和无息贷款(偿还期为20年),如果贷款人参加了社会保险,在失业、生病、残疾或遇到其他意外情况时,可以推迟或免于偿还。高等学校还实行奖学金制度。还有医疗保险(包括医疗费用津贴、病假津贴、双亲津贴),失业津贴、工伤保险、伤残年金、老人福利等。国民健康方面开支大,超过了西德、法国、荷兰、英国、美国,在几乎所有要素上都优于其它福利国家。这对瑞典的经济、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连人们对福利的概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前人们衡量福利的最高标准是消费水平,现在则是从以下很多方面来衡量福利:1、医疗保健、福利、长寿 2、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 3、生活水平 4、受教育的机会和文教水平 5、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犯罪状况 6、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 7、文化娱乐活动 8、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关心 9、住房和地方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等等。

这一套福利制度是逐步发展起来的,这是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行的政策,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纲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人民间的伙伴关系”。在瑞典,福利制度已成为它的社会基础,即使在资产阶级政党

执政期间,福利措施也没有减少。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人民群众为争取社会平等而长期斗争的结果,这个制度和累进制的税收制度缩小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抑制了财富不均的现象,对社会安定起了积极作用。当然,也带来很多问题:1,公共开支庞大,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公共开支庞大直接的后果是造成财政赤字,上世纪20世纪70年代瑞典的财政赤字已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0—12%。2,经济实力受到削弱,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福利上,必然会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良影响。3,税收负担过重,比其他西欧国家更为沉重。实行累进税制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为减轻税收负担,工资收入者主张,对公司企业课以重税,但这势必增加产品成本,削弱了瑞典产品的国内外竞争力。

20世纪70年代后期瑞典经历了一个经济增长缓慢,赤字大增,债务负担沉重的艰难时期。当时对福利制度提出了疑问,经过十年以后,瑞典经济经过调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上面已经说到了,失业率为2.7%(最近的统计是1.6%),通货膨胀率是3.3%(西欧国家平均是3.7%),经济增长近3%,国际收支有相当的盈余。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庞大的福利制度总是会妨碍经济发展的,但瑞典的现实不能不说是这种想法的一种挑战。瑞典成功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既保持了公共部门的规模完整,社会福利不做削减,同时又取得良好的经济成就。它较小的工资差距和强大的工会力量,实际上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灵活性。

第四、瑞典是一个阶级合作的国家

“瑞典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妥协和阶级合作。首先讲瑞典社会民主党阶级合作思想的来龙去脉。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任主席布兰亭(1889—1925年)提出过社会民主党有三种手段:议会道路、阶级合作、政治妥协。提出要以改良主义与和平的方式实现瑞典的社会主义。他大体上提出了这条道路的构想和策略。

为了在实践中推行这个策略和构想,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任主席汉森(1825—1946年)提出

了“人民之家”的思想,认为平等、福利与合作是人民之家的基本要素,应当把它置于社会化长远目标之前。1932年汉森上台以后,就提出了系统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的指导思想就是按照团结、合作的原则,改变社会,奠定富裕的基础,为全体人民带来好处,强调要用阶级合作、消除分歧、互相妥协的方式来实现“福利社会主义”的目标,把瑞典建成一个“人民之家”。汉森还以他首相的身份向私人企业主发出正式的合作邀请,提出保护、支持和充分发挥私人的主动性,提出民主是唯一的秩序。瑞典社会民主党1944年的纲领就已提出“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公民合作的社会形态来代替以阶级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党的第三位主席埃兰德(1951年至1957年任首相)进一步使妥协政治制度化,通过“星期四俱乐部”、“哈普森民主”等方式,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取得各利益集团的谅解与合作。什么叫“星期四俱乐部”?这是由社会民主党1949年倡导成立的,每逢星期四活动,因此而得名。它是政府与企业界人士就重大的经济政策问题定期会晤的协商机构,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机构停止活动了。1955年,埃兰德定期邀请企业界人士和工会人士以及所谓社会各利益集团领导人到他的乡间别墅“哈普森”来,在政府的非正式主持下,共商国是,因此而有“哈普森民主”之称。社会民主党政府与各政党、各利益集团的这种合作,“使各个政党在议会就某个问题表决之前,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事先商量好了。”所以,瑞典的议会没有出现过重大的辩论,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到20世纪60年代末,阿德勒·卡尔松(现首相)的“职能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对瑞典式的社会主义作出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所谓“职能社会主义”,就是瑞典不主张搞那么大规模的社会化、国有化,主张对形成所有制的某些职能实行社会化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说所有制有好多职能,对它的某些职能实行社会化,而不是对全部职能实行社会化,这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企业的某些方面加以限制。他还提出要有意识地保持一种尽可能均衡的权力制度,既要制约所有权的滥用与集中,又避免社会内部的巨大

冲突,保存私有企业对经济生活的重大推动力。既要有私人资本的力量,又要有社会民主党执政和强大工会运动为后盾,形成与富有阶级相抗衡的力量。在经济领域创造一种把工人利益与所有主利益协调起来的合作气氛,使工人愿意工作,资本家愿意投资。

卡尔松声称,瑞典的这种实验证明,通过各阶级各团体都能接受的和平方式,即通过对形成所有权的某些职能实行社会化,就可能避免大规模的补偿,又可实行职能社会主义的社会化方针。他甚至认为,“瑞典模式”给两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有益的妥协形式”。他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可以避免,如果当今世界上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那么,他们就必然会在许多政治问题上寻求和作出大量的相互尊重而又体面的妥协。因此,任何能够帮助他们寻求这类妥协的事物也就能够有助于达到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瑞典模式由此就可以被看作是提供了有益的妥协形式”。

再次谈谈它的指导思想。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保持了长期稳定统治,执行阶级合作的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提出团结,这里指的是广义的团结,既是指雇主联合会与工会联合会的团结,又指各阶级之间的团结。社会民主党认为,雇主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两者不是阶级敌人,而把两者看成是争取社会经济进步斗争当中的伙伴,它是影响经济福利和阶级和平的力量。我们听起来觉得这不是阶级斗争观点太差吗?然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功绩恰恰是在于提出了社会平等的原则,它认为企业主和劳动者有共同的利益,这是“恢复和扩大经济民主的首要条件”。这个论点是他们一切言论的基本线索。

瑞典妥协政治形成的特殊环境和条件。

为什么瑞典能够做到这样,这有如下特殊环境和条件:①瑞典人口少,民族比较单一,几乎所有居民都讲同样的民族语言,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全体居民都属于同一个教派即路德教(占人口的95%)。不过很少有人对宗教感兴趣,宗教问题从来没有引起过党派的论战。少数民族只有两个,在民族问题上也不存在许多西方国家那样的矛盾,也不存在任何尖锐的地区性对立。因此,它没

有宗教的、民族的、种族的纠纷。特别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瑞典执行“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和平中立政策。1814年以来,170多年处在和平环境中。它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人说也是瑞典模式的一个方面,它的对外政策也有一套特别的东西。所有这些为它的妥协政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保证。②瑞典有较为长久的民主传统。1617年,议会确定了“四等级”的制度,所谓四个等级就是贵族、教士、市民(自由民)和农民。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同许多西欧国家不同,没有出现过革命起义和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公开冲突,双方宁愿走妥协和让步的道路。1809年欧洲第一部成文宪法废除了贵族特权,确立了议会民主制度,从而完成了瑞典从封建君主制向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和平过渡。从此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组合,开始形成了社会民主党和各非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均衡。③瑞典工人阶级在组织上高度统一,工会组织化程度很高。社会民主党因有这样强大的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组织为后盾,使它有强大的实力和资方相匹敌,达到权力平衡。这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妥协政治的坚实基础。更为重要的,它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为此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还有它的雇主以及其它政党,也不是说绝对对立而势不两立的,也是能商量问题的,所以他们比较现实,等等。这都是促成了瑞典妥协政治、阶级合作的重要原因。

第五、瑞典是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

瑞典有民主的传统,法治比较完备,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比较自由。

瑞典社会民主党注意发扬党内外民主,重视思想教育,经常组织党员参加政策讨论。如1984年新的“思想纲领”通过之前,就填写了征求意见的问题单,并把他们的意见写进了草案。它全年组织数百种训练科目和周末学校,通过国家资助办“学习班”进行长期政治和公共教育等。

同时在全国重大问题上,常通过公民投票(全民投票)的方式来解决。比20世纪如,像20世纪60年代行人靠左走改成靠右走的问题和1980年就核电站发展问题都举行过公民投

票,而且一切按投票结果来执行。

瑞典在向居民通报有关政府机关工作、各种机构的组织活动,制定决策、大型计划方面的工作也做得不坏。如对重大问题,政府都必须详细制订方案,通过与各党派、各大利益集团协商、妥协、合作,经充分酝酿,进行修改后,由议会作出决议。

在瑞典,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每年新生效的法律、法规、条例多达数百项,总共只有800多万人口的瑞典,竟有97个区法院,6个受理上诉法院,还有课税事务法院、公共事业法院及审理水力、住房、商业、土地及劳资纠纷等事务的法院。

详细说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系统也很发达。不但各项的福利都法律化、制度化,一个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也都法律化、制度化。比如瑞典的福利制度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凡是应该得到的各项福利待遇和国家的帮助而没有得到的,可以到法院起诉,有接受这种起诉的特别法院,叫公共保险法法院,全国共有三个公共保险法法院,斯德哥尔摩还有一个全国最高的公共保险法法院,凡对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判决不服的,可以上诉到那里,公民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而没有尽到的,比如说,偷税漏税等等也都要受到法律制裁。依法治国突出的表现在,瑞典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公开超越法律,不但部长和总理,就是国家机关也都可能成为民事、刑事的被告和原告。瑞典的刑罚很轻,犯罪率却很低。瑞典早已废除了死刑,最高刑期只有12年,以这样轻的刑罚维持这样好的社会秩序,真是令人吃惊的。他们最主要的一条经验是,严格地依法办事,做到不纵不枉。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重视对犯罪的预防和对罪犯的感化教育。瑞典有两个重要的国家机关,一个叫作国家监狱与刑事犯感化所管理局,它主要是管理监狱并致力于对已判刑关押的罪犯实行感化教育和智力培训;另一个叫作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这是由国会各政党与政府部门的代表组成的董事会领导的,目的在于动员和组织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促进在社会各个不同领域内的犯罪的预防工作。

(本文是作者在1988年12月16日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上的报告摘要)

(责任编辑 致 中)

《欧阳海之歌》作者 金敬迈的沉浮

● 张骥良

第一次捧读《欧阳海之歌》时,我才10岁。回忆读这部长篇小说的情景时,我还隐隐约约地记得,我的确被小说感动了好一阵子。记得我当年写下的一篇《欧阳海之歌》的读后感,还得到了三年级语文老师的一致好评呢。

一晃40年过去了,作家金敬迈又推出了一部新作《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这部带有纪实性的作品,记述了他被送进秦城监狱后的囚禁生活。

一部《欧阳海之歌》,把作家推上了全国文艺界的领导岗位,又一下子把他抛向谷底。全国文艺界领导顷刻间变成了阶下囚。在作家的身上,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作家金敬迈就坐在我的对面,平静地讲述着他的故事。那平和的心态和平静的语调,好像是他正在讲述别人的经历。

30万字小说仅写了28天 为省17元妻子熬了十几个通宵

作为一个话剧演员,金敬迈需要经常下基层体验生活。在下去体验生活的过程中,他听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叫欧阳海的普通战士,因为和指导员闹矛盾,越级给军区一位领导写了信,信中详尽讲述了他和指导员闹矛盾的由来和发展,后来这位战士竟被火车轧死了。这个故事在金敬迈的内心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怀着极大的好奇心,以及对这个敢于抗上的普通战士的尊敬,金敬迈深入到欧阳海所在的部队采访。短短五六天的采访之后,金敬迈的内心充满了创作的冲动。他以每天一万多字的高速度,夜以继日地笔耕着。仅仅用了28天,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脱

稿了。作品是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一位领导审查的。这审查的方式也颇为独特,作为话剧演员的金敬迈声情并茂地朗读着,那位首长静静地听着,其结果是朗读的人和倾听的人都泪水涟涟。当金敬迈读完小说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自然段,那位文艺出版社负责人当即表示,小说可以立即交付印刷。

这时一位大首长发话了,让金敬迈把欧阳海与指导员闹矛盾的相关情节改动或删除,理由很简单,指导员是党的代表,是基层政治思想工作的化身。那位首长



1966年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金敬迈(右一)陪同巴老(左四)会见外宾。左一为胡可,左二为李季,右二为胡奇

的口气很硬性,如果不改动或不删去,小说不能出版。这部分内容是最触动作者心灵的,金敬迈舍不得改,可不改书出不了,他只好硬着头皮动笔修改。

又要对原稿进行修改,又要请上级领导审查,可作者手里只有一份手稿,怎么办?只好请人重抄一遍。于是他找了几位高中生,商定每万字付酬2元的价格。可抄这30万字也得60元呀!这60元钱从哪里来呢?金敬迈犯愁了。还是妻子从箱子底翻出了岳母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一对金戒指。妻子把这对戒指送到了玉器商店,只卖了43元,其余17元还是没法解决,妻子只好下班后自己动手,熬了十几个通宵,重抄了小说的部分章节,为家里省下了那宝贵的17元。

小说印了两三千万册仅得稿费2240元 上缴党费1700元只添了一台新收音机

小说《欧阳海之歌》是先在上海的一家大型文学刊物《收获》上发表的,那是1965年7月,同年10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小说。小说一出版,北京王府井大街新华书店就排起了长队。为一本新出版的小说排长队,在国内的出版史上还极为少见。

小说出版后,全国许多报刊都纷纷连载,第一版就印了15万册。老一辈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说:“这么好的作品,印1500万册也不多。”

这本小说究竟印了多少,连作者本人也不知道。总政治部文化部谢镗忠部长说查查《欧阳海之歌》究竟印了多少?可不能超过《毛泽东选集》呀!否则就要犯大错误了。检查的结果让他放心了,小说共印了两千万册,具体的数字当时就无法查清了。小说印得如此之多,卖得如此之火,当然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在改革开放,文艺全面繁荣的今天,一本颇为叫座的小说,出10万册已经不得了了。

小说印得如此之多,发行范围如此之广,作家本人究竟得了多少稿费呢?当作家平静地说出了这个数字2240元,连后来的200元修改费也包括在其中了,着实令我吃了一惊。就是这一点稿费,还被作者将其中的近四分之三交了党

费。作家给我算了这样一笔账,先是还了300多元的旧债,买了一台收音机,余下的1700元钱全部交了党费。几年之后,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逮捕他时,还下令冻结他的银行存款,其实他们全家唯一的存折上还有600多元。

十二年内三次修改 创作自由从何谈起

《欧阳海之歌》在出版后短短十几年里,连续进行了四次修改。在修改了欧阳海与指导员闹矛盾的内容之后,江青又通过总政文化部谢部长传达她的指示,欧阳海牺牲前的心理活动那个段落必须改。这段内容许多老同志都比较赞赏,陈老总、陶铸同志都认为很好,没有再次修改的必要。陶铸同志明确地告诉作者:“不要一听到什么意见就改。今后关于这本书的修改,你要先通过我,你是我的兵,我说了算!”尽管有陈老总、陶铸同志的肯定,迫于政治的压力,金敬迈还是对小说作了修改。在欧阳海牺牲前的心理活动中,加进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又怕过于突出个人,



又加上了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修养》里面的两段话,起到了平衡的作用。作家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平衡不要紧,又被江青抓住了把柄。

作家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67年春天,在北京的京西宾馆。江青找他谈了一次话,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训斥。江青对他的这次修改很不满意。一是说他小说的

结尾,欧阳海牺牲前的那些情节,是苏联修正主义大毒草,影片《雁南飞》的翻版,二是谁指使他把黑《修养》里的两段话加上去的,江青怀疑是陶铸的指使,还说了许多陶铸同志的坏话。在作家的眼里,江青并不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文艺旗手,倒像是一个搬弄是非的长舌妇。三是作家由于引用了毛主席、刘主席的两个人的话,而且是同时引用,说他是在搞两个司令部。这可把金敬迈吓出了一身冷汗。一个从话剧演员成长起来的作家,仅仅因为同时引用了两位领袖的话,怎么就成了要搞两个司令部呢。这次的修改,他删去了刘少奇同志的两段话,干脆把欧阳海牺牲前最后四秒钟的描写统统删去。

最后一次的修改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了。

1978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约作家对全书再一次进行修改。他勾掉了“林副统帅”的名字,这一点作家是通情达理的。六年前的那个秋天,这位“副统帅”早已灰飞烟灭了。作家再一次对“最后的四秒钟”的情节做了完全符合原意的修改。令作家感到深深遗憾的是,关心过他的刘少奇、陈毅、陶铸等老一辈革命家都不在了。

沾小说的光进了中央文革小组 受江青的伤关进秦城监狱

仅仅因为一部《欧阳海之歌》,金敬迈从一位普通文艺战士,一位班长都没当过的小兵,一跃成为了中央文革小组文艺口负责人,接管了文化部。如果金敬迈不进中央文革小组,不接管文



金敬迈(左)摄于抗击非典时期

化部,也许他就不会遭此十余载的厄运了。

1967年6月,金敬迈刚刚接管文化部不久,一位电影口的女同志向他反映,中国电影家协会资料室里,有不少涉及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资料,很多当年的报刊上刊有江青的照片。这位女同志原来就在影协资料室工作,她反映,红卫兵进

入这个协会后到处乱翻,他们也进入了影协资料室,说要翻阅当年的旧报纸,要从报上找《脱党启事》、《悔过声明》,抓出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叛徒。那位女同志担心红卫兵看到江青的照片,看到有关江青的资料,怕影响不好,有损于毛主席的声望。她建议先把这些资料收上来,金敬迈也同意了这种做法。可这一收,让红卫兵发现了怎么办?他们好奇心强,一定要问清为什么收?金敬迈心里也没底,真不知道这事该怎么办好。他就去请示戚本禹。两人正说话间,江青进来了,问金敬迈说什么呢。见到江青,金敬迈紧张起来。看来是搪塞不过去了,他只好吞吞吐吐道出事情的原委。本来是好心好意想办好事,生性多疑的江青竟通过谢富治的一张《逮捕证》,把作家一下子投入到秦城监狱。

从中央文革文艺口的负责人,一下子沦为阶下囚,从人生的顶端跌入人生的谷底,整个过程一共用了120多天。人生的落差如此之大!当时他的罪名是“搜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定性是“现行反革命”。作家被只透出一点光亮的铁窗一关就是2684天,走出高墙电网后,他依然没有获得自由,又被劳改了485天,好容易获得自由了,又被挂起来733天。入狱、劳改、挂起来的时间加在一起,竟长达11年之久。令作家感到欣慰的是,这样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党的文艺政策十分宽松。让他欣慰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塑造的欧阳海这一艺术形象,没有被岁月的风尘所覆盖,欧阳海仍然是共和国亿万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责任编辑 吴思)

王森然：被冷落了半个世纪的学术大师

● 李一鑫

王森然的条目在1979年版《辞海》和1982年的《辞海(增补本)》上均告阙如,1989年版仅有“中国学者”等十余字,1999年版才新加了百余字,特别是有了“早年投身五四、五卅等运动,在华北、陕北、山东、绥远传播新文化和进步思想”,以及“学识渊博,于教育、文学、史学、艺术理论、绘画均有建树”等评价。近日偶在网上搜索,竟发现有关王森然的条目有335项之多,说明历史毕竟看似无情却有情,已有不少人注意到了这位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大师。

翻开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王森然画集》,扉页上,首先进入眼帘的则是一个59个字的特短题跋,无具名,文分四行,似诗非诗,深寓未便明言而弦外有音之意:

他在特定的历史风云中,被迫重新拿起了画笔 / 他在生活的最“高”点,俯视生活 / 他以特殊的题材和风格,表现他的人格和画品 / 他记录着时代的悲怆

这么少的文字,却很惹人玩味。为什么说“被迫重新拿起了画笔”?为什么给予他“在生活最‘高’点俯视生活”这样不平凡的评价?为什么说“他记录着时代的悲怆”?……

在这本画集卷尾,有刘海粟大师动情地为老友王森然写的长达万余字的“小传”,实为带泪祭文。内中说到1949年后的一大段时,出现这样一句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王森然被‘控制使用’。”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什么?刘海粟何以要用故意隐晦却又显然是执意不予漏掉的话语,挂上“被‘控制使用’”这么一笔?

王森然究竟是一个何等样人呢?下面,根据

刘海粟的长文及其他若干资料,作一简介——

追求真理 播种真理

王森然,1895年生于河北定州。幼年时曾目睹八国联军追逐仓皇西逃的慈禧时在京汉铁路沿线烧杀抢掠,从此激起了他一生为救国而献身的决心。上学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的著译,孙中山、邹容等的革命檄文,都是他爱读的课外读物。武昌起义消息传来,16岁的他第一个剪去辫子,并号召同学起来响应革命,因而被学校开除。旋而定州青年成立同盟会外围革命组织“统一共和党”,他被推为负责人。孙中山路过定州时曾特命停车,召见了这位热血青年,并大大予以期许勉励。

1917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到王森然刚毕业于其校的定州第九中学作教育改革演讲,作为学生会长的王森然陪同接待,以其言谈志趣大受蔡先生赏识。其后,二人成为师友之交。王森然曾称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蔡元培。五四运动爆发,已在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就读的王森然发动学生上街演说,组织罢课罢市,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行动。接着,他又作为保定学生会代表赴京声援,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何孟雄、刘半农等风云人物,而与当时北大学生、北京学联领导人之一的邓中夏交谊最深。1921年,保定直隶高师成立了宣传普及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化研究会,王森然被选为会长。经邓中夏介绍,他曾参加长辛店工人夜校活动,并开始陆续

在《学林》、《文化评论》、《猛进》、《语丝》等刊物发表文章,正式成为一名自觉的新文化运动宣传员。

此后,王森然先后在保定、北京、冀州、济南等地从事中学教育,受他影响后来走向革命或有所成就的有安娥、李培之、李广田等。不久,他被直系军阀曹锟视为“过激党”而遭到通缉,因受到学生保护才得逃脱。1924年初,由李大钊、林语堂推荐,王森然到陕北23个县的唯一完全中学榆林中学任教,校长是开明的教育家杜斌丞。其间,有许多后来成为革命家的如刘景桂(即刘志丹)、谢子长、王子宜等都是他的学生,从他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当时驻军榆林的杨虎城将军曾慕名拜访他,多次请他到寓所谈书论事,天下大势中国前途无所不包,从而建立了良好的友谊。杨虎城成为爱国进步将领,与王森然的思想影响不无关系。

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王森然历任多所著名中学教师,和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中正大学、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国立北平艺专等院校教授,还兼任过一些报纸副刊编辑。在课堂上,他积极提倡教育改革和文学改革,主张学生独立思考,启迪青年革命意识。在五卅、一二·九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爱国运动中,他与青年们站在一起,曾遭军警水炮浇湿棉衣。在30年左右的教学生涯中,他之所以不得不在华北、西北、山东、东北等多地辗转工作,逃避通缉是原因之一。他先后著有《中学国文教学概要》(蔡元培作序)、《文学新论》、《近代名家评传》、《印度革命与甘地》等,并受蔡元培托付,为推进中国妇女运动,编写了126万余字的《世界妇女运动大系》。但他所费心血最多,影响最大的著作,则首推《近代名家评传》。

顺便要说的是,王森然虽曾在艺术院校授过课,但主要是教艺术理论,主讲《中国近代画史》、《中国艺术概论》,作画却纯属业余,只在读书写作之暇偶尔涉笔丹青。但由于自幼偏爱,潜功深厚,又立意高远,他的文人写意画别具风格,竟每每被公认为上品,受到齐白石、刘海粟、张大千、李苦禅、王雪涛等大师的激赏。齐白石甚至有“人曰森然弟学我,我曰我学森然”的题句。不过王森然却从不认为自己是画家,所收弟子甚

少,著名画家赵望云、原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张启仁是寥寥者中两位。

解放战争胜利,王森然更加意气风发。刘海粟所写的纪念长文中这样写道:“他随大军南下,被聘为武汉军管会顾问,还担任了中南区临时政府文教接管部副主任。”“建国之初,陶铸、邵式平分别请他到广东、江西工作。”紧接着的文字却是:“因老母病重,回到北京,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王森然被控制使用。……”

刘海粟的文章很流畅,唯独此处结结巴巴,“老母病重”是推却一切聘请唯独接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何况是开始不分配课,后来“多亏茅盾先生”努力才分配了少量课的半赋闲教授)的理由吗?显然,海粟先生行文至此,用语上颇费了斟酌。

从此开始了王森然寂寞的后半生,时年54岁。

眼底乾坤 笔底春秋

文人贾祸或讨嫌,往往与文字有关。翻检他的著作,学术类居多,涉及政治的有两部:一是《印度革命与甘地》,一是《近代名家评传》。30万言的《印度革命与甘地》是中国学者评介印度历史、现状和革命形势,以及甘地的主张和作为的第一部出版物。王森然虽然称赞了甘地反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不妥协精神,但并不欣赏他的非暴力主张。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作者有“希望甘地一变其以往之无抵抗主义,而为积极的抵抗主义”这样的话。尽管当时政治文化圈内颇有借宣扬甘地而鼓吹非暴力的“第三条道路”,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革命的一些人,但他这本书却跟这沾不上边。

《近代名家评传》共出版了两集:初集、二集,皆以较浅近的古文写成。初集出版于1932年,二集较晚,内容包括了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初思想学术方面对社会有影响的“大家”一级人物。王瑞征为初集所写《原序》中认为,说它是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变迁史”更确切。王森然曾说:写“传记无须为贤者、尊者、亲者讳,是什么说什么。凡是推动过历史前进而

为人民做过好事,在学术方面哪怕一点一滴超越前贤者,都不能抹煞。”以初集 20 人为例,包括严复、康有为、章炳麟、梁启超、周树人、章士钊、胡适等人评传外,还有林纾(林琴南)、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等人评传,杂陈并列,不以观点同异关系亲疏为取舍,也不以瑕掩瑜。当年王森然第一次被通缉,原因之一是康有为曾在曹锟面前指王森然是“乱党追随者,应除之”。但在《康有为先生评传》中,王森然仍以 14000 多字大讲康变法图强事迹,承认他“不失为近代文化史上一大杰人”。

不过,初集 20 人评传中政治上最敏感、最受各界关注、文笔也最精彩的两篇,却是当时一被杀一被囚的两位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的评传。正是这两篇评传,最集中地表现了作者的刚正勇敢。由于作者与写作对象都有十年左右交往,对他们存有深深理解和敬重,字里行间充满了激情。初集出版时,由于有这两位敏感人物,一时竟找不到赞助商,是王森然艰难筹款加上自己掏钱印出的。

《李大钊先生评传》是在李被杀害后白色恐怖弥天盖地之际成篇,首先发表于《大公报》的。文中详述李大钊被捕及牺牲经过,并高度评价其人格:“一生勤朴清直,艰苦卓绝,洁身远名,不营时誉,尤不治生产,生时仅可供家食,歿后则一贫如洗,棺椁衣衾,皆为友助;对友无论党之异同,均和易平直,表里如一,临事不苟,临财不得,是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者也。”并指出这位就义者实为“中国思想界之重镇”、“现代不一二见之哲人”。而今天读来更有意味的是,评传中透露,李大钊“最初与胡适等同执渐进主义”,后来才主张“激进”革命。又说李大钊对革命前景的预想是:“历史之发展,乃由孤立向联

合进动,由战争向平和进动,由反抗向协合进动,将来之计划,为依科学原理所组织之协合。”在这片话里,找不出这位最早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曾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越深入发展斗争越激烈的“斗争哲学”论调,相反,他倒是把“联合”、“平和”、“协合”作为历史“进动”的规律和归宿。这一点值得注意。

评传又叙述李大钊牺牲后,家属一直无钱营葬而厝棺于寺庙中,北大校长蒋梦麟两次发起募捐,仅得 572 元,才得在万安公墓买地下葬。于是评传末尾有这样一段激愤文字:“国人不知尊之敬之,而权贵之怒睨其旁,朋党之积怨其后。先生宁以身殉党,以死偿学,不肯屈法以求容,其忠于主义,勇于任事,以视后之尸窃高位,伺敌人之喜怒,以媚取荣者为何如也!以中国之最大政治家兼学术思想界之巨子,立遭惨杀,而无反应,遂知我中国之积弊,莫之能革,正先生之所谓人群死,故衰 涣靡,荡然无纪,以至于此也。悲夫!”

这一段很动感情,且话里有话。“朋党之积怨”云者,在李大钊就义的 1927 年,应是指当时国民党右派发动流血的“清共”事变,破坏大钊先生奔走促成的国共合作;而“尸窃高位”媚敌求荣者也应是指后来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的蒋介石,不应作别的猜度。在那段岁月,能把话说到这样明白程度,也就够有勇气的了。

而《陈独秀先生评传》就更显示出作者的独立思考精神。写这一评传时,正是中共中央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托派反党集团这两个代表人物的罪名将陈独秀开除党籍,而国民党又把他作为劝降不从、“危害民国”的危险分子关进监狱之后,全国政治、思想、文化界议论纷纷,对其人其事臧否迥异,明哲保身者则避免涉身其中。在这样敏感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王任重(右)看望王森然

刻写陈独秀评传,所冒风险可知。但显然,王森然根据其阅历和良知,有着自己的明确认识和思路。

评传开头就把陈独秀的独特个性写了出来:“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而且“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作文时,常用手摸脚,酷闻奇臭,文章则滔滔不穷……”

对陈早期那些人所皆知的活动,评传中以一页带过,但有两节看似闲笔却是有意铺垫的文字:一是说中共建党之际陈曾“赴莫斯科,住约二月,回国后被派为共产党总秘书,直接受莫斯科命令,指挥各地共党活动”;二是说“陈在共产党大权独揽,威令森严,”以及“掌握共产党家长之权”等。这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话,而是与后来的事情发展有密切关系的。陈的“好为断制”和“狷急”性格,固然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的主观导因之一,但“直接受莫斯科命令”和照莫斯科的模式、规则所建的党,无法不先天地决定了党的领袖“大权独揽”的“家长之权”,以及各国“家长”又听命于国际“家长之权”,这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成为不独中国共产党,也包括各国共产党的一个有共性的特点。评传的这一伏笔,是引导读者深刻解读陈独秀的悲剧,以及个人悲剧外的各种延伸现象的重要线索。

为节省笔墨,本文把评传中所讲述的陈独秀

何以身受共产党、国民党两方严重处罚,终至锒铛入狱,以及蔡元培、杨杏佛、胡适、宋庆龄等联名致信国民政府为之辩白营救的经过,略而不谈,而主要谈评传对其人的评论。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前后至他逝世前的思想变化,即一时被贬意地称为“陈独秀主义”的内涵,王森然也应是有所了解的。首先,陈独秀对君临于中国党头顶之上的、名为共产国际实

为斯大林的绝对领导,越来越不满,在中共领导层曾引起多次争论(《炎黄春秋》2003年第11期《陈独秀的几封告别信》一文,对此有详细叙述,可参阅)。对大革命失败,中共及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这一后果,陈替斯大林的瞎指挥背了黑锅,而陈的分辩又受到压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逼他承认错误,使陈无以自处,是促使他与当时的中共“分裂”的表层原因;而作为五四精神倡导者的陈独秀头脑中所深植的民主和科学理念,与斯大林强硬的跨国专制发生激烈碰撞之不可避免,乃是深层原因。分歧焦点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是民主的还是高度集权的?共产国际应该是民主的还是高度集权的?在国际共运中首先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反集权专制、反个人崇拜的斗争,当然绝不能为斯大林所容忍,也暂不可能被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土上刚刚建党几年的中国党(包括其领导层)的大多数所理解和接受。

在这样当口,陈独秀对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独裁,反对斯大林让中共与国民党联合并接受其领导的方针,觉得如遇同道。而陈独秀既已离开中共,言责自负了,便也开始发表激烈抨击斯大林统治下苏联党和国家的不民主体制的言论。这是“托陈反对派”形成的思想基础,也是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愈走愈远的原因。

陈独秀入狱立即成了爆炸性新闻,国内外各

界人士各种媒体议论纷纷，大抵就事论事多，深刻评析少，而鼓掌称快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为之不平呼吁公正审判者亦有之。《陈独秀先生评传》客观引述种种舆论，但所有引述都不出三言两语。然后，评传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 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毅力，无用武地。吾不仅为先生惜，吾将为吾民族哭矣。…… ”

接下来，评传大段引用了陈独秀五四前后发表的一些著名文章，第一篇就是《爱国心与自觉心》。整篇文章反复说的是爱国心与自觉心的关系：“ 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可惜”；“ 人民权利，载在宪章”；人民有爱国心是“ 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人民建设国家，“ 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 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 国家”在马克思主义语汇中，是指国家机器，或者说指执政的“ 团体”、架构。在陈独秀这里，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不仅是主从关系，人民是主，国家是从，人民至上，不是国家至上；而且简直就是交换契约关系，你保障我的权利，为我谋福利，我就爱你，为你尽义务，否则就是罔（糊涂的）或殆（危险的）。这样的话是 1915 年即约 90 年前说的，但即使今天读来也还是新颖的。其余所引的如《敬告青年》、《实行民治之基础》、《法律与言论自由》、《何谓新文化运动》等等，都涉及人的自主权，讲的民主和自由。

可以看出，评传重新引述陈独秀这些脍炙人口的旧作深意在于，透过彰显陈独秀作为始终不渝的民主、自由、科学和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捍卫者本色，说明其一生的作为。

应该说，这是评述陈独秀其人的第一部正确、全面、具有力度的评传，它出现在陈独秀最孤立最困

难的时刻。

但是，这位党外爱国进步人士、五四精神的坚定信仰者所写的评传，与那个时期中共的有关决议精神相悖。

茕然之身 浩然之气

于是解放初期，如刘海粟所说，王森然却“ 被迫拿起了画笔”。但刘海粟有一句话并不准确：其“ 原因”并非“ 众所周知”。朋友不知道，家人不知道，连王森然自己也纳闷。不过，解放后有一个从前没有的新规矩：每个工作人员都要“ 服从组织分配”。王森然从来积极于工作，恬淡于名利。他接受了组织分配，接受了他生来尚未品尝过的相当安闲的活法。他引用一个前人题句以自慰自励：“ 老夫自有安闲法，八苦交煎总淡然。”

然而他天性安闲不下来，几年之后，吴祖光偶然见到王森然的一部文稿，由齐白石题签，名为《春妃秋郎阁剧目》，字数百万上下，全部以工整的小楷写就。那是王森然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极少量授课之外，“ 业余”搜集 17 个民族的剧目文献，整理编写而成的。吴祖光大为惊叹说，这一事若由文化部组织写作班子来做，也需很多时间功力！

王森然还将四本古代绘画理论：《山水论》、



1981 年 习仲勋（左）和王森然在一起

《山水诀》、《青在堂画学浅说》、《梦幻居画说简明》,逐一作了今译和详注。因此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他拿起画笔时间其实并不多,仍属偶一为之。1965年他一个妹妹向他索画,他画了一幅山水,题款说“荒疏多年,汗颜制此……”可作一证。他画集中大部分作品是十年动乱才开始画的。当时,他被扫地出门,所有书籍、资料通被没收,子女亲人亦不得见,仅给他一间局促小屋独住。被揪斗之余,他只能伏在床板上作画。即便如此,画中仍表现了一个追求真理的学人气节。

如1974年,正是“批林批孔批周公批现代大儒”声浪日高的时候,他的一幅《水仙》,题款曰“断绝人间烟火色,水仙神色冷如冰!”令人忽想到画集扉页似诗非诗的“站在时代最‘高’点俯视生活”那句题跋;同年的另幅叫《冷雨芭蕉》的纯黑泼墨,题款“留得窗前破叶,风光已是残秋,潇潇一夜冷雨,白了多少人头!”在那叶破秋残又逢连夜冷雨之际,他忧心的不止自身,更忧心中华大地彼时彼刻又“白了多少人头”。

1976年是中国连殒巨星之年,天安门血染悼念的白花,而秋天四害就擒。81岁的老人连续作画。一幅曰《劲节红泪》,画中的老竹,呈少见的红褐色,题字为“珊瑚节,红泪痕。”一幅是《秋信入田家》,画的是一个籽实饱满的老玉米,题曰:“香风生野陌,秋信入田家,乙卯立秋京郊丰收在望。”心情直透纸背。从此以后,他的画大都亮丽鲜艳了,题字也活泼俏皮了。如一幅是红萝卜大白菜,题款:“料理清蔬好过年,菜挑常常过门前,大家休笑无颜色,也活余龄八十三。”又一幅是仙人掌,顶着几朵红花,曰:“尔乃仙人掌,多刺不闻香,古来无人画,试试又何妨?”一幅漫题“武斗”二字,画两只小蟋蟀酣斗于小小瓦罐中,均不乏哲理意味。

老人的画愈到后来愈简练。有两幅可能是他自喻自况:其一,无题,一小盒牙签,题道:“有缝就钻,无孔不入,去伪存真,剔其糟粕。”他做学问从严求真,做人亦如是。另一幅也无题,是一把笤帚,题道:“一把破条帚,曾扫千万户,家家需要它,为人民服务。”话通俗而意邃远,似人生教科书。

他的画,被识者评为“为现代文人画开一代新风”。他的画,确实“记录着一个时代的悲

怆”。

1979年,画界友好在中山公园为他筹办了平生第一次画展。王雪涛为画展题词:“森然学长诗画一家风”。李苦禅题词:“吾辈一生追求便是如此”。齐百石四子齐良迟的诗末句云:“会须来者传千古,都作他年供状看。”

学人遭际 党国损失

王森然1984年90岁时去世。他未曾出版的若干讲稿,如《史学概论》、《秦汉学术史》、《宋元明清学术史》以及很多艺术论稿,大量个人笔记、资料,都随浩劫扫尽无遗。王首道同志有感于王森然的遭际,曾说:“王森然先生为新中国奋斗了半生,新中国却亏待了王森然。”这一遗憾的话语,当然不是笼统地批评“新中国”,而是对过去的保守、自闭、狭隘的用人政策的含蓄批评,更可以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一位领导同志,从“立党为公”的立场出发,所做的自我批评。

历史沉淀到今天,许多往日是非渐已水落石出。但耽搁了王森然后半生的“人所共知的原因”之谜,似乎还应带给人们更多反思话题。王森然是一位从学养、社会贡献到个人品德都可以用“为人师表”四个大字美誉而毫不过分的大知识分子。他的遭际不是个例,几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有王森然类似遭际的事例又有多少?若干个人为此蒙受损失外,党、国家、社会又蒙受了多大损失?王森然这样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只成追忆了,但为了今后能更好地落实越来越重要的团结、尊重知识人才的政策,为了涤荡旧思维,转换新思路,迎接新时代,在用人制度上进行更大的改革,使其真正公开化透明化自由化平等化,不仅于党于国于世有利,也是关乎人权的大事。

王森然逝世后,许多老同志(其中不少是当年在西北局工作的)和各界名流举行了相当隆重的追悼会。习仲勋、刘澜涛、王首道、王任重、黄华、周巍峙、董纯才、吴祖光等都有声情并茂的悼文,其后,又成立了王森然学术研究会。他的巨幅画作《松鹤朝阳》、《群鹰图》进入了人民大会堂。据说,东瀛友人誉他为“传记作家”,还为他筹建了纪念馆……

(责任编辑 致 中)

党史小说《红岩》 中的史实讹误

● 孙 曙

小说《红岩》自1961年12月北京第一版出版后,十分畅销,影响广泛,曾被当年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誉之为“党史小说”,直到今天,仍有人把《红岩》当作昔日重庆及四川地下党斗争的历史纪实。小说中的人物时常被人们拿来与现实中真人“对号”。近来重庆沙坪坝磁器口搞“千年古镇”旅游开发,甚至为《红岩》中的虚构人物华子良修建了“华子良事迹陈列室”。这说明许多人确实把这部小说当成真实的历史纪实在看待。

最近,笔者对照敌特供词档案及文史资料,重新拜读了《红岩》,发现这部“党史小说”从史实的角度看,有不少史实讹误,值得商榷。(本文所引小说文字见于2000年7月北京第三版《红岩》)

是谁造成了大破坏

《红岩》的全部情节是以1948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为背景展开的。1982年10月17日,原地下党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嘉在川东暨重庆地区党史资料座谈会上说:“一些人习惯于把这次破坏事件叫做《挺进报》事件,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并非由于《挺进报》收抄传递新华社广播消息,编印、发行出了纰漏才造成了大破坏事件。只有陈柏林由于看《挺进报》被特务发现而被逮捕。整个重庆和川东地下党大破坏事件,是由一连串叛变事件组成的,主要是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造成的,应正名为‘刘、冉叛变事件’。”

这里提到的刘国定,冉益智,是当年中共重

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是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分管工人运动),冉是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分管学生运动),由于这二人的叛变,导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又引出一系列叛变事件,先后叛变的还有李文祥(重庆市城南区委书记)、涂孝文(中共七大代表,川东临时工委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骆安靖(上川东地工委委员)、蒲华辅(川康特委书记)等领导干部,在总共叛变的12人中,领导干部占了一半。正是由于这样一些领导干部的叛变,才造成



了重庆以至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大破坏,也才促使当年狱中难友们集体形成的给党组织的七条意见中,第一条就提出要“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确是“血泪的嘱托”。

而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却只是一个沙磁区委委员。这样一个小角色,能造成那么大的全局性的破坏吗?这不仅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使得前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深刻教训被淡化了。

“磁器口大血案”与“中美合作所”

1949年12月6日,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二处派一科科长刘祥纶接管了原国民政府保密局公产管理组等在渝机构。缉凶和弄清包括较场口血案、磁器口大屠杀等事件真相,是重庆公安机关镇反肃特斗争的一项内容。

重庆解放初,把杨虎城、宋绮云两家和渣滓洞、白公馆、新世界饭店(“丙种会报”看守所)等处关押的政治犯被杀害事件,统称为“11·27大屠杀”。1950年春节前,在渝女师(现大同路小学),举办了“磁器口大屠杀革命烈士遗物展”。当时,还没有把这屠杀事件和“中美合作所”搭界。后来因政治需要才改称为“中美合作所大屠杀”。

中美合作所与那场大屠杀有关吗?答案是肯定的。1954年,重庆市公安局对重庆市特务、间谍组织及人员进行了清理,查明:

原国民党政府保密局重庆看守所,俗称白公馆看守所。1939年秋,从小龙坎枣子堡军统临时看守所迁入。1943年春,白公馆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原看守所迁渣滓洞。1946年七八月间,贵州息烽监狱、重庆望龙门看守所陆续撤销,息烽的72名政治犯和望龙门关押的嫌疑犯移禁渣滓洞。1947年4月,看守所迁回白公馆。1949年11月,白公馆看守所共关押54人,其中属白公馆看守所关押的政治犯、嫌疑犯、特务违纪人员27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的27人。“11·27”杀害28人(白公馆20人,二处寄押8人,其中一人中3枪未死),放7人,脱险19人(系二处寄押,内有小孩2人)。

渣滓洞看守所。1947年10月,国民政府重

庆行营(1948年6月改名国防部重庆绥靖公署,1949年4月改名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接手关押“丙种会报”在“六一”大逮捕时逮捕的40多人,徐远举签请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批准,将重庆行营新闻处所属青训大队改为重庆行营军法处第二看守所,实际上归徐远举管辖,二处派二课上尉参谋李磊任所长,警卫组中尉组员徐贵林任管理组长,另外派了事务长和一批看守兵。12月,渣滓洞看守所恢复,先后关押政治犯300多人,包括重庆、成都、内江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逮捕的共产党员约50人;计划组织“小民革”地下武装8人;重庆行营军事机关送押的新四军被俘官兵7人;因《挺进报》事件在重庆、万县、广安地区被捕的110多人;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被捕的80余人;遂宁横山区区委书记叛变后出卖被捕的10人;1949年1月,川西地下党被破坏后被捕的约30人;因组织“民革”地下武装被捕的11人;1949年9月18日,从望龙门移禁来的杨虎城将军随从2人。

这些关押人员,在北平国共和谈前后和以后释放了39人,病死5人,有人名但情况不明23人;“7·21”、“10·28”在大坪屠杀12人,“11·14”在芭蕉沟南垭屠杀30人,“11·24”杀杨虎城随从2人,“11·27”屠杀188人,脱险34人。

而中美合作所与上述关押、屠杀政治犯事件均无关系,1942年底,《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在重庆拟成,1943年元月开始办公,1943年7月1日,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将钟家山、梅园、白公馆、松林坡等地划为特区,不准他人进入,军统特务亦须持通行证始准进入(这时白公馆已不作关押人犯的看守所而改为美方人员招待所)。日本投降后,中美合作所在中国各地的美方人员陆续回国;中方人员中的军统成员回军统报到,另派工作;非军统成员发给3个月薪津资遣。中美合作所所属各训练班除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学员尚未结业交军统接办外,其余各班结束。军械物资分别由军统、联勤总部接收。中美合作所的撤销善后工作于1946年1月底全部结束。

在解放后肃特斗争中我公安机关早已查明:中美合作所与《挺进报》事件,乃至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红岩》小说等出

出版物中有关中美合作所的描写,基本上都是与历史真实不符的虚构。

党史小说要不要细节的真实

作为小说,不可没有虚构。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要素之一是细节的真实,对于以具体历史事件和具体地点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党史小说”,就更不能不讲究细节的真实,不应在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及地点上随意编造,张冠李戴。正如写一部以北平为背景的小说,就不能把颐和园写成位于天安门旁边,也不允许把八达岭长城写在景山公园里。这应该是起码的常识。

小说《红岩》49页写到:“在飞来寺中苏文协,他(成岗)真的见到毛主席了……”众所周知:当年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中山一路黄家垭口;而飞来寺是中山二路附近原苏联驻华大使馆(现第三人民医院内)。

《红岩》95页描写特务机关:“这里,老街32号,堂皇的铁门上,横署两个篆字——‘慈居’……”这也错了。老街34号“慈居”是一座砖木结构二楼一底的建筑,老式木门,山墙上横署两个隶书“慈居”。

《红岩》56页描写“江姐来到浓雾弥漫的朝天门码头……”乘民运轮上华蓥山。这也错了。华蓥山在川北,乘船需从嘉陵江溯江而上,解放前,称嘉陵江为小河,轮船都在千厮门码头上下,并不在朝天门码头。

《红岩》363页中说:“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幼子囚在(白公馆)顶楼上,他们是半年前才被秘密押来。特务从来不准他下楼。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被囚禁在一间地下牢房里,也不准和他见面。”

史实是:杨虎城一家4口于1947年4月30日由贵州息烽玄天洞移禁重庆磁器口杨家山军统“四一图书馆”后面一平房内单独关押。1949年2月1日杨虎城一家3口,和关押在白公馆的宋绮云一家3口及阎继明、张醒民被专机移囚贵阳黔灵山麒麟洞。杨虎城一家从未被关押在白公馆顶楼上。

《红岩》204页写到叶挺《囚歌》时,通过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新四军战士龙光华之口说:

“军长在楼下二室写过这首诗,我把它抄在墙上给大家看。”

历史事实是:1942年1月3日,叶挺将军从桂林押解重庆,在军统望龙门、白公馆看守所短期囚禁后,即移监军统“乡下”蒋家院子单独囚禁。11月21日,叶在蒋家院子写了《囚歌》,署名“六面碰壁居士”。叶挺夫人李秀文前来探监时,叶将《囚歌》和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一并交李带出监狱,送和平路天官府郭寓交郭沫若。25日,叶挺移禁湖北恩施。叶挺从未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渣滓洞监狱只关押普通政治犯)

《红岩》577页说国民党逃跑前对重庆大爆炸“布置了一百多个目标……”史实是:1949年11月18日,国民党在重庆成立临时指挥部,划定了11个破坏地区,委派了指挥官,确定爆炸目标18处:电力厂2个,兵工厂10个,仓库3所,桥梁2座和国际广播电台。“一百多个目标”太夸张了。

在小说481页的注释①中,对重庆“九二”火灾作了这样的说明:“1949年9月2日,国民党在市区纵火。朝天门一带市区尽成焦土,数万人无家可归,死亡达万余人。”这一注释也是错的。早在1959年,重庆公安机关就已查明“九二”火灾不是“国民党特务纵火”,火头是陕西街赣江街17号油腊铺三楼佃户陈树章家的两个女儿“玩家家”引起,因这一带都是穿斗木结构房和棚户,烈日、旋风,加上无水,朝天门顿成火海,大火延续10多小时,受灾9601户,灾民4.1万余人,有户口可查死者2568人,掩埋尸体2874具,伤4000余人。这是早已澄清的史实,小说再版时却没有更正过来。

此外,小说中这类史、地细节上的错误还有: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错写成了“中美号”。“在重庆、江津之间的江口夜渡长江”占领江津机场。江口在綦江、江津之间,江津无机场。小说434页写到“司徒雷登还呆坐在南京,尽管共军开进了大使馆,他还赖在那里……”这个“共军开进了美国大使馆”的说法完全违背史实,违背解放军入城时的“约法八章”,是根本没有的事。小说中还有从蒋介石元旦文告到重庆解放,国共双方许多事件时序的错位,这里不作赘述。

(责任编辑 吴 思)

洪秀全在美女包围中走向灭亡

●魏文华

太平天国从兴起到衰亡，其速度之快和时间的短促，是历史上罕见的。这场狂飙式的运动，潮起潮落，又同妇女地位在运动中的升沉息息相关。

关于妇女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恩格斯有句名言：“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列宁更进一步指出：“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以此对照太平天国“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过程，与妇女地位在运动中突升骤沉特别是洪秀全对妇女运动从提倡到摧残，是会受到一些启示的。

一、江山争半壁 美人占一群

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洪秀全，从1843年6月创立拜上帝教起，即以“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作号召，广泛发动群众特别是农村贫困劳动妇女参加，在拜上帝教主要发源地广西桂平县鹏隘山区曾经涌现出以杨云娇为首的许多妇女积极分子，与启蒙者冯云山并肩活动，流传有“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的民谣。由于通过妇女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仅用七年半时间即于1851年1月胜利地发动了势成燎原的金田起义。起义时有一首民谣形容妇女参加运动的盛况：“姊妹亲，同个房睡共口针，如今姐随洪杨去，妹也跟随一路行！”

在起义初期，太平军有妇女单独组成的女军，与男军一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前线，遵从天王洪秀全“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

妖”的旨令，奋勇作战。直到武汉仍然男女同职同官：“贼妇亦有伪职，与伪官相等，间尝出战，红绡抹额，颇矫健。”攻克南京以后东征时，女军仍充先锋，女将苏三娘率领女军首先攀登占领镇江城，当时有人作诗咏赞苏三娘和她从广西带来的赤脚女兵英姿：“绿旗黄女元戎，珠帽无龙结束工；八百女兵都赤脚，蛮衿扎裤走如风！”更有甚者，天朝举行第一次考试时，有史以来特为妇女参加考试设立女科，拔取了女状元、女进士等，把妇女地位推上顶峰。

二、不问朝政 耽于女色十一年

在胜利中，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满足于半壁江山到手，认为大局已定，要关门当太平天子，把同打江山的妇女转为供自己淫乐。在攻克南京前17天，天王即从芜湖江面龙舟上突然颁发一道严分男女界限的诏令：“女理内事，外事非宜所闻”。并用四个“斩不赦”限制身边妇女与外界联系。攻克南京后入城时，跟随天王的妇女都纱巾蒙面，进入天王府即被禁锢，与外界完全隔绝。

洪秀全早就梦求后妃成群的帝王宫廷生活。他创立拜上帝教时就自言在天上有一房正月宫娘娘，把他的妻子称为又正月宫；金田起义时他即选美纳妃15人；一年后在广西永安围城中：“洪秀全耽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随军打出广西后，虽经蓑衣渡大败仗，但到湖南道州又纳何贡生“进献美女四人”；占湖北武昌后，“首逆”称选妃，使民间女子往阅马厂听讲，至则选十余龄有殊色者六十人；进入天京小天堂

后又征选更多美女。

据史载,天京天王府“其中约有妇女千百,男贼仅洪逆一人,其中淫恶可知也”。至于具体人数,《江南春梦笔记》中分类评列,讲王后娘娘下辖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16个名位208人,24个王妃名下辖姣女、元女等7个名位共960人,两类共计1168人属妃嫔;另有服役的女官,以二品掌率60人各辖女司20人,合计为1200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天王。

洪秀全从41岁进南京城至52岁自尽,在美女丛中生活11年,从未走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上马杀敌,也不过问朝政。这时他正值壮盛之年,并且体格健壮,但11年仅颁发过25篇诏书,而且1854年至1858年是空白,5年竟然未发一诏。连曾国藩也感到奇怪:“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杨逆具奏请朝觐,洪逆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允也。”

洪秀全一方面不问朝政,一方面则费尽心计与后妃娘娘们作文字游戏。从1857年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经典官书之一《天父诗》看,所收选的500首诗文,除起义初期杨秀清假托天父帮助洪秀全排解后妃纠纷的24首口述诗文外,另外476首都是洪秀全进入天京初期三年中写给后妃的夫权独白。他对朝政不发令旨,对美人却平均三四天写一首诗,可见其爱美人胜过江山。

这些妇女陷入后宫,早晨为天王“洗身穿袍统理发,疏通扎好解主烦,主发尊严高正贵,永远威风坐江山!”向天王参拜:“朝朝穿袍钟锣响,响开钟锣尽朝阳,后殿此时齐呼拜,前殿门开来接光!”拉着金辇陪天王游御苑:“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车声。”给天王按摩肚子却不得碰着胡须:“小心弯远须顾须,悠悠轻轻摸挨脐!”拨扇驱蚊:“日夜拨扇扇莫停,莫拨榻底要记清!”捧茶拿痰桶:“捧茶不正难企高,拿涎不正难轻饶!”从这些诗可以看到天王小朝廷的威严和荒淫。

三、从姊妹群到王家奴

生活在千百个美女丛中的天王洪秀全,嫌

那些从广西跟来征尘未净的老姊妹们粗鲁、脏污。听见有人高声说话,他便写诗斥责:“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看见有人束手缩脚,他训斥:“耕田婆有耕田样,天堂人物好威仪,尔们想做真月亮,到今还不晓提理!”见有人不会刷牙、敷粉、洒香水,他用刻薄的语言讽刺挖苦:“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面突乌骚身腥臭,嘴饿臭化烧硫磺!”

洪秀全毫不掩饰喜新厌旧的情绪:“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他为那些可怜的薄福娘娘们规定了几项杖责戒律:“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还有一项特别奇怪的规定:“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

后宫妇女失掉了所有人格尊严,一言一行随时都有招致责罚的可能。由于天王宣布过:“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所以妇女们受到责罚时,即使冤枉也不得辩解,只许认错领打,否则便会受到加罪处罚:“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下罪难容!”“雪下”是太平军“刀下”的代称,至少有3个女人因为挨打时喊冤不认错而被杀。被杀的人当中,有人至死不认错并且顶撞了天王,受到五马分尸的酷刑。

四、天王府外也是妇女嗟怨声

太平军入城后,最初奉东王杨秀清严令,居民“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北王韦昌辉代替生病的杨秀清主政后,改行没收一切工商业及强迫男女分离集中住居的“百行条例”,男人入营当兵,妇女住女馆参加劳动。当时天京大兴土木,妇女参加天王府建设:“周围加砌高墙,二丈高四尺宽,墙头加砌碎瓷瓦筑,墙外令掬得妇女挑挖濠沟。”“其凤门以内,皆系贼妇在内,以供洪逆役使。贼妇中并有能造房屋者,洪逆住处失火,烧去楼房数间,旋经贼令木匠将房架造成送入,贼妇即在內盖成房屋。”

另有一道咏叹老年妇女从明故宫拆城取砖石运料苦况的乐府诗：“老人城上摇，旋向城下抛；女人城里拾，旋向城外挑。老人一失足，翻身身必坏；女人一失手，触头头必碎。”

太平军从得民心望风披靡占得南京，到失民心危机四伏，民众大批逃亡，前后仅几个月工夫。太平军进城前，南京原有人口260万人，春季进城后仅九个月，到当年年底，天朝顶天侯衙核查登记人口时只剩15万人，其中老弱男子4万人，妇女11万人。而妇女减员之快尤为惊人，10月份全城女馆尚有23万人，到年底核查登记的人口，两个月中妇女即减少12万人。与金田起义时“姊随洪杨去，妹也跟随一路行”的妇女参军盛况相比，自称小天堂的天京简直像人间地狱，妇女们非死即逃，甚至参加暗杀和组织暴乱的行列。妇女们的境遇，直接动摇了民心、军心。

五、驱使千万妇女服劳役 实行消灭家庭的女馆制

当时朝野上下，群众反映最为强烈、影响政局稳定最迫切的是妇女问题，由于洪秀全驱成千上万妇女建房、挖濠、砌墙，由天王亲自监工督迫，风雨寒雪不停，并有打人杀人情事发生，引得民怨沸腾，成为影响政局稳定的重大因素。所以，在金殿君臣恳谈中，杨秀清首先向天王提出这个问题：“女官若有小过，暂且宽恕，即使教导亦要悠然，使其无惊恐之心。譬如凿池挖塘而论，不比筑城作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其暂且休息，以待来日。现下雨雪寒冻，勿用紧挖！如此安慰，彼必宽意乐心，知恩感德，勇于从事，事必有成。”

当时天京城内，从侯以下所有军政官员至平民百姓，全部家人离散，分居在男营女馆，一部分被选征到各王府，主要到天王府服役，久久分离，了无期限，十分悲惨。所以，杨秀清要求把他妹妹等四女官调出天王府的同时，也呼吁允许这些人回家团聚，说：“女官理天事者甚苦，且不是功臣（伤残者）、忠臣（烈士）之妻，即是功臣、忠臣之母，或则有稚子，或则有立功之丈夫，彼为臣者既能舍家而顾国、而忘家、公而忘私，

则为君者自当体彼一念之忠忱，或准其一月而半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三十日或二十日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一二礼拜日排班轮流而归其家省视，以哺其稚子，以待其衰姑，或以事其丈夫，使彼亦得尽其先顾国后顾家之谊。”这是想变相地恢复家庭。但因实行得不好，又过了九个月，杨秀清于1854年9月29日假托天父下凡，正式要求“排铺尔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家”，才把实行了一年半、丧尽人心的女馆解散，恢复了臣民的家庭，但已付出惨重的代价。

六、沉湎女色 至死不悟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依然生活在娇娘美女中，生活更加颓废。在1861年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天京的3000美女中挑出180人收入天王府，当时即有人写诗讽刺：“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堕溷愁。”

洪秀全从1856年天京事变到1864年自杀，由于深居宫中，消沉丧志，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他的诏书都像李秀成所说“言天说地”的梦话，诸如《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说什么“万国扶朕在天台”；听到太平军克复苏州的捷报后，他竟降诏说：“朕睡紧都做得王，坐得江山”；在《打死六兽梦兆诏》中，他并不脸红地说，他拐引着两个陌生女子，又打死四只黄虎、两只黑狗，是“天朝江山万万年”的兆征，等等。后来，他连这种虚无缥缈的诏书也懒得写，于1861年7月颁发了最后一道“朕命幼主写诏书”的诏旨，索性把权力交给他的年方13岁、且已学会荒淫的儿子幼主，自己当起了太上皇。

洪秀全在小天堂美女群中享受了11年的帝王生活。1864年6月，他活到52岁，在曾国藩湘军的隆隆炮声和后宫女子的嗟怨声中，不得不丢下他那千百个娇娘粉黛，自尽身亡。他死后48天，天京沦陷，天国灭亡，他的宝贝儿子也当了俘虏上了断头台。那座由天王亲自监工和千万妇女用血泪建造了十年、周围十余里的巍峨天王府宫殿，在清军挖出来焚烧的天王尸体的烟焰中，化作“十年壮丽天王府，空余荒蒿野鸽飞”的废墟。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文章与时代

——精神现象零拾之十

●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文章总是一个时代的文章。离开了时代,就很难读懂。

鲁迅的文章,在他那个时代,读者是懂得的。所以至今回想,仍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但是,今天的青年却凭借注释也不容易读懂了。何止青年,就是有些并不年轻的学者、作家,月旦雌黄之际,似也十分隔膜。那原因,我想大抵是因为对鲁迅生活的时代印象早已淡漠。

有年轻朋友问我,明白的话,鲁迅为什么要讲得那样曲折隐晦?我劝他读一读马克思一段明白的文字——“‘风格就是人’。可是实际情形怎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我不应当用自己的风格去写,而应当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首先应当给他一种指定的表现方式!……指定的表现方式不过意味着‘强颜欢笑’而已。”“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惟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鲁迅生活的中国,同马克思生活的普鲁士并无二致。如果他要直白地表达思想,我们或许就根本读不到鲁迅的文章了。

“鲁迅为什么这样尖刻?”这是年轻朋友提到的另一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只能看到鲁迅骂他人的文章,而看不到他人骂鲁迅的文章。于是给人的印象被“骂”者都那样委屈而无辜。幸好今天已经有人把论战双方的文字都辑到了一起。我劝年轻朋友读一读。如果他们知道

鲁迅经常不是在骂人,而是在挨骂——骂他世故,骂他剽窃,骂他的作品只配丢在茅坑里,骂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骂他“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骂他代表中国知识阶层最消极最无为的方面,甚至他的长相,他的恋爱,无不都在被骂之列——那么,他们当会懂得,鲁迅的骂,多是出于反击,比较起来,他倒是要忠厚得多,因为他讨厌谩骂。

梁实秋的散文,近二十年大受推崇。《雅舍小品》据说愈来愈显示出艺术的魅力,而与此相对照的,则是“怒吼的散文”已大多为读者淡忘:

“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唯闻犬吠。”“善哭的也就常常善笑,迷迷的笑,吃吃的笑,格格的笑,哈哈的笑,笑是常驻在女人脸上的,这笑脸常常成为最有效的护照。女人最像小孩,她能为一个滑稽的姿态而笑得前仰后合,肚皮痛,滴眼泪,以至于翻筋斗!哀与乐都像是常川有备,一触即发。”赏月,谈女人,确为雅文,雅得让人浑忘了人间何世!

我是在空袭警报声中出生的。父亲带着家人和学生背井离乡从苏州逃往“大后方”的苦难,我没经过。大哥在战乱中得了伤寒,因无药医治而死于十七岁的青春年华,我却是记得的。我记得青年人热血沸腾的抗战歌声,记得小孩子上街卖花,唱着那凄婉的歌声——“先生,买一朵花吧!”用卖花得来的钱“献金救国”。也许就是因为记得这些,所以我始终不能接受《雅舍小品》之所谓从苦难中寻觅的“诗意”。我的童年,没有

诗意。

读文章总得了解产生这些文章的时代。我们喜欢有意地淡忘那些不愉快的时代,以为这样,人们心里就只有美好。“文革”刚刚过去二十多年,今天的年轻人就已隔膜如同隔世,更不必说

抗战以及抗战前的年代。忘记了那些时代,固然忘记了丑恶与卑劣,但也同样会忘记伟大与荣光。没有记忆的一代,不是健壮的一代。诗曰:

恍同隔世读文章,青不青来黄不黄。
堪笑头颅和血掷,不如拥女赏瑶光。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18.00	4.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3.80	4.00
断桅扬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	丁兆甲	26.00	4.00
斯大林(上中下册)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78.00	7.00
动荡岁月秘闻	温乐群等	72.00	8.00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1966-1978)	杨胜群 田松年	27.00	4.00
中共历史转折关头——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下)	李 剑	49.80	6.00
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全四卷)	萧延中	88.60	10.00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7.00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4.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门 祝东力	17.00	4.00
刘少奇之路:(全四卷)	胡长水 林蕴晖等	69.80	7.00
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	严 秀	12.50	3.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4.00
改革风云中的万里	张广友	20.00	4.00
航天情——永远的眷恋	彭洁清	16.00	4.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4.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4.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4.00
李锐其人	宋晓梦	28.00	4.00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凌志军 马立诚	22.8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4.00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凌志军	25.00	4.00
25年——1978—2002 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4.00
我向百姓说实话	李昌平	20.00	4.00
毕竟是书生	周一良	13.00	3.00
虽九死其犹未悔	叶笃义	15.00	3.00
影剧之王田汉—— 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	张耀杰	25.00	4.00
戏剧大师曹禺—— 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	张耀杰	20.00	4.00
白色花劫——“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	林 希	25.00	4.00
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	张 帆	25.00	4.00
中国人物年鉴	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	158.00	6.00
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 内幕实录前后(一、二、三卷)	邱 石	149.40	15.00
十年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论点	张国华	28.00	4.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苏共亡党十年祭》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解体?谁是苏共的掘墓人?我国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有什么不同?本书在历史追述中回答了上述问题。由于苏联和苏共对中国和中共的巨大影响,作者的问题和答案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本书成为人们自我审视的一面镜子。

《斯大林》本书由苏联新闻社出版社1989年出版,作者曾任苏联国防部军事研究所所长。在洋洋上百万字、1470页的巨著里,作者以详实的史料,勾画出一个革命者转化为独裁者的历史,考察了这个人留下的带血痕的时代。这是一个谎言、残暴、冷酷、梦想、巨大的悲剧和巨大的成就交织在一起的时代。书中充满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而这一切记录都源于扎实可靠的原始档案。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从皇帝官僚到土匪和小民,每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利害考量,发展出独特的生存策略。本书以明清和民国历史为本,剖析了各阶层的获利模式和反抗策略,揭示出买命和卖命的逻辑,挖出了各种规则背后的终极规则。行文生动平易,读来让人后悔:我怎么没看透呢?

《中共历史转折关头——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下两册) 本书是一本史料汇编,作者的阵容极其强大:从毛泽东、董必武到张国焘、陈公博,从张闻天到李德生和“林办”的秘书,中共十一次代表大会的风云变幻,听亲历者娓娓道来,分量和实感自是不同。书中还穿插了一些考证,例如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率等等。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本期： 终审 徐 孔 执行主编 吴 思 审校 赵友慈

炎黄春秋

2004/1 (总第 142 期)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执行主编 :李 晨

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 :底先华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陈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书长 :徐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编 :100045

电话 :68522852 (办公室)

68534879 (编辑室)

68532048 (发行部)

传真 :68532569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J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 (E-mail) 地址 :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 :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 :4.80 元